

#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杨尚昆：我对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吴江：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欧阳毅：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顾颉刚在一九五八年『拔白旗』运动中

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历史成因

2001/

9

总第 114 期

炎黄春秋杂志社出版

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

用历史唯物主义  
指导历史  
国际主义  
之新实践

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陈望道

鉴古知今

继往开来

黄季博

二〇〇一年五月

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江隆文  
物文事  
邦安  
通鉴  
治國

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杜润生  
二〇〇一年五月

要想贯物以  
德治国的方针  
首先必须研究如  
弘扬炎黄文化

季嘉林

二〇〇一年五月

祝  
贺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

自強不息  
厚德载物

张代年

二〇〇一年五月

# 炎黄春秋

## 亲 历 记

- 2 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杨尚昆  
8 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欧阳毅  
12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吴 江

## 陨 星 篇

- 20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宋廷章

## 春 秋 笔

- 24 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 傅国涌  
28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谢尚品  
33 辛亥革命与台湾..... 何 标

## 沉 思 录

- 36 顾颉刚在 1958 年“拔白旗”运动中..... 张锡金  
40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 杨继绳

## 人 海 浪

- 44 书画鉴赏家马宝山长春购宝记..... 张树林  
47 书画家李山..... 韦 顺

## 古 今 谈

- 52 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历史成因..... 江仁宝  
57 天堂与天国种种..... 舒 展  
71 内乡县衙的启示..... 张天来

## 求 实 篇

- 60 左联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始末 ..... 刘小清

## 文 荟 苑

- 64 中国昆曲被列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榜首  
..... 王 恂  
66 在麋鹿苑看“东方护生诗画” ..... 郭 耕

## 九 州 景

- 68 荆轲壮别何处..... 曲英杰

## 两 岸 情

- 72 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张 虚

## 古 镜 台

- 74 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 彭传杰

## 编 读 窗

- 78 来自读者的祝贺 ..... 王荆 刘德纯等

## 信 息 窗

- 80 赏中秋明月 话祖国统一 ..... 严久惠

## 顾 问:

费孝通 程思远 陈 沂

杜润生

##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于光远 王俊义 王景山

冯 征 冯其庸 曲润海

李 庄 李 普 李 锐

李学勤 吴 象 宋木文

苏双碧 张 镠 张岂之

张国琦 郑 惠 凌 云

曾彦修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 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杨继绳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深圳市亚大实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国内统一刊号:CN11—2817/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本刊电子信箱(E-mail)地址:

Yanhcq@sina.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 我对中共中央后方工作委员会的回忆

● 杨尚昆

蒋介石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的八个月内,虽然占领了一些城市,但付出的代价很大,折兵70余万,在战局上开始丧失主动,从1947年春开始,不得不改全面进攻为“重点进攻”:东面,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西面,重点进攻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企图将我中央领导机构赶出西北,然后集中力量击破华北解放区。

为了诱敌深入,拖住胡宗南进犯延安的23万兵力,中央决定主动撤出延安。中央和军委机关的大部分人员东渡黄河,移到晋西北,在那里建立后方工作委员会,由叶剑英担任后委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同志率领一支精干的队伍,坚持留在陕北。陕北群众条件好,地形好,我们熟悉,可以在这里搞一个战略上的作战方面,可以箝制敌人的力量。

“后委”的工作,主要是负责向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提供情报、给养、物资器材,连蒋管区的报纸杂志都送过河去;同时,中央同全国各地的联系,也都集中地经过“后委”来收转。

## 建立中央“后委”的决策过程

中央“后委”驻地的确定,经历了一个过程。

中央原来决定,中央机关除了少数人留在河西毛主席身边工作外,大部分转移到晋绥地区的山西临县三交镇。但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周围的“绿头苍蝇”从四面八方都叮上来了。为了加强陕甘宁的兵力,中央从晋西北抽

调王震的两个旅和张宗逊的新编旅过河,晋绥边区的军事力量因此有所减弱。中央估计“数月内贺(龙)、李(井泉)处局面将较紧”,所以在3月25日来电,要我们将已经到达晋绥的大部分中央机关转移到五台去,以减轻晋绥地区的负担,留下的机关也不要过于集中,必要时可以转移到太行去,以“免在傅阎两敌进攻晋西北时受损”。

接到这个电报后,剑英同志和我立刻行动,行军序列都编好了,第一批前梯队已从三交镇到达兴县。但我们在思想上对转移到五台去是有保留的。先头部队刚走了一天,3月28日,恩来同志从河西过来。那时,中央和军委机关转移到晋西北的人员共有5500多人,恩来同志过河是来帮助我们处理大队人马的安全转移。他发现我们有点想法,不赞成远去五台,就让我们敞开谈谈自己的意见。我们说:这一大摊子人走到哪里都是个麻烦,从晋西北到晋察冀有好几百里地,途中还会遇到阎锡山的部队;更重要的是,中央和军委机关走远了,留在陕北的中央纵队后勤工作还得另外组织,因此,我们建议还是不要走远好。恩来同志听后觉得有道理,就打电报给中央,说同我们研究的结果还是留在晋西北好,我们就停了下来。

4月2日,刘少奇、朱德同志也过河来了。他们把贺老总、董必武同志和我们找到一起。这时,我们才知道3月29日中央在枣林沟召开会议,讨论中央机关的行动问题,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和军委总部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工作;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以刘少奇为书记,前



往晋西北或其它适当的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已到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照前议一部去太行,一部就地疏散”。这样,我们的行止处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大约有一二个星期。

到4月11日,贺龙同志派专人“火速”送来中央的电报。这才最后确定将在晋西北的这5000多人分成三部分行动:一部分回陕北;一部分去太行;大部分暂留原地不动,准备将来同中央会合。这是周恩来同志回到河西后,中央经过进一步研究所作出的决策。

后来知道,当傅作义、阎锡山蠢蠢欲动、威胁晋西北时,毛主席胸有成竹地认为:“只要陕北及陈(赓)、谢(富治)在南线胜利,即有办法对付傅、阎。”3月28日,毛主席命令陈赓、谢富治率主力四个旅,发起晋南战役,威胁胡宗南侧后。4月2日,又要晋察冀军区提前发动正太战役,牵制傅作义部。加上3月25日,西北野战军在青化砭首战告捷,陕甘宁边区和晋西北的局面稳住了,后委的驻地才最后确定下来。这说明中央对确定后委驻地的重视,因为一旦中央和军委机关遭受敌人严重破坏,政治上将造成很大的损失。

4月中,按照中央的方案,我们组织在晋西北的一部分人员分别西渡和东行。

西渡黄河回陕北工作的,是军委一局大部、二局和中央机要处一部分,以及警卫连一个排共99人,有人把它称为九九大队。这部分人员原定由军委作战部长李涛带队,因为李涛翻了车,行动不便,改由童陆生带队。他们从磧口过河,经绥德以北的四十里铺进入湖峪后,到达当时中央纵队驻地陕北安塞的王家湾。

东去太行随中央工委工作的,包括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社会部、中央党校、解放日报社、中央青委;军委政治部、三局一部和中央机要处、秘书处各一部,合为一个单位;还有总卫生部、供给部和杨家岭行政处各一部等。这部分人员,共1300多人,由安子文带队,分四批经静乐、崞县(今原平县)、五台转入河北地区。

留在晋西北的中央和军委机关人员有3000人,单位十分庞杂,包括军委作战部一

局、二局和三局的一部分,他们主要是搞电台、密码和报务的;中央机要处、秘书处与中央办公厅合在一起;法律委员会、中央城工部、情报部、军委总卫生部、外事组、交际处、中央妇委、工会,还有烈士家属、交际处的客人、军委蓝家坪托儿所的娃娃和婆姨们;供给部、行政处留下一批人,专门担任供给和运输。这些单位,绝大部分住在临县三交镇的3个行政村和12个自然村。只有法律委员会的王明、吴玉章、谢觉哉和陈瑾昆等住在后甘泉,那是三交镇和贺老总司令部所在的兴县之间一个比较大的村子;还有,康生率领的中央土改工作团临时在那里,工作结束后就要到中央工委去。后甘泉的这两个单位,我们只是联系,他们的供应全由晋西北负责。

“后委”的领导班子,中央原定由叶剑英、杨尚昆、李维汉和邓颖超四人为委员,叶为书记,我任后方支队司令。后来经过中央批准,由叶、杨、李维汉、李克农、邓颖超五人为常委,作战部长李涛、二局的戴镜元、三局的王净和妇委的帅光(孟奇)为委员,我兼任“后委”秘书长。

我们在三交镇,从1947年2月到1948年3月,住了一年。这一年,毛主席、周恩来和弼时同志在“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着“最大的人民解放战争”。我们“后委”,在相对稳定的环境里,掌握敌情,提供情报,统筹后方工作,为毛主席、党中央服务。

## “后委”是中央的参谋部

在三交镇,“后委”机关虽有那么多电台,因为大部分住在傍山的窑洞里,防空有着很有利的条件。我们又在驻地的高山上设有观察哨,安装了报警器,发现敌机马上发出警报,所以敌机虽然多次来空袭,造成的损失并不大。“后委”的驻地安排停当后,我们立刻组织大家学习中央的指示精神,明确“后委”的任务;结合行军总结,清点物资器材;转变作风,尽快适应新的环境和条件;开展工作,为转战陕北的中央纵队全力服务。



小河会议会场。左二为毛泽东，左三为贺龙

首先，架设电台，侦察敌情，当好中央的耳目。

侦察敌情，便于中央作出决策，是“后委”的一项重要任务。到三交后，电讯侦察遇到一系列的困难：没有电源，技术力量分散，部分机器坚壁在陕北，敌台更换了密码，给跟踪侦察带来了困难。面对这种局面，我们发动大家出主意，采取应急措施。挑选了一部分有战斗经验的同志，重返陕北，在敌人眼皮下取回坚壁起来的器材，改装废旧的马达，自力更生地解决了电源问题。为了弥补人手不足，以老带新，并动员部分病休同志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经过大家昼夜奋战半个多月，到4月下旬，已在三交镇的各山沟里建立起8个通讯电台，可以同全国各根据地、各战区的前后方和蒋管区的有关密台建立起联络。我们立刻向中央纵队作了这样的报告：“28日可以全部通报。”

我们由于电台力量有限，这时只能根据中央的战略部署，进行重点侦察。4月份，着重加强对傅作义和阎锡山部的监视，为中央工委和随工委东行的队伍通过同蒲铁路北段进入晋察冀地区提供情报。6月以后，战争开始由内线转向外线，刘、邓大军、陈、粟大军和陈、谢部队分三路挺进中原，我们的侦察电台集中百分

之七十以上的力量，搜集各路的敌情变化，向战略区首长提供情报。1975年4月，邓小平同志接见当时担任军委总参谋部三部部长的戴镜元时还提到：解放战争期间，你们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二，建立晋绥转报电台，保障中央和全党全军通讯联络的畅通。

5月1日，中央决定：在叶、杨领导下，在晋绥建立中央后方大

台，“负责收转中央与各地来往电报”，通告各地，“此种电台现已布置就绪”，并规定：“后委”的转报大台共联络14家，包括中央工委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安子文；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军区的前后方；东北、华北军区的前后方及冀热辽分局、中央局等。中央还规定：东北局、华东局、邯郸局、晋察冀中央局、中原局等主要战略区也应经常同中央工委及叶杨“后委”台联络。这样中央同全国各地、各战略区之间通过转报台，构成一个电波联络网。

7月中，弼时同志又通知“后委”，将各地送给中央的文件刊物，由曾三负责，分土改、财经、武装政策及党的组织状况、思想动态等专题加以整理，写成简明的提要，由李维汉、李济分送各部门。

地面的交通，也逐步恢复。中央决定在“后委”设立交通科，由原中央秘书处交通科长王凯负责，恢复同各中央局的秘密交通联系，归李克农领导。6月初，“后委”在河西建立了交通站，在山西崞县建立了同晋察冀联系的交通站，每隔半个月，由晋察冀社会部派交通送来一批蒋管区的报纸刊物。

三，汇总整理、通报和交流人民解放军各部的作战经验。

4月下旬,为了统一全军的报道,军委通知各战略区,从5月开始,对内实行通报,对外发表战报。我们将从各个渠道搜集到的资料,编印出《敌情汇编》、《敌情综合》、《敌情通报》等内部刊物,介绍蒋军有关战略战术,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兵及联勤机关、学校、军工厂等单位的实力,主官姓名,工作情况,各部队的作战特点等,供我军各指挥单位用兵时参考。外事处的同志,在王炳南领导下,还整理塔斯社、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中央社的每日电讯,编印了《参考消息》,供领导机关参考,对国际形势、外交政策和国共两党关系等专题写出专题材料,报送中央。这一时期,各区有关作战情况的总结,大部分先报送到“后委”,由“后委”汇总上报中央,或转发各野战军。

四,根据中央的委托,指导蒋管区的群众斗争。

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当局横征暴敛,蒋管区人民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和反对美国助蒋内战的斗争越来越高涨,5月20日,京沪杭16所高等院校的学生代表赴南京请愿,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酿成“五二〇”事件。中央对蒋管区的人民运动及时进行了指导。事后,我们也向中央提出四条斗争策略的建议:一,要求各地的秘密党组织加强统一领导,扩大学生阵营;二,提出的斗争口号要经过群众酝酿和推敲,不让反动当局找到借口;三,建立情报工作,尽可能预先揭露反动派屠杀进步力量的阴谋,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分工,使斗争能持续开展;四,发动工人、公教人员、平民参加反饥饿斗争,争取军警。中央完全同意这些策略建议。

对蒋管区农村的游击斗争,“后委”也提出了一些斗争策略方面的建议。例如4月下旬,“后委”要求香港工委帮助广东区委,制订计划,将流散在广东内地和闽西南的党员集中起来,加以训练,派回农村去开展游击斗争;6月,为蒋管区开展农村游击斗争提供了六条建议。

随着我军外线作战的胜利,城工部开办了

准备回四川开辟工作的“川干训练班”。这个训练班有学员260余人。1949年,二野南下时,川干班学员和西南服务团合并,随军入川,参加接管工作。

五,为在陕北前方的中央纵队补充人员,运送物资。

中央纵队最初的人员共800人。毛泽东称它为“八百人的国家”。6月,中央通知“后委”从太行和五台地区征集新兵1300人,补充入警卫团。“后委”立刻派社会部的干部,去当地同军区同志一起做好政治审查工作,又组织新兵到西北野战军参加陕甘宁边区保卫战,在实战中经受锻炼。后来,从他们中选出600人编成一个团四个连,到中央纵队报到。这样,中央纵队的人数增加到一千四五百人。

总之,“后委”的工作头绪多,事情杂。有人说,无非是吃穿用、后勤保障。王震同志比较了解“后委”的工作。他说过:有些同志以为中央和毛主席转战陕北期间,没有参谋部,这是一种误解,“毛主席在陕北之所以能够料事如神,指挥若定,中“后委”起了重要的作用。”这是王震同志对我们的鼓励。

## 小河会议前后

此后不久,我准备去陕北向中央汇报工作,叶剑英和邓颖超同志去西柏坡参加全国土地会议。在我们离开三交期间,“后委”由李维汉代理书记,李涛代理秘书长。我原定在6月上旬去陕北。正要动身时,突然接到任弼时同志的电报,要我暂缓出发,因为胡宗南的主力西进,先头部队已到安塞镇,有向中央纵队的驻地王家湾袭击的可能。

这次胡宗南西进,毛主席判断是“盲目乱窜,已失主动”的表现。但为了避敌,中央纵队仍冒着大雨连夜离开住了56天的王家湾,转到十华里外靖边县的小河村。第二天,又在敌人的眼皮底下离开小河,转到天赐湾,同时派出一个排向西南方向活动,佯装同敌遭遇,且战且退,把敌牵向西南,中央纵队又回到小河村。6月16日,中央才通知我西渡黄河。

“后委” 我渡过黄河后，先到绥德专区。军分区的同志正在忙于扩兵，中央规定的任务是在四个月内完成扩兵一万人的任务，军分区政委张邦英和地委的同志向我介绍了情况，希望“后委”从河东的工作队中抽出一些干部，协助他们做扩军工作。我当即电告叶剑英同志，后来，“后委”抽调了40名干部到绥德帮助工作。

这时，中央纵队刚回到靖边县的小河村住定。人民解放战争已进入第二个年头，战争局势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毛主席一面考虑怎样把战争转入外线，引到国民党统治区内作战，一面准备去苏联会见斯大林。我一到小河，就听到这件事。从哪里走？那时的打算是先到内蒙古，斯大林派飞机来接他。所以，中央考虑过先派刘秀峰和李初梨到张家口一带去了解情况，还准备把罗瑞卿抽出来，率领一个旅护送毛主席去内蒙古。这件事中央讨论过，但我没有参加。

我到小河后，交给我做的是同这件事有关的另一件事：那就是毛主席派我给彭德怀同志送一封信。当时我有点纳闷，同彭德怀那里电报是通的，为什么要郑重其事地派我专程去送信？那时，彭德怀同志指挥的部队已赶走马鸿逵的骑兵，收复了三边地区，司令部设在靖边的张家畔。那里已是古长城外了。我带了11个人，骑着马走了5天，见了彭总，我把毛主席的亲笔信交给他。他拆开一看，问我：你知道什么事吗？我说：给你的信，我哪敢拆！他说：主席的意思是把西北的军事交给我，后方工作包括联防军、地方工作和后勤统归贺老总管。我说：主席要去苏联见斯大林，这大概是临走的托付啊！彭总说了一句话：“一个韩信，一个萧何嘛！”这是汉高祖刘邦用人的故事，有个分工：韩信指挥作战，萧何经营后方。后来，毛主席没有去苏联。我回小河，就开会，这就是小河会议。

小河会议开了3天（7月21至23日）。会议就在山麓的羊圈里开，参加会议的有西北野战军、联防军和太岳的指挥员：彭德怀、贺龙、陈赓、习仲勋、马明方、贾拓夫、张宗逊、王

震、张经武以及我和陆定一。

会议期间，研究了陈赓、谢富治率领的太岳兵团的使用方向问题。中央原来决定，让陈、谢从晋西南西渡黄河，同彭德怀一起作战，集中力量在陕北解决胡宗南集团，这时，重新作了部署，原因有两点：

一是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人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揭开了向中原地区进攻的序幕；7月10日，华东野战军陈、粟大军也在鲁西南转入进攻，准备向豫皖苏展开。所以中央当机立断，商定陈、谢兵团改为南渡黄河，挺进豫西，造成三路大军南下经略中原的新局面。

二是胡宗南进占延安后，陕甘宁边区地域缩小，会议据此商定由贺老总以联防军司令身份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的后方工作，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同时，毛主席又同意彭德怀的建议，在西北野战兵团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彭为书记。7月31日，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兵团正式定名为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彭德怀同志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前委书记。这时，我才领悟到毛主席让我送信给彭总，是为了酝酿新的战略部署和工作格局的安排，所以彭总要说一个韩信，一个萧何。西北野战军的部队原来大多是贺老总带领的，彭老总没有直接指挥过，像这样地调整指挥关系，在旧军队中简直难以想像。但他们处理得很顺当。半年后，毛主席对彭、贺说：你们前后方团结合作得很好。

人民解放军由内线作战转向外线作战，是我军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所以，在小河会议上毛主席第一次提出：对蒋介石的斗争从1947年算起，可以用五年时间来解决，但不要对外宣布，还是准备长期作战，5年到10年，甚至15年。为了支持长期战争，必须抓紧土地改革。不搞土改，就失去农民。失去了农民，就失去了战争。

毛主席去苏联会见斯大林为什么后来又拖下来了呢？这件事在会上没有透露。以后我才知道，斯大林接到毛主席准备访苏的电报后，在复电中先是表示同意，说如果你认为需

要这样做，那么我们觉得最好是取道哈尔滨，需要的话我们将派飞机去接。但同时又说：鉴于目前的战事，鉴于你离开岗位可能对战事有不利影响，我们认为还是推迟为好。因为斯大林有这样的主张，毛主席就推迟了行期，到1948年中央转移到河北城南庄时才又有去苏联的准备。

小河会议后，为了策应陈、谢兵团南渡黄河向豫西挺进，中央决定西北野战军攻打榆林，吸引胡宗南部北上。我便离开小河，返回三交镇。8月21日，陈、谢兵团开始渡河，第二天晚20时，大军8万人乘黑夜在晋豫交界处西侧强渡黄河，切断陇海路，东进洛阳，西叩潼关，依托伏牛山在豫西展开。毛主席电告各地：今后4个月，“将是敌我两军转变形势的关键，务望各同志齐心协力，争取胜利。”5天以后，捷报传来，刘、邓大军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区，胜利完成千里跃进的任务。

我离开三交将近两个月，回到驻地时，剑英同志还在西柏坡参加土地会议。在陕北期间，特别是通过小河会议，我更多地了解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全局和胜利的前途，党中央五年解决对蒋介石斗争的战略意图和全党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要求。这些精神传达给同志们，大家精神更加振奋。

这一年，晋绥地区遭灾，收成不好。中央特别注意到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后方统一后，晋绥的负担加重了。在“后委”做预算时，恩来和弼时同志电示：“后委”经费不足部分，原则上不多麻烦晋绥，12月及明年1月两个月的经费不足部分由供给部自筹补贴。但供给制度不变动，力求节省。这是中央对地方的体谅。为了渡过困难，大家能够节省的钱决不多花一文，生活很艰苦，吃的是豆豆饭（又叫钱钱饭）、山药



后方工作委员会工作人员合影

蛋，好一点的是饴饴、小米焖饭。年底，陈毅同志去陕北出席中央的会议，经过三交，我们焖了小米饭招待他。他说：嘿！老杨啊！你给点好东西吃呀，你这个东西不像话！我说：“按说，该宰个羊子给你打‘牙祭’，可那得花钱买。我只有这个。就这小米焖饭，你不来我们也不常吃！以后补吧。”可见那时实在困难。

但就在这种困难的条件下，我们接到弼时同志给剑英同志和我的亲笔信：说一部分身体病弱的电讯业务人员及少数体弱的基层干部，应发给特别健康补助费，“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并规定在三交的电台人员从12月份起每人每月补助3斤猪肉，并轮流休息，二局、三局与机要处应一并考虑。这是中央对坚持工作奋不顾身的“后委”工作人员的肯定和慰问。这种鼓励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

1948年1月20日，剑英同志和我接到恩来和弼时同志来电：中央“后委”的迁移，按计划将在3月中旬开始行动。这表明中央和毛主席即将离开陕北向河北东进，表明我们在解决蒋介石的斗争中又跃进了一大步。于是，我们在早春天气中着手第二次“大搬家”。

（责任编辑 程 度）

（《杨尚昆回忆录》，即将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本文是该书的第十二章。有删节）



# 朱总司令三次保我渡难关

● 欧阳毅

我长期在朱总司令手下工作，在艰难漫长的革命道路上，与总司令结下了深厚的友情。我耳闻目睹了他处理几件重大历史事件的非凡表现。深为他的“临大节而不辱，度量海如海”的胸怀和情操所感动，尤其使我铭刻难忘的是，在我一生中最困难的时候，朱总司令挺身而出，连续三次保护了我。

第一次保我是在1935年6月。当时我们红一方面军五军团翻越长征路上的第一座雪山——夹金山，在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的九军部队会师了。

经过艰苦的转战和长途的跋涉，两支英雄的队伍终于会师。这给全军上下带来无比的欢欣和振奋。

那时候，我担任五军团保卫局长。五军团和九军驻地紧挨着，经常组织联欢，交流战斗经验，互学互访，开展体育竞赛。特别是五军团经过长期有耗无补的艰苦转战，物资十分缺乏，九军便主动给我们送来食品和服装。五军团也回赠一些枪支弹药给九军。那种亲密无间、团结合作的战友情谊，使大家深受感动与鼓舞。

但是，好景不长。在继续北上的途中，两支兄弟部队的关系突然冷淡下来，不时发生一些令人痛心的磨擦。开始我们都迷惑不解，后来才知道是张国焘捣鬼。我亲身经历的就有这样几件事：

一是迫害胡底同志。胡底同志和我很熟悉，曾在中央政治保卫处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时共过事。他在上海搞过保卫党中央的地下工作，工作很有经验，贡献很大。长征路上，胡底同志担任总部的侦察科长。过草地时，他把对张国焘不满的话骂了出来，有人打了小



欧阳毅

报告，张国焘便下令撤销了他的职务。他大病后身体虚弱，天天掉队。五军团担任全军的后卫，经常收容他。我看他很狼狈，就决定把他留在我们保卫局同我们一起行动，以便照应和保护他。谁知有一天我去军团部开会，胡底竟被张国焘下令抓走了。

第二件事是胡底被害不久，朱总司令亲自给我写信，要我给他调两个警卫员去，使我想到一定是总司令的安全受到了威胁。我虽然及时选了两名最可靠的同志去，但从此朱总司令的安全更使我担心了。

第三件事是部队到阿坝后，张国焘在喇嘛庙召开会议，说要反对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右倾逃跑主义。他们要朱总司令表态，朱总司令明确地说：“北上是正确的，南下是不对的！”张国焘的追随者要赶他走，他又严正地说：“我是党中央派来工作的！”朱总司令为了红四方面军和一方面军五、九军团的广大指战员，还为了说服张国焘执行党中央的北上方针，在严峻的形势下，坚持留在左路军，跟张国焘开展大智大勇、有理有节的斗争。

与我直接有关的是处理所谓“叛逃”事件。在南下途中，有一天，总部来电话说，五军团有一股30余人的“反革命武装”骚扰老百姓，企图叛逃，现已被四方面军九军部队抓住，叫五军团派人去处理。军团长和政委叫我去处理此事。他们向我交待时说了几句话：“坚持原则，但要注意方式，讲求团结。”我接受任务后分析：我对自己部队心中是有数的，很可能是些落伍掉队人员，决不会是什么“反革命武装”。于是我便通知各部队将行军掉队人员的名单报上来。结果统计出来，约

30余人,刚好是一个排。我和部队同志带着这些名单来到总部,向朱总司令作了汇报。总司令很同意我的分析。我提出:“是否总部也派一位同志一起去?”总司令同意了,当即派总部的秘书长刘少文同我们一起去四方面军的九军处理这桩纠纷。

我们来到九军,跟军政治部王主任洽谈。王主任说要审判这些被关押的“反革命”。我要求先找几个人了解一下情况。一对姓名,果然是我掌握的掉队落伍人员。他们都声明没有干反革命的事。王主任发火了,拍着桌子说:“我亲眼看到你们抢老百姓。”一位江西老表委屈地说:“我们没抢老百姓的东西。”

王主任又要发火,我委婉地说:“王主任,我经过调查,这些人是掉队的,可能有违反群众纪律的事,那是我们教育不够。”王主任一听又憋不住了:“我亲眼看到他们抢,不是反革命是什么?”

正在不可开交时,楼下吵吵闹闹。王主任下楼去了。我们也跟了下去。只听一个人在哭哭啼啼地告状说,五军团的人打了他。王主任骂起来了:“要打就打嘛,谁怕谁呀!”我小声说:“王主任,你别激动,我们调查一下,行吗?”他转身问那位哭鼻子的战士:“同志,哪个打了你?”战士抽抽噎噎地回答:“五军团无线电台的。”我问:“他们背的什么枪呀?”战士说:“几十条驳壳枪。”我说:“同志,你是不是搞错了吧?我们电台只有台长、政委才背驳壳枪。”我又对王主任说:“王主任,你再调查一下,如果是我们的人打了人,绝对不允许,一定严肃处理。”王主任听了气冲冲的,不予理睬。

我们只好告辞,回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我们回到总部,到处找不到总司令,有人悄悄告诉我们:“朱老总正在喇嘛庙被人‘围攻’呢!”我们刚踏进喇嘛庙,先到一步的王主任就指着我向副总指挥说:“这就是我讲的五军团的保卫局长欧阳毅!”

副总指挥气冲冲地指着我的鼻子:“你欧阳毅,好大胆子!你反革命,假革命,你光会说漂亮话,你五军团不听指挥,我来指挥你!总部不处理你,我们纵队司令部来处理你!”说着他竟掏出手枪,还上了子弹。

我看见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就坐在一个角落里。我没有吭声,极力克制自己。朱老总见副总指挥掏了枪,霍地站起身来,大声质问:“这是干什么?”一面叫我的名字招呼我过去。我赶紧走过去,向总司令敬了个礼,在他身旁坐下了。副总指挥这时态度才收



初到陕北时的朱德

敛一些,把枪收了起来。

后来我总想,当时若不是总司令挺身而出保我,我就“早见马克思了。”而那时,正是朱总司令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完全忘记个人的安危来保护他的一个部下,使我终生难忘。

总司令第二次保我是在延安。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失败以后,几万红军战死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红军干部游击支队被敌人袭击打散,我在祁连山只好沿途乞讨,化装卖字,历尽艰险回到了延安。

一天,我和张际春在延安街头散步,从边区政府的布告上知道张国焘又当了边区副主席,一股怒火上来脱口骂了一句。张际春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刚从西路军回来,憎恨张国焘的心情可以理解。你在四方面军的表现,你对张国焘路线的态度,很多人也都清楚。不过有的人对你也有些流言。”我再三追问有什么流言,他才说:“有的人说,在张国焘手下时候,胡底被杀害了,欧阳毅却当了官!”

针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说法,我决定向中央组织部反映情况。我同李富春部长谈了三个半天。他听得非常

认真,也很耐心。之后,他把负责审查西路军回来的干部的边区政府保安处长周兴和副处长许建国找来,对他们说:“你们掌握欧阳毅同志什么材料?有什么问题当面说清。”周兴说:“没有什么材料,只是些同志不负责任的传言。”

李富春同志说:“没有材料乱传是不允许的,对党对同志要负责任。组织上对一个同志没根据地怀疑也是不允许的!”

李富春同志查清了这件事,我很高兴。接着,我就向李富春提出进抗大学习的请求。他同意了,当时就提笔给抗大教育长罗瑞卿写了封介绍信。信中说:“经各方面调查,欧阳毅同志是我们党的好同志,是难得的一个干部,是拥护党中央的,反对张国焘的。他请求到抗大学习,请你接待。”李富春同志把信写好给我看,这封信等于给我作了结论。让我带给罗瑞卿同志,也是他对我的信任。

没想到我来到抗大不久,正赶上批判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陈昌浩。我所在的二大队四队(高干队)的党支部派我作为代表上台发言。我刚讲了几分钟,主持会的负责同志摇了铃。我一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回头一看,他说:“欧阳毅同志,你先不要批判别人,还是讲自己的问题。”

“我有什么问题?”我看了他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主持会的同志又摇了第二次铃,我只好停止了发言,懊丧地走下台来。

大会结束时,主持会的同志又宣布:“欧阳毅同志的问题,回到支部去解决!”

之后,我所在的支部就在窑洞外面摆开了阵势,一连斗了几次。他们认为我能说会道,不好对付,特别请了党总支委员“张博士”来担任主攻。“张博士”是留苏回来的,懂得理论。他一上来就给我上两条纲:“你是小资产阶级出身,必然有动摇性;你有实际工作经验,我们承认。但是,你的实际工作经验是为张国焘路线服务的。”最后,给我戴上一顶大帽子:“可耻的国焘路线者”。

我越听越憋气,党内怎么这么干呢?为什么不事先公开谈谈,一下子就拉开敌我斗争的架势?当时,我采取了针锋相对的对策,对“张博士”的“批判”逐条进行了有力的批驳,“张博士”听了哑口无言。

后来党支部写了报告给党总支,下的结论还是

“可耻的国焘路线者”,并建议给我处分。

不久,政治部副主任、党总支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不要以为路线斗争不给处分,我们组织上有能力有办法把问题搞清楚,到那时,就不是给不给处分的问题,而是要加倍处分。”我说:“只要组织上查到我有半句话、半件事是反对党中央、拥护张国焘的,我接受任何处分。”谈话就此结束。

不久,没等我毕业,组织上就分配我任抗大总校秘书长。

1938年2月,受中共中央委派,谭政、罗瑞卿、张爱萍和我代表八路军赴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到武汉后,周恩来副主席召集我们四人确定谭政以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罗瑞卿以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主任、张爱萍以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我以八路军一二〇师政治部副主任的身份参加会议。

从武汉开会回来,我又积极投入到工作中去。除担任行政工作外,还给学员讲中国革命问题。

我总以为原来我的那个“张国焘路线”问题,已不了了之。但事情并未了结,一天,我有事到教育长的办公室去,桌子上放着一份文件。他见我进来,赶快把文件收藏起来。这引起我的怀疑,原来他们还是把我作为一个有问题的人对待。

我决定给毛主席写信申诉。信发出不几天,正值抗大三周年纪念日,前来参加庆祝大会的毛主席看见我说:“欧阳毅同志,看到你的信,我给你写了回信,叫徐日文同志转给你,收到没有?”我没有想到毛主席工作这样繁忙,会这样快亲自给我写回信,便激动地说:“主席,我还没有收到哩。”

不久,总政主任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召开会议为我的问题做出结论:“欧阳毅同志在五军团任保卫局长期间,立场鲜明,拥护党中央,反对张国焘,但是调四方面军工作后,因处境恶劣,不敢表明自己的态度,模糊了自己的立场。”

对于这个结论我是不同意的。我认为说我“模糊了自己的立场”不符合实际。

这个留“尾巴”的结论发给我后,我拿给罗瑞卿同志看,我说:“结论的后半部分我不能同意,我保留意见!”罗瑞卿劝我说:“说你模糊了立场,不等于说你动摇。你可以保留意见,以后再说。现在我们要准备上前方了。”

1939年7月,我随抗大由延安开赴前方。1940年底,我因患肺结核等病,从前方回到延安治疗。一天下午,我到杨家岭去看望朱总司令。忽见毛主席那高大魁梧的身影从窑洞前经过,我动了见毛主席的念头。可巧这时,毛主席的秘书走来,我便向他说明情况,而后写了一封简便的信,请他呈毛主席。没想到毛主席马上就派人来叫我了。

我怀着喜悦的心情来到毛主席的窑洞。毛主席知道我回延安来治病,问过病情之后,立即转换话题问到我对历史结论的意见。

毛主席听了我的申诉后说:“要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我赞成你重新写个报告,提出自己的意见,政治上的是非应该搞清楚。”

第二天,我又去看朱总司令,并说对我审查结论的事。朱总司令说:“我在前方时曾听说你在延安被批斗的事,后来你到前方也没有同我谈起嘛!”

朱总司令的这几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是的,我随抗大到晋东南太行山根据地后,曾和罗瑞卿、张际春一起去八路军总部向朱总司令汇报过一次工作。之后,总司令还特地到我们的驻地来看过我。那时,我若同他谈谈个人的事,是有机会的。但是,我考虑当时在前方,战斗频繁,不该因个人的问题,牵扯总司令的精力,所以,我始终没谈。没想到总司令却这样关心我的问题,我不安地说:“我个人的事,太麻烦总司令了。”

朱总司令又说:“现在总政要我写证明,我一定要写。但只写证明不够,我还要建议总政党务委员会开会,我亲自去参加。”说到这里,总司令突然站起来,神情严肃地说:“你在四方面军工作时的表现是很坚决的,在那样困难的情况下,我们的同志能够坚持斗争,真不容易呀!什么叫布尔什维克?这就叫布尔什维克嘛!”

多年的战斗生活,已经使我的感情不那么容易激动了。西路军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受到失败时,我没有流过泪;在失败后千里迢迢的讨饭路上,我没有流过泪;回到延安在运动中受到误会挨批斗时,我没有流过泪;因不符事实的结论长时间受委屈时,我也没有流过泪。但是,此时此刻,面对着朱总司令慈父般的关怀,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泪水簌簌地落下来。

总政党务委员会在朱总司令的建议下,于1941年

2月8日召开了会议,朱总司令果然来参加了。会议听取了我的申诉,朱总司令介绍了我在四方面军的表现,其他同志也都发了言。终于,组织上为我作出了实事求是的结论:欧阳毅同志在四方面军工作的整个过程立场是明显的,是拥护党中央路线,反对张国焘路线的。1939年6月对欧阳毅同志的决定与事实不符,因此特将该决定予以取消。

由于朱总司令这种对党对同志高度负责的态度,才抹掉了强加于我结论上的那个糟糕的“尾巴”,不然,我将背着那个尾巴委屈终生。

总司令第三次保我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的事情本来在建国前早已了结,但是到了“文化大革命”的1967年,又被林彪一伙重新翻腾出来,歪曲、颠倒得面目全非。

“文革”开始时,因我对吴法宪一伙的错误做法不满,激怒了“四大金刚”,他们要在我身上大做文章。林彪死党李作鹏直接掌握我的“专案”,把专案列在“中央二办”。炮兵中紧跟林彪一伙的人指示专案组设计“罪证”:一是“反林彪、反三军党委”;二是“追随罗瑞卿,为罗瑞卿开脱罪责”。这两条“罪状”似乎还不够,后又给戴了历史的、现行的四大帽子:“张国焘的黑干将”、“谋杀胡底同志的重大嫌疑犯”、“西路军失败后被捕入狱,有自首变节的重大嫌疑”、“吴克华伸进石油部的黑手”,“‘五一六’的黑后台”等。他们为了索取“罪证”,跑了十多个省市,查阅了五万五千余卷敌伪档案,调查了近千名原红军人员和敌伪人员。

他们也向朱总司令作了调查。1967年11月17日总司令写的证明材料,斩钉截铁地说:“一、欧阳毅在四方面军的整个过程是站在拥护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边,反对张国焘路线的。二、张国焘为了控制五军团,派其亲信黄超夺了原五军团保卫局长欧阳毅的权,后来总司令部(当时兼四方面军司令部)一局缺人,我们就把欧(阳毅)调一局工作。三、欧(阳毅)和胡底同志是站在同一条路线上的。四、张国焘是个卑鄙的机会主义者,他常以‘叛变’加罪于拥护毛主席、党中央的同志,以‘失踪’来掩盖他杀害好同志的罪行。此外还挑动某些士兵之间的武斗。欧阳毅所举三件事均属事实,第三件还是我亲自处理的。五、1941年关于欧(阳毅)的决定是根据上述事实和他的表现作出的。”

# 我所经历的真理标准讨论

● 吴江

编者按：肇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胡耀邦主持中央党校期间发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促进了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拨乱反正准备了思想条件。记述这一大讨论的文章，不仅引起报刊读者的兴趣，更为史家和党务工作者所关注。讨论期间时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务委员会成员、副教育长兼哲学教研室和理论研究室主任的吴江，是这场讨论的具体组织者之一。记述这场讨论的文章已不少，吴在耄耋之年，本着为历史留下点记录的心情，写下了这篇文章并交本刊发表。这是我们很高兴的事，想来也一定会得到读者的欢迎。

“文化大革命”中，朱总司令的处境恶劣，林彪、江青一伙处心积虑要打倒他这个“黑司令”。但总司令毫无所惧，泰然处之，仍然对党对同志负责，为他的部下写了这有力的证明。

1968年2月下旬，我爱人陈珉向毛主席写信反映林彪一伙迫害我的情况。3月2日毛主席批给林彪：“查明处理。”林彪一伙不但不检查错误，相反，更进一步地对我进行迫害：“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隔离反省。”此后，我就一直在武装看押中。

1971年9月林彪摔死，1972年初陈珉被“解放”回来，但不知我被关在何处。她给康克清并朱总司令写了一封信，反映我被迫害的情况。康克清回信安慰她，并说：“朱老总把信转给周总理了。”

1972年4月初，我由郑州回到了家里，“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我从电视屏幕上看到了朱总司令。心潮如涌，觉得有许多话要向他老人家说，马上提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总司令：我已经回家了，戴上了领章、帽徽。我很想见到你，但不知你住在哪里……”信当天发出，5月3日下午，总司令就派车来接我了。我和爱人激动得热泪盈眶，一路上竟说不出一句话。

朱总司令和康克清在家里接待了我们。劫后重逢，倍感亲切。朱总司令关切地问我，这几年是怎么过的？恢复党组织生活没有？工资是否已经补发？他安慰我说：“别性急，这些问题迟早都会解决的。”还特意嘱咐我：“要把身体养好，千万别太激动，别受刺激！现在没有汽车不要紧，可以走路，可以坐地铁，坐公共汽车，到各处转转、看看，这样既锻炼身体，又接近群众。”

那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谈了许多话，后来我们怕影响总司令休息，才告辞回来，以后，我们又多次看望总司令和康克清。每次去，都受到很大教育。有次我们和康克清谈到林彪过去在“七千人大会”上攻击谩骂总司令的事。那时就可以看出林彪有野心，实际上他是想把总司令打倒，自己取而代之。康克清说，她听文件传达后回来告诉朱老总，总司令竟摆手不愿听。我们听到此，感到总司令太伟大了。确实，对待林彪那样的小人攻击，是不值得理会的。

1975年我们再次去看总司令时，见到卧室墙壁上贴了他书写的“革命到底”四个大字。这确实是总司令光辉革命一生的真实写照。

（全文近两万字，本文为本刊编辑部删节）

（责任编辑 程 度）



## 一、问题的提出

“文革”结束后我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党校工作。1977年9月中央党校复校开课时,我任哲学教研室主任。党校校长和第一副校长暂由华国锋和汪东兴两人兼任,但主持全部日常工作者为副校长胡耀邦。课程安排,第一是哲学课程。课程结束时我作专题报告,时值1977年9月底。这是我第一次登上中央党校讲台。我的报告着重讲两条战线斗争问题,即既反对右,也反对“左”。为什么呢?因为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反右,不准反“左”,说社会主义时期只有右的错误而没有“左”的错误。在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头脑中,只有“两条路线斗争”的概念,没有“两条战线斗争”的概念。“十一大”仍然如此,把林彪、“四人帮”的路线说成是极右或形“左”实右或假“左”实右。总之,人们不知道“左”为何物,谈“左”成为最大的政治禁忌。我的这个报告是事先经过以胡耀邦为首的校党委(当时还没有校委会)审定的。

我的报告无非是为打破上述的政治禁忌。报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讲“两条路线”和“两条战线”的关系。说明错误路线或执行路线的偏差,往往表现为两种倾向,不是右,就是“左”。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反对这两种倾向的斗争,就是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二部分是批判“四人帮”的实用主义哲学。我把“四人帮”的哲学归之于实用主义。这里,我讲到确定路线方针是非的标准。究竟是实践标准还是权力标准或其他什么标准。原文如下:

“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证明路线的正确与否,即它是否具有客观真理性,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它不可能完全在理论范围内解决,而要从社会实践的结果来证明,看它是否对发展生产力有利,是否为社会主义、为人民群众带来了实际利益。实践标准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林彪也好,‘四人帮’也好,他们把实践标准践踏得一钱不值,自己另立一个标准,就是权力标准。谁在台

上,谁有权,谁就有正确路线,谁就有马克思主义。官越大,权力越大,路线的正确性越大,马克思主义也越多。这可以说是一种权力拜物教。”

这个报告的“两条战线”部分首先摘要发表在《理论动态》上,“实用主义”部分省略掉了,因为《理论动态》篇幅有限制。以《哲学上两条战线的斗争》为题的整个报告于1977年11月送《哲学研究》杂志,该杂志发表于1978年2月初出版的1—2期合刊上;关于上述真理标准那段文字后来还见之于1978年4月3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我的另一篇文章《林彪、“四人帮”实用主义哲学批判》一文。

1977年11月的党史课程,我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布置,胡耀邦又着重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

我注意到,1978年上半年报纸上有的文章也开始提出实践标准的问题来。“文革”后首先由哲学界提出这个问题来是很自然的。党校讲台的特点是能够迅速地将这类观点传播到全国各地的实际工作中去,对实际工作产生影响。

## 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发起

中央党校复校后,胡耀邦亲手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小刊物,不必说对当时的拨乱反正是起了重大作用的。这个刊物一开始就由胡耀邦亲自抓、亲自出题并修改定稿,毫不含糊,花了很大精力。奉命写稿的多是几位青年同志。1977年底,胡耀邦调中央组织部工作,但仍兼任党校主要日常工作。胡耀邦将主要精力转到中组部之后,仍没有放下《理论动态》这个小刊物。他临走时特设了一个“理论研究室”,将《理论动态》的编辑工作交给这个研究室,作为其主要任务。研究室主任由我兼任。

大概是为了表示“拜托”之意吧,胡耀邦特地邀我到他家中吃饭。我向他表示:我当尽力而为,但这件事非我之力所能胜任,所以今

后《理论动态》的选题及最后审稿仍照旧,请耀邦同志定。胡点头,只说了一句:“我相信你们能够办好。”接着就谈1978年春节后第二期教学问题。

理论研究室的组织短小精悍,只设《理论动态》组(组长孟凡)、研究组(组长孙长江)、外文资料组三个组。两位副主任:一位是原校刊组(即胡耀邦原用以编辑《理论动态》的那个组)组长,一位是从哲学教研室调来的。(胡耀邦于1982年4月卸任党校而由王震接任,我亦于1982年调离党校。此后《理论动态》情况及其组织形式,我就不清楚了。)这时的哲学教研室除确定每期的教学内容,日常工作已可由两位副主任照顾,因此我的办公室就搬到理论研究室去了,我所关心的也是《理论动态》这个刊物能否照原样办下去。这时《理论动态》的题目仍争取由耀邦出,我也提出一些题目,文章由我修改定稿,然后送胡耀邦最后审定。在一个很长时期内,除少数稿件外,我仍坚持由胡终审,尽量不自作主张,以减少错误。这期间耀邦对全体同志仍不时作批示或提醒注意某些问题。

《理论动态》点燃起关于真理标准讨论之火,有些偶然性。前面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问题,1977年9月和11月,在中央党校的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已经提出讨论。其后,在有的报刊上也提出了这个问题。党校的哲学课程提出这个问题是基于下述的理由:“文革”把一切都搞乱了,按照什么来判别是非功过,提一个什么标准呢?以语录为标准?以权力为标准?还是以派别为标准?“文革”通行这三条标准,结果越搞越乱,越搞是非越颠倒。甚至到了1977年还发生过这样一件怪事:为了推翻关于教育工作的两个错误估计,竟非用迟群(“四人帮”的属下)笔记本上两条来历不明的“语录”不可,否则就好像没有推翻的理由。这实在是一种怪现象,如果没有那两条“语录”怎么办呢?难道明明白白地摆在眼前的事实就不算数吗?党史的是非标准也是这样。

提出实践标准问题来,并不是我们的创

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也可说是常识,《实践论》讲得很清楚。这条原则毛泽东在50年代末又提到过一次。1957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外宾时谈到对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的看法,他说:“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的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说明。”这段话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当时正是“大跃进”刚要开始的时候,因此我对此印象十分深刻。正因为这样,我们虽知道实践标准和“两个凡是”是对立的,但相信提出这个原则问题来任何人都没有反对的理由,何况邓小平已经正式向中央表明“两个凡是”的提法不妥。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1期几百名高中级干部加上理论班100多学员讨论了这个问题,大家对于这条原则没有提出异议,当然在联系实际时糊涂观念还是不少的。第2期、第3期继续讨论。所以,要说提出实践标准的影响,在后来所写的两篇文章之前,已经通过几千名高中级干部在全国扩散开去了。

党校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究竟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诸如此类。我和当时担任理论研究室研究组组长的孙长江同志谈起这个问题,他自告奋勇愿意为《理论动态》写一篇文章,澄清一些糊涂认识,发给学员参考。我同意了,题目就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大概是1978年2、3月间的事。起草过程中,曾在中央党校第一期学习过的《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送给我一篇他亲自组织来的谈实践标准的稿件,题目是《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作者是南京大学哲学教师胡福明。《光明日报》重视这篇文章,在杨西光主持下精心修改多次。杨送来这篇稿件的原因,意在得到《理论动态》的支持,首先在《理论动态》刊载,然后再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我看了来稿,觉得文章写得还是有勇气的,只是理论和逻辑性不足。我将来稿交给孙长江一并处理,请他与他正在起草的文章捏在一起,题

目还是用我们原定的。文章最后由我修改定稿后于4月27日送胡耀邦和有关同志审阅。因为这篇文章的处理既未经过《理论动态》组,事前亦未向胡耀邦报告,所以我特地在电话上向胡耀邦说明这篇文稿的来历及意图。如前所述,在党校,这已不是一件新鲜事。胡画圈表示同意并退回,未作修改。文章就在1978年5月10日出版的《理论动态》上发表了。第二天即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人民日报》转载。

这篇文章的发表,竟然引起一场大讨论,是我们始料所不及的,这可说是一种偶然性。当然,偶然性后面总隐藏着必然性:两条思想路线的分歧既然存在,争论或迟或早要发生,不是发生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发生在那个问题上。这场争论由这篇文章引起,公平地说,首先对文章提出指责的吴冷西同志(“毛办成员”)有功劳,当时如果没有吴冷西同志对这篇文章的指责,正像当时于光远同志告诉我的: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吴冷西同志并不像于光远那样浏览一下就放下,我想这也不奇怪,因为他是“毛办”成员,与提出“两个凡是”有关,因此他对这个问题有高度的敏感。

吴冷西当天晚上(5月12日晚11点)就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打电话(吴冷西“文革”前是《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是他的副手之一),提出严厉的指责。指责的具体措辞究竟如何,胡绩伟和吴冷西两人说法不一,但这一点并不重要。根据胡绩伟当时的电话记录稿,吴冷西说了这篇文章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和“哲学上否认相对真理”等话;而根据吴后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声明,他说他只说过这篇文章提倡怀疑一切、不可知论,否认真理的相对性,在理论上是错误的;说过这篇文章的基本倾向是要修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会使读者提出究竟是砍旗还是举旗,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坏的反应;并说文章是批判教条主义而不是批判修正主义

(即他认为当时仍应当批判修正主义,而不应当批判教条主义——作者注),因此方向偏了,如此等等。

但问题并不限于吴、胡个人之间。看来,吴是代表当时的意识形态领导机构说话。因为紧接着,当时主管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人汪东兴同志于6月15日召开了中央宣传部和中央直属新闻单位负责人的紧急会议,专门批评实践标准这篇文章,还批评《人民日报》发表的另一篇谈按劳分配问题的文章,并提出防范措施。汪批评这个时期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说:“特约,是谁嘛?不知道。这些特约评论员文章有问题。”因为《人民日报》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所以他特别批评《人民日报》“没有党性”、“没有把好关”,今后不能随便发这类文章,特别是“特约评论员”的文章。

对于实践标准这篇文章,当时的党主席也亲自向胡耀邦点了有关人士的名。

还有这时的社会科学院院长,在社会科学院召开的一次大会上,也提出了指责,说如果认为中央领导在真理标准问题上有分歧,那就是分裂党中央。

形势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尽管当时尚限于上层内部)。有一点很清楚,思想路线的分歧也就是政治路线的分歧。在当时的高压之下,已是一片鸦雀无声。有人已经开始作沉痛检查。形势确实是严峻的,我感到周围空气沉重。怎么办?问题由我们发表文章引起。如果对于当时的严重指责保持沉默,那就是表示我们已屈服,无理可说。而这样一来,真理标准讨论势必夭折,我们也将承担严重罪名,“两个凡是”的势力将更为猖獗,我们的处境将更加困难。但如果提出反驳,倘局势依旧,其后果也难以设想。

我对此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决定撰文作出正面回答,据理驳斥。等待适当时机并用适当方式刊出。那就是6月24日(离宣传系统会议不到十天)发表在《解放军报》上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考虑到胡耀邦当时的为难处境,他的两个顶头上司已经向他发出责难,因此起草这篇文章我没有事先

向他报告,但将所写的第一次稿送给他,他叫秘书给我打电话,只交代一句:“等三个月以后再说。”我理解他的态度,作为一个高级领导人,总不能不照顾起码的组织原则;但我觉得已经不能再等待下去了。为了不再给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添上麻烦,至少在形式上摆脱胡耀邦与这篇文章的干系,最后的定稿就未送胡过目,如何处理亦未向胡请示。当时帮助撰写这篇文章的只有孙长江一人。

文章为什么拿到《解放军报》去发表呢?这是因为当时《理论动态》已不可能刊登这篇文章了;宣传系统下达禁令后,《光明日报》、《人民日报》也都不可能刊登这类文章。那时军队刚召开过全军政治工作会议,《解放军报》刊登了邓小平在会上的重要讲话,而这个讲话正是同“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我忽然想起这正是一个适当的时机,也是较适当的方式——求助于《解放军报》。刚巧我那时正与《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有联系,我备了一封信,将文章送给他,也是抱试一试的态度。不想《解放军报》总编辑华楠和副总编辑姚远方表示完全赞成这篇文章的观点,答应刊登(华楠同志为什么当时同意刊载这篇文章,后来他也有文章说明)。我提议不用我个人名义而用“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以加重文章的分量,他们也同意,这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刊登文章。文章发表的当天,《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均以显著地位转载,新华社也在当天转发(这些报纸负责人之间经过商量的),因此各省市地方报纸也陆续转载。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的是,当我接到第一次发稿清样时,我突然想起,建议将文章送请当时任中央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过目(罗瑞卿将军我在50年代华北局的会议上见过他)。我此举自然是想寻求支持,但我没有想到罗瑞卿同志竟如此认真,他不仅表示支持,并通过编辑部口头向我建议作两处重要增补:一是多介绍《实践论》的思想,二是再援引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中的一段重要文字。我都照办了。下面的事也是确凿的,即

罗曾为这篇文章直接同胡耀邦通过几次电话,表示对这场斗争的支持。文章发表后不久,罗出国治病,临行时还留下一句话,说这篇文章如果打屁股的话,他愿意领受40大板。这位文武兼备的将军(他是解放军十员大将之一)在这场结局尚未明朗的斗争中所给予我们的支持,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不幸,不久他竟因病永远离开了我们。

毫无疑问,这篇文章是在《解放军报》的严正支持下,突破了当时对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压制与封锁,并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人的注意。据我所知,小平同志也是在看了这篇文章之后才注意到这场争论的。

有两件事我认为需要记录在案:一是,文章发表的当天,×××匆匆忙忙赶到胡耀邦家里,说这篇文章是表示我们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他对此表示遗憾。另一件,是胡绩伟有一次到医院去看望指责他的吴冷西同志,吴对他说:我看了《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更认为我那天晚上在电话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

如果说,第一篇文章还只是在中央内部不大范围内引起争执,那末,第二篇文章在中央各报和几乎所有各省市报纸刊载后,诚如×××所说,是把这场内部争论公开化了。也就是将党内分歧公开化了。争论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地、十分引人注目地展开了。

1978年7、8、9、10这4个月当中,大多数地方,包括军队,都对这场争论或先或后地作出了反应,公开地表明了态度。这样的事在党的历史上还是少见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应,据我推测,大概是因为人们把这篇文章同邓小平6月2日在中央军委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联系起来的缘故。通常在这样的时刻,政治人物的头脑往往是很敏感的。

不久以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真理标准讨论的评价,是大家都知道的,这里就不多说了。

真理标准的讨论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8年5月开始,到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场讨论作出了肯定的评价;第二阶段

是召开理论工作务虚会，集中北京的和各省市的理论工作者和宣传部共四、五百人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前后共历时三个多月（从1979年1月18日至1979年4月初）；这是在中央直接领导下讨论这个问题，是讨论的重头戏。第三阶段是1979年7月开始的真理标准讨论补课。这里因故略掉理论工作务虚会的讨论，只记第三阶段的“补课”。总而言之，争论并未因两篇文章的发表而停止，相反，真正的争论还在其后呢！

### 三、真理标准讨论“补课”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甚至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关“两个凡是”的争论并没有结束，局势并没有完全明朗化，但真理标准的讨论却中断了，“凡是”势力乘机反扑，理论工作务虚会成了一些人攻击诽谤的目标。社会上盛传三中全会犯了右倾修正主义的错误，有人公然说今后必须继续反右。有些地方又重提“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有人认为批判“凡是”就是同中央“分道扬镳”，个别部门甚至发生反攻倒算行为。

现在国内外传播的一些有关书籍和文章，当谈到真理标准讨论时，好像认为只是关于真理标准的一、两篇文章就解决了问题，因此只限于介绍文章的写作修改过程及细节，不了解这场讨论的全过程及其各个重要环节，有的书籍甚至还作了演义式的描写。其实，第一篇文章（即《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只是引起了中央内部的争论，而且处于受压的地位；第二篇文章（即《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虽然把争论公之于全国，引起了全国范围内的讨论，但讨论只限于中央及省市上层，并没有深入到广大干部和群众中去。正因为如此，坚持“两个凡是”的人才敢于在中央工作会议和三中全会上再度挑起争论；而理论工作务虚会实际上只是把这场争论搞得更加尖锐化罢了。

还要请大家注意一件事。理论工作务虚会后，有人提出了“政治上反右，经济上反

‘左’”的口号。“经济上反‘左’，政治上反‘右’”虽然和“两个凡是”不同，但这个口号在当时的出现无形中代表了今后一种有势力的倾向，也反映了党内在改革问题上存在的一种分歧，虽然它一直没有见之于任何中央文件。

1979年下半年，务虚会结束后不久，邓小平赴天津、山东、上海等地考察。他讲了几次话，从思想路线讲到组织路线，重新提出要警惕“两个凡是”。这些讲话后来经过整理集中在《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实现要靠组织路线来保证》一文中。（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90-191页）这篇文章注明是邓小平接见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全体人员时的讲话，其中有这样一些重要的段落：

“就全国范围来说，就大的方面来说，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的争论，已经明确地解决了我们的思想路线。

“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是基本建设，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我们要注意，现在反对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的，还大有人在。他们基本上是执行林彪、‘四人帮’那样一种思想体系，认为中央现在搞的是倒退，是右倾机会主义。他们打着拥护毛泽东同志的旗帜，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孔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些人大体上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来的，是既得利益者，他们感到现在这一套对他们益处不大，所以对过去很留恋。经过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转变过来，但不一定都能转过来。

“1975年我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就说，十年后再看。现在也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我们对林彪、‘四人帮’的影响不能低估，不能想得那么天真了。”

讲话最后提出：“这个争论还没有完成，现在要考虑补课。”

将邓小平当时几次讲话整理成一篇文章并正式公布是后来的事，当时我看到的是从



下面传来的讲话记录，内容大致与后来经过整理的文章相同，只是个别词句删掉了。我将收到的记录送给胡耀邦，请他考虑《理论动态》是否写一篇东西。胡看完记录给我一个电话，要我先到中宣部跟少数人讲一讲关于补课的内容，也可以提出我个人的意见，让大家议一议。

我除照念记录外，对当时面临的情况和补课的内容谈了我的看法。我认为这次补课，或者说继续讨论，重点应当解决领导思想问题，就是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解放思想，旗帜鲜明，端正思想路线首先要端正领导干部和领导机关的思想路线。领导的责任在于通过讨论把全党的思想统一到三中全会的方针上来。我并提出，根据前一段的经验和目前的情况，这次的补课在思想上始终要抓住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弄清楚究竟什么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不能把“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林彪、“四人帮”那一套思想体系记在“毛泽东思想”的名下，要区别真“高举”和假“高举”、真“坚持”和假“坚持”；另一个，就是着重批判林彪、“四人帮”的极“左”思想及帮派组织路线并肃清其流毒，“两个凡是”就是极“左”思想及帮派路线流毒的集中表现。

耀邦要求将这些内容先在党校向全体学

员讲一讲。我照办了。

8月20日左右，中央统战部第一副部长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及秘书长刘澜涛找到我，说中央统战部正在召开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会上暴露出来的糊涂观念和“左”的东西很多，想请我在会上就真理标准问题讲一讲，帮助大家统一思想。我有些迟疑，因为这是中央部门的全国性会议，而我并不了解统战干部思想的深浅。但无法推辞。时间就定在8月23日下午。

报告会由刘澜涛亲自主持，年近九秩的李维汉同志（其时他任中央统战部顾问）也在台上就座，我实在有些过意不去，站起来请他老人家回去休息，我另找时间向他汇报，他不肯，一直坐到终场，可见会议之认真。

会议印发了我的讲话全文，并开了两天小组讨论会，讨论“简报”也送给我一份。我留心翻阅这些“简报”，发觉多数同志赞成，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统战工作大有裨益，目前统战工作的阻力主要是“左”。但也发现了两个问题：

一是，有一位省委统战部长说：“这样重大的讨论，既然在中央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为什么中央没有正式文件或作正式传达，而由中央党校的副教育长出来讲呢？我们那里，

党委从来没有传达过，也没有讨论过。这次回去，说补课重要，如果党委不动，我们统战部门补课是补不起来的。”这个反映很重要，说明虽然三中全会公报鲜明地对真理标准讨论作了“传达”，但有的省委却按兵不动。当然，另一方面也说明这场讨论的方式的特殊性。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三分之一”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补充说几句。我原来收到的小平讲话记录稿，有这样几句话：“利用毛主席的错误，坚持‘两个凡



本文作者吴江近影

是’，即换一个面孔，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这样的人，个别单位竟达到三分之一。这是全国的缩影。”我讲时声明，这是根据别人的记录稿，不是原文。会议印发我的讲话稿，上面明白地有我的声明。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简报”中有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个别单位达到三分之一”的估计是适当的，党内外思想僵化半僵化转不过弯来的人的确相当多；另一种意见则反对“三分之一”的估计，他们撇开个别单位这个词，说全国有三分之一的干部坚持“两个凡是”，这还了得！

我当然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向会议作解释。但是我后来听说，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编写会议简报向中央领导人反映时，把前一种意见略去，只将后一种意见写上，听说小平同志看了有些不悦。后来有一次我请邓力群向党校学员作报告时专门向他声明这件事，他沉默不语。我想，不管怎样，能够引起邓小平的“不悦”，编写会议简报向上反映的人的目的总算达到了。

与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同时，中央组织部也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我又被部长宋任穷邀请于9月6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讲同一个问题，讲话内容基本与上次相同，不过突出了这次小平同志所说的“用人”问题，“现在还有十年后再看”的问题。但这次会议对这个问题究竟如何对待，是否进行了讨论，我就不得而知了。

事后，根据中宣部意见，新华通讯社的《内部参考》（9月27日）刊登了我两次讲话的要点，题为《真理标准讨论补课重点要解决领导思想问题，补课要落到实处》。《内部参考》发至中央各部（包括司局）、各省市、地委（包括县委第一书记），军队则是军师级相应的领导干部。因此，至少可以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应当补课的问题，1979年9、10月间，已经以新华社内参的形式下达全国了。

真理标准讨论补课为真理标准讨论的第三阶段。这一阶段大体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基本结束。这次全会通过了《历史决议》，明确指出有一个“毛泽东晚年错

误”问题；全会同时免去了华国锋同志的党中央主席职务，由胡耀邦接茬。这样，就从思想方面和组织方面撤掉了用以支撑“两个凡是”的支柱。

所谓争论基本结束，就是说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思想路线上的斗争并未因此停止，以后在各种问题上（自然包括改革问题），“凡是”与“实践标准”的争论仍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有人对改革开放路线始终不以为然，他们看到改革开放出现一些问题，如经济秩序混乱，有的环节失控，出现假冒伪劣以及出现腐败现象，因此就在相反意义上举起“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旗帜。

关于真理标准讨论的意义和影响，有些外国评论家倒要比我们有些人看得透彻些。下面举几个例子。例如，英国广播公司记者菲利普·肖特所写《熊与龙——今日中苏内幕》一书（1982年），其中说到：“《人民日报》把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成中国现代史上三大运动之一，与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并列。苏共二十大后，却提不出类似的口号来。”

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曾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顾问）奥克森柏格，在美国1985年7月出版的《知识分子》季刊，撰文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实事求是这两句话，不仅是政治口号，而且反映了中国领导人企图改变决策过程的决心。”

更值得注意的还是新加坡《联合早报》于1986年1月1日发表的《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意义与国际影响》一文，这篇文章说了这样一段话：“贯穿着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上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使改革领袖可以放手采用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的束缚。”

（作者注：文章摘自旧作，有些内容作了节删）

2001年7月

（责任编辑 洛松）

#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 宋廷章

蒋南翔从“一二·九”运动开始,主要从事青年运动和教育工作。多数时间同知识分子打交道,在许多场合都能替知识分子说话。

## 在延安敢于批判搞极“左”的康生

延安整风运动后期,由康生制造的“抢救失足者”运动,造成大批的冤假错案。主持中央青委机关工作的蒋南翔,在1945年春季向党中央提出了一个2万多字的《关于抢救运动意见书》,他在意见书中说:“抢救运动——这种没有确实把握的发动全面的短促突击的反特斗争,我以为并不是整风运动值得保留的组成部分。”“这种不分青红皂白千篇一律的‘反特’斗争,至少在青委所获得的不是任何积极的效果,只是相当严重的损害。”“那种叫嚣鼓噪的空气,那种如醉如狂的情绪,那种毛手毛脚头发胡子一把抓的斗争方式,实在无法使我们能够清醒和客观地进行考察和识别内奸的工作。甚至像北平的‘一二·九’运动竟被怀疑为国民党的‘红旗政策’了。”“我愿郑重地向党反映这样一个情况:此次抢救运动,是在知识分子党员心理上投下了一道浓厚的阴影,是相当沉重地打击了党内相当广大知识分子党员的革命热情(当然不只是新知识分子受打击了)。”

他的这些意见和建议并未被完全接受,且被指责为犯了严重错误,而且受到了冷遇。“文化大革命”初期,这个意见书底稿被造反派抄家拿走,并成为对作者残酷迫害的口实,“四人帮”之流更以此罗织罪名,诬指作者攻击中央“九条审干方针”。直到1985年11月

27日,中央组织部才正式作出结论,明确指出蒋南翔当年给中央写的意见书“不但符合组织原则,内容也实事求是”,并宣布上述罪名“纯属诬陷,应予推倒”。

## 对东北教育工作会议的挑战

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8月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召开的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曾发生过一次争论。会上,以东北某大学校长为首的几位负责干部提出要在学校中推行贫雇农路线。同时严厉批评哈尔滨市的教育工作和青年工作右倾,犯有路线性错误,说青干校是地富子弟防空洞等等。教委的负责同志在总结报告里也说:“有些同志……阶级观点模糊和阶级立场不稳,领导上对地主子弟丧失了应有的警惕性,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对我怀有一些敌意,要提防他们搞鬼,轻易提拔他们为学生的领导骨干,盲目信任他们,都是不对的,在我们的学校里,应长贫苦子弟的志气,灭地主子弟的威风。”(见1947年10月2日《东北日报》)

哈尔滨市教委书记、哈大副校长何礼,学委书记、青干校党总支书记陈模,一中副校长陈振球在会上据理驳斥,但无济于事。

此时,北满一些地区把农村中斗地主的一套做法机械地搬到学校中,建立贫苦子弟的优越势,组织学生“贫雇农团”,对地主子女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单纯地根据地富家庭出身,大量地洗刷学生,辞退教员,停办学校,采取逼供信的简单方式。有的学校把地富子弟开除遣送回乡,交贫雇农批斗。因而使一些人被逼跑到当时国民党统治的长春、沈阳去了。

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这股风，传到了哈尔滨市，引起了一部分市委委员对青干校的非议。哈尔滨青干校是蒋南翔倡议，在1947年6月成立的。市委在讨论时，鉴于东北解放战争形势发展很快、建团工作将在北满、西满、东满铺开，亟须培养一大批青年干部，对建立青干校个个拍手赞成。现在，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上批评哈尔滨青年工作右倾，有路线问题，因而怀疑青干校办校方针是不是有问题，歪风再刮，连青干校去市里领经费都很困难了。

蒋南翔出国访问返回哈尔滨后，听取了何礼、陈模的汇报，召集教委、学委的负责同志，共同商定应取的方针，明确规定了政策界限：一，地主富农出身的青年学生和地主阶级不能画等号，可以而且应该使他们成为革命的后备。二，学校是教育机关，决不能把农村土改中的贫雇农路线，机械地搬到学校中来。严禁对地富家庭出身的学生任意进行批斗，更不得进行殴打和体罚。此后，哈尔滨青干校和大中学校坚决贯彻执行了这两条方针，坚持正面的土改教育和人生观教育，提高了广大学生——包括地富子弟在内的学生的政治觉悟，避免了一场灾难性的破坏，从此再没有一个地富子弟自杀或跑到蒋管区去了。

不久，蒋南翔找了东北局领导人王稼祥、宣传部正副部长何凯丰、郭述申谈话，他们都赞成蒋南翔对知识分子的政策观点和哈尔滨各学校不搞贫雇农路线、不搞批斗、坚持正面教育的做法，并责成当时东北教育工作会议主持人、东北行政委员会教育部长董纯才和东北大学校长张如心作出检讨，向蒋南翔道歉，终于使一场不小的争论结束了。



1949年4月蒋南翔在第一次团代会上

## 重视在高等院校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蒋南翔先后在团中央、清华大学、国家科委、高教部、教育部和中央党校工作。

在三反运动中，高校以什么为重点，开始是不够明确的。南翔同志提出高等学校不能以反贪污为重点，否则不能解决高校的办学方向问题。高校应把重点放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上。1951年12月17日他在北京医学院作了《关于思想改造问题的几点意见》的报告，内容为：①为什么要进行思想改造；②思想改造如何进行；③思想改造与增产节约运动的关系。

在1952年初的忠诚老实运动中，对清理知识分子中政治历史问题，他提出宁可不彻底，也要坚持不迫不逼，启发自觉的原则，不要重复延安“抢救失足者”运动中“逼供信”的错误。这对高校的三反运动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的健康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非常关心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进步。清华大学第一副校长刘仙洲是著名的机械工程师、是工程教育的老前辈，德高望重，学校改为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以后，常委会，



南翔同志提出请刘老列席参加。凡是刘老的意见,他都尽量予以采纳,并说明是刘老的意见。刘老对蒋南翔也是十分尊重的。刘老积极参加甲班的理论学习,思想觉悟有所提高,1953年刘老郑重地提出入党的申请,并希望蒋南翔和何东昌介绍入党。当时知识分子被认为是要改造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入党是很不容易的。为此,蒋南翔写过几次报告,并找了北京市委、华北局和教育部党组的领导同志,终于得到了他们的支持。1955年11月7日在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大会上讨论刘仙洲入党问题时,蒋南翔做了题为《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的发言。接着以同样的题目著文在《北京日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全国知识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随后在清华就有梁思成、张子高、张维、张光斗等一批著名的教授和科学家入党。

蒋南翔不但重视发挥学校原有的知识分子的作用,同时也重视对青年知识分子的培养和教育。1953年首创不脱产的“双肩挑”的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即从本科高年级学生中选拔政治和业务优秀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他们不仅要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而且又必须搞好自己的专业学习和科研教学,让他们两个肩膀挑担子,使他们受到了良好的训练。从1953年到1966年先后有682人担任了辅导员。1977年恢复学生政治辅导员制度,又有900多名高年级本科生、研究生和青年教师担任辅导员。蒋南翔说过:“年轻时做些政治工作,终身受益”。他还说过:“政治辅导员制度不仅是培养学校党政骨干的主要方式,而且是学校为国家培养党政干部的有效途径,将来在清华毕业生中会出现一些部长、省委书记。”他的这个预见可以说正在实现中或者说早已实现了。在党的十四届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中有29人曾在清华学习和工作过。其中有9人曾担任过学生政治辅导员,如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吴邦国等。一些人在科技领域也做出了贡献。比如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校时做过团委书记、党委宣传部长,并到苏联进修过。他在化工科学方面



1988年3月本文作者在北京医院与蒋南翔合影

达到了较高水平,他是博士生导师,他的科学论文曾获得过自然科学奖。

## 狠抓高等院校的 拨乱反正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筹备全国科学大会期间,蒋南翔受小平同志委托调查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被“四人帮”破坏后的情况和问题。蒋南翔向小平同志写了调查报告,并提出了关于高等教育拨乱反正的系统建议。小平同志十分重视他的报告,邀集方毅、刘西尧和蒋南翔一起研究,并交给有关学校贯彻执行。在这次会上,小平同志又指示:“要大量派遣留学生”。随后派遣留学生的工作就迅速开展起来,国内外专家对此反映很强烈,纷纷提出各种意见。小平同志又让蒋南翔提出具体建议。蒋南翔与科技干部局的同志反复研究,写出了简要而系统的建议向小平同志报告。小平同志在报告上批了三个大字:“我

赞成”。大量派遣留学生,是我国新时期实行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方面,蒋南翔的建议,为留学生工作拟定了指导方针。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恢复了国家科委,国务院科技干部局也恢复了。作为国家科委常务副主任的蒋南翔主管科技干部局。他指示科技干部局:“当前最紧迫的是两件事:首先要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第二是派遣留学生学习世界先进的科学技术。”关于平反知识分子中的冤假错案,小平、方毅、蒋南翔都有许多指示,遵照他们在新华通讯社的《国内动态清样》上以及其它材料上对几位全国知名的老专家和一些中年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科技干部局和有关单位以及当地的同志一道进行了认真的调查和彻底平反,并通过报纸报道了平反的典型案例,推动各地的平反工作。

蒋南翔在一些会议上反复强调要落实好知识分子政策。1978年夏天,正值“两个凡是”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展开激烈的论争,蒋南翔以国家科委党组副书记兼机关党委书记的身份在科委干部大会上讲话中指出:“我们常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犯‘左’的错误,早在延安时期就有过,大家一定要记取历史教训,不要重犯错误。建国以来30年的历史中,对待知识分子主要是‘左’的错误。”

1979年2月,应全国几十所高等学校负责人的要求,由小平同志亲自提名,蒋南翔重掌教育部。他到职以后,很快就建议中央为马振扶中学事件和永乐中学事件平反。

## 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

蒋南翔是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典范,是知识分子的知心朋友,他真是同几代知识分子的心是相通的。他和钱令希、季羨林、张光斗、张维、李国豪等前辈学者的友谊是令人感动的。他对自己的学生和下属如倪以信、张立华、吴亭莉和陈模的爱护、关怀和理解也是令人感动的。陈模(1936年4月参加革命)是1938年入党的年轻老干部,当年他是孩子剧

团最活跃的成员之一,是哈尔滨青年干部学校干部科长兼党总支书记,建国后他任《中国青年报》副总编辑。1957年反右期间被错划为反党分子。他曾一度想卧轨自尽,写好了绝命书,到清华大学去和老领导蒋南翔见上最后一面。他说:“南翔同志,我连个党员都不是,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准备自尽,遗书也写好了。”说着说着就掩面大哭起来。蒋南翔对他讲:“一个革命者的一生,都不是平坦大道的,常有艰险坎坷曲折。你在反右斗争中摔了跤,这是不幸的事,未尝不可变成好事,从哪里摔的跤,就从哪里爬起来嘛!你还年轻、有文化知识,身体又好,只要你到农村好好锻炼,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到我们党的怀抱里来的。”这番语重心长的谈话,使陈模听得入耳入心,就像吃了付通气的良药,打消了轻生的念头。当场就把遗书撕得粉碎。陈模到农村参加劳动第一年就被评为劳动模范,第二年、第三年连续被评为“五好社员”和优秀水利技术员。平反后先后任中国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联党组书记。为了把失去的时间找回来,他发奋写作,共出版了28本书,计350多万字。

中央党校是蒋南翔最后一个工作单位。1982年8月蒋南翔受党中央重托担任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党中央在《蒋南翔生平》中公正而实事求是地评价说:蒋南翔根据党的十二大对党的干部进行正规化培训的方针,系统地提出了党校教育正规化的意见,得到中央的批准。这不仅对中央党校也对全国各地方党校的改革和建设,起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使党校事业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几年中,全国党校系统改善了基本办学条件,形成了一支几万人的教师队伍,培训了大批优秀的中青年干部。

蒋南翔为党校教育正规化事业鞠躬尽瘁。1986年1月25日全国省级党校校长座谈会开幕,蒋南翔到会讲了话。1月27日他突患心脏大面积梗塞症,住进了北京医院,在卧病两年后的1988年5月3日与世长辞。

(作者曾任蒋南翔的秘书)



# 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

● 傅国涌

1933年1月30日下午，杨杏佛先生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会上说过一句沉痛的隽语：“争取民权的保障是18世纪的事情，不幸我们中国人活在20世纪里还是不能不做这种18世纪的工作。”更不幸的是说这个话的人自己却死在了国民党特务的乱枪之下，历史记住了这一不幸的时刻：1933年6月18日上午9时20分。对此杨杏佛先生是有思想准备的，翻开尘封已久的《杨杏佛文存》，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嗟乎，不自由毋宁死。今则争自由死，不争亦死”，“今日国内自私自利之徒满坑满谷，求其能舍身为国者竟如凤毛麟角”。1927年8月，他在《现代评论》发表的《牺牲与堕落》一诗中也说：“人们，你苦黑暗吗？请你以身作烛。用自己膏血换来的，方是真正光明之福。”

遇难前两天，他特意探望宋庆龄，带了他所收到的许多恐吓信，有些信中还夹有子弹，并转述了他听到的要杀他的一些口头警告。但是他并没有畏惧，没有退缩，而是坦然地面对了死亡，他把自己当成蜡烛，要用自己的膏血换取光明。

1933年6月18日是星期天，上海法租界中央研究院分院门外行人稀少，近8点钟时，杨杏佛带着14岁的儿子小佛出门，遭到国民党蓝衣社特务有组织的伏击。枪声一响杨杏佛立即扑到小佛身上，弹如雨下，他自己连中三弹，却保住了儿子的生命。附近一家汽车公司的职员贝柯克（俄国人）在流弹纷飞中闻声赶来，不顾安危将他们送到医院抢救，杨杏佛虽然双目未瞑，却已不能说话。9点20分，终因

伤重气绝。那一年他不过40岁。这是一次早有预谋的杀戮，是坚持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当局对杨杏佛他们呼吁民权的直接回应，纷飞的子弹回答了他们的呼号。

当天上午11点，蔡元培在中央研究院召开紧急会议，会连续开了7个小时，商讨善后问题，并致电南京政府要求立即缉拿凶手。宋庆龄获知噩耗，立即发表了严正声明，谴责这一暴行。19日，蔡元培对《申报》记者说：“杨为一文人，遭此非常变故，人民生命可谓毫无保障。”20日他率中央研究院全体同人举行公祭时，咽不成声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人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杨杏佛的事业就是科学与民权的事业，杨杏佛的精神就是五四追求的科学与民主精神。

1915年，陈独秀率先举起德先生、赛先生（即民主、科学）两面大旗，开创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群怀抱科学报国理想的留学青年，他们后来大多成为有成就的科学家，如任鸿隽、赵元任、秉志、杨杏佛、胡刚复、竺可桢等一起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团体），举起科学这面旗帜。中国科学社酝酿发起于1914年夏天，1915年10月25日正式成立，并创办了《科学》月刊（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刊物），1917年迁到上海，致力于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起重要作用，直到20世纪40年代末都

是中国最有影响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刊物,对推动中国现代科学事业功不可没。

对杨杏佛的死最伤心的也是科学社的同人和他在民权保障同盟的同志。中国科学社为他举行了隆重的社葬典礼,他的灵柩上覆盖着中国科学社的社旗。社友王季梁、胡刚复、丁翼甫、周仁等六位科学家亲自为他扶灵登车,车上满扎鲜花。灵车抵达万安公墓,仍由六人扶持下车,入土安葬。

从中国科学社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从两任孙中山秘书到出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杏佛身上理想的激情始终没有泯灭。在他被杀害的1933年初,胡愈之在《东方》杂志发起“新年的梦想”征文,在回答“梦想中的未来中国”时,杨杏佛说:“我梦想中的未来中国应当是一个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大同社会,人们有合理的自由,同时有工作的义务,一切斗争的动机和力量应用在创造和服务方面。物质的享用应当普遍而平等。”

在回答“个人生活中有什么梦想”时,他说,他个人生活的最大梦想,是希望建设一个儿童的乐园,使儿童都能受到教育,树立科学的人生观,成为未来大同世界的主人翁。

这不仅是杨杏佛1933年的梦想,也是他终生追求的理想。然而这一年的夏天,无情的子弹就击碎了他一切美好的梦想,击碎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崇高而真诚的追求。暴力、杀戮是人类的天敌,也许它能得逞于一时,但蒋介石

杀害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李公朴(当然还有“四一二”、“一二·一”),和袁世凯杀害宋教仁、张作霖杀害邵飘萍、张宗昌杀害林白水……一样把他们的名字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杨杏佛只活了40年,然而他走过的人生道路却是跌宕起伏、多姿多彩的。

杨杏佛一生中曾两度在孙中山身边工作,第一次是1912年,他在南京任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被称为“青年才俊”。1925年春天,他辞去教育界的职务,随孙中山北上,再次成为孙先生的秘书。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他陪伴这位民国缔造者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尤其在孙中山弥留之际那个霜寒月冷的夜晚,他闻到了孙中山先生最后的呼吸,心情激荡,悲急交加。孙中山去世后他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

他一生中曾两度遇险,两度幸免于难。一次是1926年7月,蒋介石等在广东正式出师北伐。杨杏佛“负责北伐军在沪的地下工作”,在“总理葬事筹备处”内设立电台,“逐日将有关情报电达前方,以后被军阀孙传芳侦悉,令法捕房逮捕,准备移送华界处决,赖女律师郑毓秀及时向法方疏通释放,随后又借法军营电台通报。”(杨小佛《我父亲杨杏佛殉难经过》,《百科知识》1979年第2期)

“四一二”发生后,杨杏佛被扣押在上海警备司令部,差一点同被捕的共产党人一起枪

杨杏佛遇刺去世



决,幸获营救,这是他第二次幸免于难。

1912年他被公派到美国留学,先入康奈尔大学学机械工程,毕业后,又进哈佛大学商学院,专攻工商管理。留美期间,他和任鸿隽、胡适、梅光迪交往密切,被称为“四俊”。他参与发起组织中国科学社,创办《科学月刊》,担任编辑部长。

1918年10月学成回国,先后任汉冶萍公司汉阳铁厂会计处成本科科长、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前身)工科主任兼教授,一度想走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的道路。

1927年10月,大学院(全国最高学术教育行政机关)成立,蔡元培出任院长,杨杏佛为副院长。1928年4月,蔡元培创办并主持中央研究院,这是我国第一个综合性科学研究机构,杨杏佛出任总干事。这一时期,他大力支持社会学者调查上海日商纱厂的女工包身制和调查无锡、保定及东北的农村经济。1931年他到江西进行了几个星期的实地调查,写成一篇客观的考察报告《The Communist Situation in China》发表在7月19日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上,中文本在《民国日报》(7月17日至21日)连载时题目译为《赤祸与中国之存亡》。报告分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顾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第二部分报道了8个苏维埃区域的情况,第三部分介绍江西苏区红军成长的过程和三次反“围剿”的状况,结论指出“围剿”只能是治标的办法,只有避免内战,实现真正的三民主义,才能建成独立自由的中国。文章发表后,当局极为震怒,刚刚印好的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收缴销毁。无疑这篇考察报告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美国记者斯诺正是看到这篇报告,才激发了亲自去苏区采访的强烈愿望。他在《西行漫记》的注文中还专门提及这篇报告对他的影响,这也是杨杏佛后来遭到暗杀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卅惨案”发生后,杨杏佛在上海创办《民族日报》,一边咯着血、与肺病抗争,一边坚持采访、编辑、校对,他几乎每天撰写社论。从6月10日创刊,到25日停刊,虽然这份报纸只存在了16天,却在五卅运动中发挥了独

特的舆论作用。

1925年9月,他领衔发起中国济难会,发起人中包括了张闻天、恽代英、陈望道、杨贤江等著名共产党人,于右任、戴季陶、李石岑等著名国民党人,以及郭沫若、茅盾、郑振铎、周予同、丰子恺等作家、学者、艺术家,杨杏佛在济难会上海总会成立会上被选为审查委员之一。济难会“以救济爱国运动和被难者为宗旨”,不遗余力做了大量救援、抚恤工作。

1927年,担任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长的杨杏佛积极支持共产党领导的上海工人武装起义。他被提名为上海市民大会十五名主席团成员之一。共产党在巴黎出版的《救国时报》在《上海起义的中心人物》文中称他的工作“大有助于上海起义的伟业”。

1932年“一二八”事变中,杨杏佛集合上海科研人员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协助军队处理技术性工作,协助宋庆龄创办“国民伤兵医院”,大力抢救伤员。

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他最后的辉煌。1931年邓演达被杀后,大约在1932年夏秋之际,宋庆龄开始考虑成立“专以保护及营救所有政治犯”的人权组织。这年12月18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五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29日召开中外记者会,宣布正式成立。宋庆龄当选为主席、蔡元培为副主席,杨杏佛为总干事,负责具体事务。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非政府的民权团体。它的诞生不是偶然的,首先是宋庆龄作为“国父”孙中山先生的夫人所享有的独一无二的地位,她被誉为“活的中国最卓越而辉煌的象征”,她在以三民主义为立国之本的中国所拥有的巨大感召力是任何其他人无法替代的,蒋介石既以孙中山继承者自居,就不能不有所顾忌。蔡元培的道德威望也如日中天,不仅在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政界,在广大知识分子和青年当中,在国际上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如果缺少了杨杏佛的热情、执著和实干精神,他办事的干练,同盟的工作恐怕也要大打折扣,至少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效率,在短短半年中做了大量工作,成效显著,影响巨大,让当权者忍无

可忍,终于动了杀机。

蔡元培当时享有崇高威望,但是年过六十,精力有限,他的性格属于宽容迂缓。仅不惑之年的杨杏佛则年富力强,精明强干。蔡元培曾说过“正可以杨杏佛之长补我之短”,还说他是“勇于任事、努力服务之人”。在中央研究院是这样,在民权同盟也是如此。这位总干事名副其实,真正是干事的人,而且更重要的是杨杏佛与宋庆龄、蔡元培的渊源都极深,互相信任,杨在1912年和1925年两度出任孙中山秘书,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时,宋庆龄也随行,他们那时就相识。后来他任“总理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和宋庆龄也多有接触。1927年蒋介石上台后他们的政见比较一致。1932年他还协助宋庆龄创立了“国民伤兵医院”。杨杏佛比蔡元培年轻二十岁,虽然不知道他们何时结识,但1927年大学院成立以来他一直协助蔡工作,“待蔡如长辈,两人共事合作无间”,六年如一日,他是蔡的得心应手的主要助手。

作为同盟总干事,杨杏佛几乎参与了所有重大的决策与活动,并南北奔波,鞠躬尽瘁。他的工作大体上主要有这样几个方面:

营救政治犯。同盟成立前以个人身份参与营救牛兰夫妇和陈独秀等政治犯,同盟成立后以同盟名义营救了大批政治犯,如廖承志、许德珩、陈赓、丁玲等等。

发表宣言、声明,传播民权、民主思想。抗议、谴责践踏人权的行为。如抗议枪杀新闻记者刘煜生,如到德国领事馆递交抗议书,谴责希特勒政府迫害犹太人和其他人士的行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消息。筹建上海、北京等地的分会组织。调查监狱政治犯状况。

负责同盟决议的实施。邹韬奋说“杨杏佛先生是总干事,决议案的执行当然偏重于他,他又热心干事,所以会务的进行很积极。杨先生平日的私人行为也许不尽人意,但是他为保障民权努力,为保障民权运动而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就这一点说,他的死是值得永远纪念的。”

如果说宋庆龄、蔡元培是民权保障同盟的

精神领袖或者说灵魂人物,那么杨杏佛就是同盟的实干领袖,是实干家。用邹韬奋的话说蔡先生“负党国重望,对于构成国家民族奠基石的优秀青年及人才尤爱护不遗余力。孙夫人向来主持正义,国际闻名。”独裁者“虽然胆大妄为,但对于党国元老如蔡、孙,究竟不敢遽下毒手”,所以他们就先选择杨杏佛下手了。他虽然也是大有功于国民党,有功于国家的人,但在蒋介石他们看来,他毕竟与宋庆龄所拥有的崇高声望、特殊地位无法相提并论,杀了他既可达到威胁宋庆龄他们、瓦解同盟的目的,又不至于引起轩然大波。

杨杏佛的死让民族精英们万念俱灰,在上海,于右任老泪纵横,鲁迅不顾当局流言的威胁参加了人殓式,在悲愤交加之中写出“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何期泪洒江南雨,又为斯民哭健儿”的诗句。在杭州,郁达夫闻讯写下《闻杨杏佛被害感书》:“风雨江城夏似春,闭门天许作闲人。恩牛怨李成何事,生死无由问伯仁!”在北京,许德珩奋笔写下《哭杨杏佛先生》:“天暗暗兮我心悲伤!血洒江南兮众情激荡!……”

杨杏佛留下的遗著有《杨杏佛文存》、《杨杏佛讲演集》、《社会改造思想大纲》,还有日记、家书和诗词稿《康桥集》。他的思想即使在他殉难68年之后的今天也没有过时。沧桑巨变,早已换了人间。我们早该整理出版杨杏佛的全集,发扬这位“为人权流血第一人”、中国科学社主要发起人的精神,继续他未竟的理想,全面推动本民族的现代化进程。

独裁者的逻辑就是暴力的逻辑。他们往往不知道,一个只能依靠杀戮来维持自身权力的政权是绝对不能长久的,一个戕害自己的优秀儿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杀害了杨杏佛、史量才、闻一多等民族精华的国民党政权,在杨身后不到16年就在大陆崩溃了。但是杨杏佛被杀,尽管宋庆龄发表声明要继续民权保障事业,同盟在失去了这样一位出色的活动家之后,实际上也就瓦解了。就如当年袁世凯杀宋教仁,瓦解了国民党一样。

(责任编辑 吴思)

#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 谢尚品

邹容 18 岁开始写《革命军》，19 岁，即 1903 年 5 月底，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出版，并在辛亥革命前的腥风血雨中风行海内外，重印 20 余次，销量达 110 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评赞说：“他（邹容）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吾今大声疾呼，以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他尽情地暴露了清朝政府是个腐朽、落后、卖国的政府，主张推翻这个政府以后，按照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他说‘中华共和国为自由独立之国’。他以高喊‘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的口号来结束他的文章。”

鲁迅先生也评赞邹容：辛亥前夜，“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于后来的武昌起义怕没什么大关系。倘说影响，则别的千言万语，大概都抵不过浅近直截的‘革命军马前卒’邹容的《革命军》。”吴玉章同志更在《辛亥革命》中说：邹容的《革命军》出版，革命的旗帜就更鲜明了。……他那犀利沉痛的文章，一时脍炙人口……对人们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跃进到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起了很大作用……“当我读了《革命军》等文章后，我在思想上便完全和改良主义决裂了。”



邹容

但是，令人痛惜的是，邹容死得太早了，才 21 岁。

## 反科举的少年急先锋

八国联军之后，清政府压榨人民更残酷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和“宁赠友邦，勿予家奴”，是它堂堂“上谕”亮出的“基本国策”！“中华之物力”虽多，但因长期为了供养中外寄生虫，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早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仅以

四川为例：

1895 年起，川民每年得分担《马关条约》赔款 60 余万两（白银，下同）；1891 年起，又得摊付英法俄德四国银行团借款 94 万余两；1898 年，为筹还《马关条约》最后一期赔款，又分摊 104 万余两；单邹容的家乡——重庆巴县就摊派了 5 万两！1902 年以后，更得每年分担按《辛丑和约》规定的共 4.5 亿两赔款（分 39 年还清，加上利息，约近 10 亿两）。于是，越来越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比“正额”——田赋要高出几十倍！

这样，大小官儿们就都挖空心思，千方百计找“税源”，也就是找刮地皮的“窍门”。

一天，总督奎俊见农民入城担粪，便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决定抽粪税：每担数文，每厕数百文。有成都讽刺大师刘师亮的绝妙对联为证：

自古未闻粪有税；  
而今只剩屁无捐。



人物是时代的产儿。邹容及其《革命军》就是在上述内忧外患交迫下出世的。

邹容(1885—1905),原名桂文,字威丹、蔚丹,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出生于巴县富商之家。父亲邹子璠,望子成龙心切,满脑子的功名利禄。1891年,6岁的邹容就被送进私塾读四书五经,学八股文。在读了宣传维新思想的《谕报》等后,邹容再也不读什么“圣人经典”,再也不学那空洞死板的八股文了。他还曾把《神童诗》中的“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紫贵,都是读书人”改为“少小休勤学,文章误了身,贪官与污吏,都是读书人”。

1898年春,不满13岁的小邹容被逼着去“应童子试”,考卷发下来,小邹容霍地站起来:“请问,这四不像的怪题,到底说的啥子!?”

监考官板着脸:“此题出自圣人经典,朱夫子已有注解,何问之有!”

小邹容大声道:“我可不愿当猪夫子、狗夫子的奴婢!”然后愤然离开了考场。

回到家,父亲又打又骂:“不肖之子!科名前程还要不要!?”

“臭八股儿不想学,满场(满清考场)儿不爱人,衰世科名得之又有何用!”这就是“童生”对父亲的回答。

##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戊戌变法后,“变法图强”反因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惨杀而呼声日高。清政府挂出了“新政”招牌,于1901年下诏“变法”允许各省派学生到日本留学。

这年夏,川督奎俊决定选派22人东渡。

可以见世面,学习新东西,这与“衰世科名”本质不同,邹容决意争取留日。

邹子璠也认为朝廷奖励出洋,留学回国后有的恩赐举人,有的放了知县是“好事”,经再三盘算,加上继母的劝说,邹子璠决定自费供邹容留学。

16岁的邹容第一次出三峡,乘长风破万里浪,很快就到了上海。在上海,他反复哀吟

着、抄写着在报上读到的题为《有感》的诗,久久不能平静:

落落何人报大仇,沉沉往事泪长流。

凄凉读尽支那史,几个男儿非马牛。

## 在学习和战斗之余赶写《革命军》

邹容从上海转到东京后,除在同文馆补习日文,就是积极投身于留学界火热的革命洪流,参加与保皇派的论战。坐落在神田骏河台的中国留学生会馆,就是他们集会论战的主要阵地。每次集会,他必抢先登台演讲,极力主张绝不可对清王朝再抱幻想,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它!

1903年春节,一千多留学生齐集会馆举行团拜。还特意“邀请”驻日公使蔡钧参加,以便把团拜大会,变成宣传革命、声讨清政府专制卖国的大会。由后来当过广西大学校长的马君武首先开炮,接着一个比一个激烈。当邹容登台时,更把高潮推到了顶点,他悲愤地历数清政府的累累罪行,措词尖锐,有理有据,赢得口号如潮,掌声四起。而蔡钧则如芒刺在背。有个名叫长福的亲贵子弟跳出来唱反调,刚开口就被哄下了台。可事后,蔡钧反保荐他当上了驻横滨领事,而马君武则被取消了入成城学校的资格。邹容不怕高压,“凡遇留学生开会,容必争先演讲,犀利悲壮,无与伦比”。

同时,邹容一刻也没有放松学习。除功课外,更认真研读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 and 史事,如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理》,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独立战争史等,并摘录其中精要,对照祖国落后的现状进行思考。他决心赶写一本宣传革命的书以唤醒国人,并坚信“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必将到来。

当《革命军》快完稿时,邹容又导演了一出狠斗学监老爷的“喜剧”。

学监者,清廷派往日本监视留学生之走狗也。其中姚文甫最有公愤。恰好这时传来他与另一学监的小老婆私通的丑闻,大家决定开会声讨。姚作贼心虚,借口“辞职”而溜走。邹容便约了几个同学抢先闯进寓所,指着鼻子数落

他，并狠狠地抽了他几记耳光，又抓起剪刀，将他的“狗尾巴”从后脑勺齐刷刷地剪掉：“限你明早离开东京，否则要你的狗命！”

第二天，会馆正梁上悬挂着这条“狗尾巴”，旁边写着：“留学生公敌姚文甫发辫”。消息很快传遍东京，上海的《苏报》，更以长篇通讯报道了这一奇闻趣事。

这下，蔡钧坐不住了，声称“近来留学生之宗旨变坏，应推邹逆为祸首”。他发出照会要求日本政府“向同文馆提索邹容”。于是在朋友的再三劝促下，1903年4月中旬，邹容回到了上海。

##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才一年多，上海大变样了！蔡元培、章太炎等组建了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云集了大批先进学者和爱国学生，给上海带来勃勃生机。

邹容感奋异常，他急切地奔向爱国学社，渴望拜见仰慕已久的革命前辈章太炎。

一天，太炎先生正伏案工作，见一英姿勃勃的青年来访，急起身相迎，才知就是剪掉姚文甫“狗尾巴”的邹容！他太高兴了！邹容也怀着激情，久久打量着自己心目中的师长。真个是“惺惺惜惺惺，好汉爱好汉”，都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之感。从此，两人兄弟相待，朝夕相处，互勉互学，纵谈家事、国事、天下事，结成了革命生死之交。

不久，邹容捧出《革命军》未完稿：“言词浅露，请先生润色。”章细看后，为年少而早熟的邹容感到十分高兴：“语虽浅直，然感动普通社会，非如此不可。”

1903年5月底，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等筹资，大同书局印行的《革命军》在上海问世，并很快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发行110余万册，销量居清末革命书刊之冠。

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分“革命之原因”、“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等七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外反革命给中国造成的民族危机，是中国人民不可不革命的根本原因。他大声呼唤中国的“老年、中

年、壮年、少年、幼年、无量男女”行动起来，“作十年血战之期，磨吾刀，建吾旗，各出其九死一生之魄力”前赴后继，“掷尔头颅，暴尔肝脑”，与清王朝“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之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的“外来之恶魔”，建立“凡为国人，男女一律平等，无上下贵贱之分”的“自由独立”的“中华共和国”。

《革命军》是时代的产物，是催人奋进的战斗鼓点和进军号角，它以革命的最强音，显示了革命舆论的威力。当时，千百万人为其大胆泼辣、恣肆无避的言词而激动鼓舞，千百万人因受到感悟而勇敢地走上战场。正如当时的《苏报·读〈革命军〉》一文所赞扬的那样：“卓哉！邹氏之《革命军》也！……驱以犀利之笔，达以浅直之词，虽顽懦之夫，目睹其字，耳闻其语，则罔不面赤耳热，心跳肺张，作拔剑砍地，奋身入海之状。呜呼，此诚今日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也！”

“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仍以四川为例：不仅吴玉章是“读了《革命军》以后，便在思想上完全与改良主义决裂”，更多的，如在叙州起义的余竟成，就是在泸州读到《革命军》和陈天华的《警世钟》“大受感动，因而忘却一切，日持两书，街头巷尾，逢人宣传，无所顾忌”之后，又加入同盟会。辛亥前夕死于成都狱中的卞小吾，1903年曾到狱中探望邹容和章太炎，并密商革命方略，购买《革命军》、《苏报案纪事》数百卷，回重庆“密结同志，将书遍给之，大为鼓吹，佐以演说，不数月，革命事业，大有一日千里之势”。孙中山更在《革命原起》中说，《革命军》一书，“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

## 投身拒俄运动

沙俄不仅是“欧洲的宪兵”，更妄图把我东北纳入其“黄色俄罗斯”扩张计划之中。八国联军时，它出兵最多而最野蛮凶残。《辛丑和约》签订后，列强都退兵了，惟独俄军赖着不走。我东北便奋起组织了“东北人民义勇军”，提出“御俄寇，复国土”口号，给沙俄强

盗以狠狠打击。它被迫于1902年4月5日签订了《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在18个月内分三期撤军。但1903年4月8日，交还营口到期，它不但不撤，反增兵营口，更于4月22日提出侵略我东北的七条“新约”逼清廷签字。消息传出，举国震怒，很快，拒俄运动在全国掀起了。

4月27日，上海各界和爱国学社师生近2000人，在张园开拒俄大会，号召全国“一致起而拒俄”。几十个演说者争先登台声讨沙俄罪行，邹容更“滔滔辩论，旁若无人”，促使人们“纷纷争相捐款，有脱钻石戒指以捐集者”。大会还通电全国和各国外交部：“此约如允，内失国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

4月28日，日本《时事新报》发出了大字标题的“号外”：《俄国现在政策：断然取东三省入俄国版图》。第二天下午，中国留学生云集东京锦辉馆，决定组织“拒俄义勇队”开赴前线，当主席“有不怕死的……”话音未落，“众皆举手赞成”，参加者达130多人。接着，又分别召开了各省同乡会。在福建同乡会上，有个14岁的学生，“闻俄事后，日夜涕泣，求签名于军队。大家不忍，他痛哭道：‘吾为国死，诎伤耶！’”小小年纪，竟那么赤诚，使“举座皆泣”。一些女留学生也组织了“军中看护队”或“赤十字社”，要求随军北征。日本妇女协会会长下田歌子急忙劝阻，她们说：“吾辈且无国，安得有身！更安得有学！”……义勇队每天都集中留学生会馆操练，准备随时出征，并派代表回国请愿，要求一同出兵。

4月30日，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收到东京留学生来电：“俄祸日急，已电北洋主战，留学生编义勇队赴敌，请协力。”心急如焚的邹容，立即回电报名请缨。

## 自请入狱同战友共生死

爱国学社成立后，两江总督魏光燾就电奏清廷：“查上海创立爱国学社，招集不逞之徒倡演革命邪说，已飭查禁密拿。”但因爱国学

社在租界内，一时还不敢动手。当《革命军》以及《革命军·自序》、章士钊《介绍〈革命军〉》、《读〈革命军〉》和章太炎、邹容、柳亚子、蔡元培合写的《驳〈革命驳议〉》……在《苏报》连续发表后，清政府惊恐万状，严责魏光燾“形同聋聩”。他受到主子臭骂，便下令：“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务即严拿务获，尽法惩办，勿稍疏纵。”远在武昌的湖广总督端方也说：“巴县邹容最为凶险，非拿办不可！”他们责成上海道袁树勋“知会领事及工部局密行设法诱拿数人”，并加派南京候补道俞明震协助袁树勋加紧勾结洋人。

消息传出，邹容和章太炎镇定自若，邹容表示：“虽刀加吾颈，枪指吾胸亦无所惧！”

勾结“成功”了！英国律师旦文授计，以魏光燾为“原告”，指控邹容、章太炎等于工部局会审公廨。

6月29日，《苏报》发表了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针对康有为《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所谓我国人民“公理未明，旧俗俱在”，还没有革命资格……理直气壮地指出：“公理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俱在，即以革命去之！”更痛骂康有为吹捧为“唐虞至明之所无，大地各国所未有”的“古今至仁”的光绪皇帝为“未辨菽麦”的“载湉小丑”！

就在这天，领事签署了拘票，工部局开始抓人了，这就是著名的“苏报案”。

1903年6月30日，一群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闯进爱国学社，章先生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当细看了拘票名单后，就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我就是！”

翌日凌晨，邹容在虹口得到消息，悲愤地说：“章兄为革命而被捕，我岂能置身事外！？”邹容毅然入狱与师友共患难。

7月7日，《苏报》和爱国学社被查封。

7月15日，租界会审公廨组成“额外公堂”，对邹、章进行审讯。“罪名”是：“故意污蔑满清皇帝，挑诋政府，大逆不道，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当囚车回狱时，大街小巷挤满了敬仰的人

群。邹、章二人也从同胞的亲切目光中受到巨大鼓舞。《甲寅周刊》报道说，章先生还曾即兴高吟：“风吹枷锁满城香，街市争看员外郎……”

无法定案，又急欲置二公于死地的魏光燾等，不惜以出卖沪宁路权为代价，以求引渡二人到“华界”惩办。英国以“外人在租界一日，即有一日应得之权利”为由拒绝引渡。会审公廨于1903年12月24日判为“永远监禁”。又因仍遭强烈反对，乃于1904年5月21日改判为“邹容二年监禁，章太炎三年监禁，罚作苦工，限满释放，驱逐出境”，“从上年到案之日算起”。

在狱中，二人互勉互学，情胜手足。太炎先生见邹容如此坚贞，便高兴地写了《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州。  
快剪刀陈辩，干牛肉作糇。  
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  
临命须臾手，乾坤只两头。

邹容也以同样的豪情写了《狱中答西狩》：

我兄章枚叔，忧国心如焚。  
并世无知己，吾生苦不文。  
一朝沦地狱，何日扫妖氛。  
昨夜梦和尔，同兴革命军。

恰在这时，监外发生了沈荇惨案。

湖南志士沈荇，因在报上揭露了清政府出卖东北予俄的“密约”而被捕。正因引渡阴谋未能得逞的慈禧便恼羞成怒，下令刑部，命七个狱卒足足用了四个小时，活活将沈荇鞭打致死。有个卖报人陈复，因敬爱邹、章二公，每天黎明就把报纸送到狱中。太炎先生便写了《狱中闻沈禹希见杀》。邹容的《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则更沉痛悲愤：

中原久陆沉，英雄出隐沦。  
举世呼不应，抉眼悬京门。  
一瞑负多疚，长歌招国魂。  
头颅当自抚，谁为墨新坟。

革命之火是不会熄灭的。《苏报》被查封后，章士钊等紧接着就创办了《国民日报》，

并把邹容的《和西狩〈狱中闻沈禹希见杀〉》登了出来，激发了更多的人起而战斗。

在工部局的监狱里，邹、章二人每天只能得到“粥一盂，豆三粒”，粥中还掺有麦麸和砂子。晚上，再冷也“仅与一毡”。不仅如此，更借“罚作苦工”来残害他们。章先生高度近视，邹容从小读书，而狱卒每天黎明就驱赶他们进缝衣工场去穿针引线。一次，面黄肌瘦的太炎先生因动作太慢而挨鞭打。太炎先生奋拳反抗，被踢倒在地，打得遍体鳞伤。太炎先生宣布绝食，“义不独生”的邹容不仅也用绝食这一手段与“我兄章枚叔”团结战斗，还以饱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与太炎先生作“联句”游戏，写成壮怀激烈的《绝命词》，其中有：

平生御寇御风志（邹），  
近死之心不复阳（章）。  
愿力能生千猛士（邹），  
补牢未必恨亡羊（章）。

饥寒交迫和残酷折磨，到1905年2月，邹容眼看快刑满出狱时，终因“狱卒数侵之，心不能平，又啖麦饭不饱，益愤激”而病倒。章先生再三要求请医生抢救，均遭拒绝，乃托人买来黄连、阿胶等滋补，也毫无起色，直到生命垂危，才允许保释外出救治。而就在外出的前一天，狱方又假惺惺地摆出“博爱”和“人道主义”的面孔，要先送邹容去工部局医院“抢救”。第二天——1905年4月3日凌晨，邹容口吐鲜血，睁着眼睛死去，年仅21岁。

武昌起义后，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公布了民主主义《临时约法》，初步实现了邹容的“共和国”理想。民国元年2月，更以大总统名义，签署了追赠邹容为“大将军”的命令。重庆的蜀军政府，把邹容列为四川死义烈士第一名。1924年，太炎先生沉痛地写了《赠大将军邹君墓表》。今重庆市中区的“邹容路”，仍矗立着《邹容烈士纪念碑》，让后世子孙永远纪念这位甘当“革命军中马前卒”，和临死前仍念念不忘“同兴革命军”的年轻先烈。

（责任编辑 吴 思）

# 辛亥革命与台湾

● 何 标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先生曾四次到台湾，还拟以台湾作为发动内地革命起义的跳板。辛亥革命的风暴，在日据下的台湾岛内，掀起了武装起义的波澜，有些台胞直接参加了辛亥革命；广大台胞则对孙中山无限敬仰，并把台湾的前途，寄望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值此辛亥革命90周年之际，回顾这些史实，使我们倍感台海两岸同胞血脉相连，休戚与共。

## 台北新起町革命总司令指挥部

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了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五个月后中日签订割台的《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愤怒，孙中山立即动员兴中会成员并联络反清会党，在广州发动第一次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1897年9月，陈少白受孙中山派遣，从日本赴日据下的台湾，秘密发展兴中会。同年11月，陈在台北联络原兴中会会员杨心如，并发展吴文秀、容祺年、赵满朝等人，组成了兴中会台湾分会。

1900年9月，孙中山经日本首次赴台，抵达基隆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率官员迎接。孙先生此行，主要是在台坐镇指挥广东惠州起义，进行起义的联络、支援活动，并观察华南局势，如起义得手，即俟机回到内地。此次在台停留达44天之久，经兴中会会员杨心如等人协助，在台北新起町（今长沙街一带，原址已被拆除，现为一幢公寓楼）设立了革命总司令指挥部。当时日本内阁及台湾总督对孙中山的支持，有两种说法：一说日方希望孙中山对日本平定台湾人民反抗给以协助。日当局认

为这些反抗主要来自福建和广东方面的“煽动”，想借用孙中山在民众中的声望，稳定其殖民统治。另一说是当时的日本内阁和驻台湾总督有进占厦门的企图，遂以革命军起义后攻占厦门为条件，答应以台湾为惠州起义发号施令的中心，同时于起义后给革命军以军援。

1900年10月8日，孙中山在台北指挥了惠州起义。起义军活捉了清将杜凤梧，缴获洋枪700多支，子弹5万多发，清提督邓万林负伤落马而逃，起义冲击了腐败的清王朝统治。但此时日本政局发生变化，伊藤博文出任首相，他禁止台湾总督与中国革命党保持联系，致使孙中山的革命指挥部难以继续活动，孙先生也不得不离开台湾，惠州起义遂未克完成。此后，孙中山又于1913年、1918年和1924年赴台访问或旅经台湾，但停留时间很短，且在台期间均遭日本当局严格控制，禁止与台胞接触。

## 辛亥革命风暴冲击台湾岛

1905年7月，兴中会等革命团体决定成立统一政党——中国同盟会，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政纲，选孙中山为总理。这给已被日本占领10年之久的台湾同胞带来新的希望，即把台湾的光复寄托于国民革命的成功。1910年9月，同盟会会员王兆培与台南籍的翁俊明成立了同盟会台湾分会，两年后会员增至30余人。至1914年，会员已达76人。他们经常秘密集会，讨论时局，探讨如何使台湾回归祖国。



## 大元帅身边的台湾人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在祖国大陆革命胜利鼓舞下，台湾革命志士纷纷揭竿而起，岛内抗日起义风起云涌。1912年3月，南投民众领袖刘乾、林启祯，响应辛亥革命，建立秘密组织，袭击林圯埔警察支厅，与日警激战七日。嘉义农民黄朝、黄老钳在辛亥革命胜利鼓舞下发起土库起义，因事机不密而遭杀害。南投以陈阿荣为首密谋发动埔里起义，已串联85人，事败被捕入狱。台中苗栗赖来同谢全石秘密潜来大陆，受辛亥革命影响后回台鼓吹革命，不足一年，有80多人参加，12月1日率众攻打日本东势角支厅官署，杀死日警多人，开仓夺取武器弹药，在撤退时赖来不幸中弹牺牲。1913年3月，台中张火炉与黄炳贵、纪石碇组织群众，联络高山族同胞，支援罗福星起义，不幸事泄被捕死于台北。1913年农历10月李阿齐在台南关帝庙起义，也因事机不密遭到破坏。

最大一起，是罗福星在苗栗发动的抗日起义。罗福星，台湾苗栗人，1903年随祖父自广东去台。1905年返回广东，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参加过黄花岗起义，在进攻广东督署时，左手负伤。1912年12月集合“十二同志”入台，以台北大稻埕为基地，进行秘密活动，发展组织。1913年2月在台北、基隆、新竹、桃园等地建立中国革命党（又名同盟会）台湾支部，策动起义复台，参与者甚众。准备起义时事泄，于12月18日被捕入狱，同案被捕的革命志士达1211人。1914年3月3日，罗福星与台南关帝庙起义的李阿齐，东势角起义的赖来，大湖起义的张火炉，南投起义的沈阿荣等200余人慷慨就义。罗牺牲时年仅29岁，遗有绝命诗一首，诗中有：“海外烟氛突一岛，吾民今日赋同仇。牺牲血肉寻常事，莫怕生平爱自由”等句。

罗福星等人就义后，台湾抗日起义依然连绵不断，特别是1915年余清芳等人领导震惊中外的西来庵起义，起义者数千人直逼噍吧年日警支厅，血战几昼夜，数万无辜台胞遭日寇滥杀，余清芳等903名抗日志士被处死刑，此即著名的“噍吧年事件”。

1905年同盟会成立之初，在林森的组织下即有台湾青年参加同盟会，但未留有姓名和资料。依现有材料，罗福星应当是最早追随孙中山的台湾同胞。此外，追随孙中山致力于国民革命时间最久的台胞，当属爱国将领林资铿。

林资铿（1878—1925）号祖密，出身于台湾雾峰名门的林氏家族。其祖父林文蔡曾任清政府福建水陆提督；父亲林朝栋于1885年中法战争时，在台湾巡抚刘铭传的领导下，扼守基隆要塞狮球岭，抗法有功。《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下令林朝栋举家内渡，后病逝于上海。雾峰林家在台湾已经营100多年，为台湾五大家族之一。林朝栋派林资铿赴台处理和取回其家产，但其家产大都为日寇掠夺，取回的不及原有家产的十分之一。1913年林资铿撤销日本国籍，向当时的国民政府内务部申请中国国籍，成为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首位台胞。林资铿变卖家产迁居大陆后，仍积极支持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爱国志士罗福星、张火炉、余清芳等都得到过林资铿的资助。

1915年孙中山听说林资铿的爱国事迹后，派其秘书、国民党元老徐瑞霖到厦门拜访林资铿，动员他参加国民革命，介绍他参加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成为早期投身国民革命的一位台籍人士。

1916年中华革命党福建支部发动的厦门起义失败，为讨伐袁世凯，打倒北洋军阀，林资铿捐献变卖台湾家产的50多万银元，组织闽南革命军，从事护法运动。孙中山于1918年1月6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林资铿为闽南军司令，领少将衔，负责指挥闽南军事行动。林不负中山先生重托，率军攻下闽南七县。

1919年投机革命的反动军阀陈炯明进入闽南，吞并了闽南军。孙中山改任林资铿为粤军第二预备队司令。1920年又任粤军第九支队司令、汕头警备司令。1921年调任大元帅参军兼侍从武官和大本营参议。1923年他辞去

公职,以变卖家产所余财产,从事闽南地区的开发和建设。1925年8月20日,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将林资铿逮捕后杀害,遇难时仅48岁。

此外,1905年生于台北的李友邦,于1924年秋考入广州黄埔军校第二期。学习期间奉孙中山之命携巨款北上。对北伐战争有功,得孙先生器重,被派去主持两广省工委领导的“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主要任务是派人回台宣传孙中山领导下祖国革命的大好形势,激励台胞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斗志,并动员一批台湾青年到广州学习和参加革命工作。

## 两岸同胞情感交融同喜同悲

辛亥革命胜利时台湾同胞欢欣鼓舞的情景,许多老辈台胞终生难以忘怀。已故全国政协委员李乔松,是台中雾峰人,他在1921年被乡民选为“保正”,因受辛亥革命胜利鼓舞,他把孙中山的大照片公开挂在“保正办公室”墙上,并经常教育子女:“咱们是中国人,祖国是中国,要有骨气,要有民族气节。”现本人已去世多年,但这些情节其子女仍记忆犹新。已故全国政协委员、老台胞陈文彬曾回忆说:辛亥

革命胜利他只有8岁,记得当时上海印制的孙中山、黄兴等人画像和《武昌起义战火图》在台湾城乡都很畅销。他母亲曾指着一张彩色画告诉他,中间是孙中山,右边是黄兴,左边是宋教仁;并向他讲孙中山推翻满清的事迹。已故全国政协委员、老台胞王万得也说过:当时台湾老百姓连一般家庭妇女和儿童都知道辛亥革命;人们把这件大事概括成三句话——唐山(指祖国大陆)发生了革命;“漩桶”已经退位;孙中山做了大总统。“漩桶”是“宣统”的谐音,是台湾土语“尿桶”之意。这一比喻是对满清皇帝的轻蔑。王万得还说:台湾私塾小学生喜欢读上海出版的《新三字经》,这本书开头四句话是:“我中华,民主国。黄龙旗,变五色。”

孙中山先生临终前还念念不忘台湾,曾对戴季陶说:“日本必须放弃与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协助台湾至少要实现自治。”1925年2月下旬,孙中山在北京生病的消息传到台湾,并一度传出死讯。当时在台湾有广泛影响的《台湾民报》,先后以“愿中山先生之死的确”和“孙文没有死”的大字标题发表评论,充满对孙先生的期望和爱戴。

(责任编辑 洛松)

台湾新竹军民夜袭日本侵略军图



# 顾颉刚在 1958 年 “拔白旗”运动中

● 张锡金

1958年5月,一个“拔白旗、插红旗”的运动席卷神州大地。当时有一种说法是:红旗就是我们的五星红旗,世界上什么地方都要插旗子,是插红旗,还是插白旗?不是无产阶级插红旗,就是资产阶级插白旗。我们要插红旗,资产阶级要插白旗。

这样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大批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自然首当其冲。著名的历史学家顾颉刚就是其中的一个。

顾颉刚 1893 年生于江苏苏州一个读书人家。1920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后留校工作,从此开始了他的学术研究生涯。

“五四”运动前后,新文化运动蓬勃发展,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口号。新思想、新方法的广泛传播,为人们的学术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 and 新的视野。1923 年初,新文化运动中的猛将之一的钱玄同写信给顾颉刚,希望读到“离经叛道”、“非圣无法”方面的文章。这封信促使了顾颉刚在同年 5 月的《读书杂志》第 9 期上发表了《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一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假说。

“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是顾颉刚在研究实践中对古史的思考与见解的理论总结和系统化的表述,也是他从事古史研究的重要指导思想。这种古史观对旧的古史系统造成的经历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给长期以来

处于凝固封闭状态的古史研究领域带来了一股新鲜的空气,打破了史学界以往信奉圣贤,以经典所载的圣贤之言为研究标准的框框,推动了中国古史的研究。

1926 年顾颉刚以《古史辨》第一册为题结集出版了辩论古史方面的论文,后又组织一批志同道合的学人主持、编辑出版了《古史辨》第二至第七册。这些著作的出版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1948 年 3 月在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大会上,当选为人文组的院士。

新中国的诞生为千百万知识分子的命运揭开了新的一页。顾颉刚先在上海诚明文学院、上海学院和复旦大学等高校工作,后在北京有关方面多次邀请下于 1954 年 8 月离开上海赴京,任中国科学院历史所第一所研究员。

1957 年,顾颉刚约有 9 个月时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科学院的反右派斗争烈火如炽,疗养院离反右派前线毕竟有了一段距离,“官不扰病人”,这也许是他能在反右派运动中没蒙受多大苦难的原因之一。但是,1958 年的“拔白旗、插红旗”,顾颉刚是在劫难逃了。

从 1958 年 2 月起,顾颉刚参加整风运动,一是在任职单位的历史所,一是在民进组织。在整风期间,大会小会接连不断,逢会必须联系自己的历史,挖掘思想根源。3 月初,顾颉刚在民进北京市委全体委员自我改造与跃进大会上发言。3 月 10 日,陈伯达在科学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讲话。他

说：“在全国解放后，有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逃避现实，脱离实际，脱离社会生活，把自己藏到‘三代’的角落中去，把‘三代’当作‘象牙之塔’。这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风气，不是马克思主义的风气。”

顾颉刚在民进会议期间写出的交心资料及检讨书约10万言，这还并不包括在历史所写的大字报和检讨书。顾颉刚如此“推心置腹”，并非出于自愿。因为，在“拔白旗”运动中，如果你不发言，则被认为是故作镇静，是用沉默掩饰不满意，是对运动的抗拒，也是一种对抗运动的方式。这在顾颉刚4月14日日记中说得更明白不过了。他说：“我向少说话，自问一生谨慎，扪心无愧，而人家因我不说话而关系复杂，横加猜测。今日决据日记，完全摊出，虽反共、反苏者亦无顾虑。”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也说：“特我辈自旧社会来，不能无旧社会之习气，非施改革则步伐不齐，是以不惜用严厉之手段以为教育。”

在“交心”会上，顾颉刚对自己的个人主义作了检查，“予自谓平生谨小慎微，道德甚好，且尽量帮助别人，自己生活并不要求享受，亦说不上个人主义”，经过与会者的启发，他思想发生斗争，内心非常痛苦。他在4月28日日记中说：“我想出我有甚大之名心，即不欲出小风头而要出大风头，不欲一时出风头而要永久出风头，成若干不朽著作。然谓予有利心，则尚未挖出。”他在交心材料《我和党的关系》中又说：“说我个人主义，也对，因为我一生的工作目标是研究学问，而所以要这样做是由于爱好，即是兴趣主义。我要不受任何人的管束，藏在一处清静的地方独个儿干，或组织了一批同道的人一块儿干。有人了解我，有人需要我，我是这样做；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需要我，我还是这样做：因为我知道科学的范围远远广大于实际应用的需要。所以我从来不问我所工作的有没有市场。为了有这样的欲望，所以一生所希求的只是充裕的时间和最低限度的经济力量。如果衣食不成问题，时间又可自由支配，那就一切满足。”

这年10月，顾颉刚随政协组织的全国政

协委员到河南省信阳等地参观考察，接着，又到河北的徐水县参观。这些地方都是当时被树为大跃进、“放卫星”的典型单位，是全国的样板。参观回来后，他还在民进会议上作了《河南农业大跃进》的发言。

1958年8月《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展开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中，强调应该把一切“白旗”以至“灰旗”统统拔掉，把红旗普遍插起来。这一文件把全国的拔白旗运动推向新的高潮。在拔白旗的一派声浪中，顾颉刚又成了众矢之的。《历史教学问题》第10期发表的文章中，提出历史学界要拔掉顾颉刚这面白旗，认为：古史辨派“对当时的史学界起过重大的影响，这一影响一直到今天在史学界还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影响不消除，史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白旗不拔掉，无产阶级历史唯物主义的红旗是无法插上的。”文章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必须贯彻历史研究的各个方面包括整理史料和考订古书真伪在内，唯心主义历史观是不可能整理好资料的”。文章认为，抗日战争时期古史辨派发生了由“疑古”向“信古”的转变，这“不是进步，而是一个倒退”。文章作出政治性结论，“曾在中国古史研究阵地上活跃一时的‘古史辨派’，虽然也替当时的历史



顾颉刚先生

研究做了一些整理史料的工作，但他们所宣扬的封建性的资产阶级右派的史学思想，是极端反动的。”

在这里需要提及的是，许多文章把顾颉刚与胡适联系在一起批判，目的是揭发胡适的影响，但也在政治上起到了把顾颉刚划入白旗范围的作用。当然，顾与胡适的关系非同一般，在顾颉刚的治学道路上，胡适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17年，胡适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顾颉刚是哲学系学生。胡、顾两人在年龄上相差不大，在讨论学术问题时表现出一种教学相长的师友关系。顾颉刚从北大毕业后，生活比较困难，胡适曾给予接济，使顾颉刚能够集中精力研究学问。他在《〈古史辨〉·自序》中说：如不是亲从适之先生受学，了解他的研究方法，我也不会认识自己最近情的学问乃是史学，如是适之、玄同两先生不提我的编集辨伪材料的兴趣，奖励我的大胆的假设，我对于研究古史的进行也不会这般的快速。1926年9月胡适在《介绍几部新出的史学书》中，在论及顾颉刚的《古史辨》一书时说：“这是中国史学界的一部革命的书，又是一部讨论史学方法的书。此书可以解放人的思想，可以指示做学问的途径，可以提倡那‘深澈猛烈的真实’的精神。治历史的人，想整理国故的人，想真实地做学问的人，都应该读这部有趣味的书”。（《现代评论》第4卷第92期）同样，胡适在研究《红楼梦》这一专题时，顾颉刚曾为胡适作考证去查找资料，奔波于北京、天津、上海各大图书馆，挖掘史料，摘抄文献。《胡适口述自传》中说：“在寻找作者身世这项第一步工作里，我得到了我许多学生的帮助。这些学生后来在‘红学’研究上都颇有名气，其中之一便是后来成名的史学家顾颉刚，另一位是俞平伯，平伯后来成为文学教授。”

1955年春，由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引起的批判唯心主义运动，再次把批判胡适运动引向深入。3月初，顾颉刚在中科院历史组会议上发了言。他在这一天的日记中说：

“近来批判胡适历史学、考据学的文字中，常常牵到我和《古史辨》，因此，我在今天会上说个明白。”但他认为，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以书籍为主体，要彻底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要帮助人们了解历史，离不开考据学。考据的目的在于求真，纵使从事这种工作的人无反封建之主观愿望，而其工作之客观效果必使封建统治者篡改历史的目的暴露出来，无以实现。因可以说考据学是反封建的。早在1951年，顾颉刚在《自传》中就说：我们所做的考证工作是唯物史观者建设理论的基础，然而唯物史观的理论又正是我们考证工作的基本概念。彼此所信的“真古”是同的，只是工作一偏于理论，一偏于事实，这原是分工合作所应有的界域。近人常常扬彼抑此，其实，只要大家心平气和地想一想，自能彼此释然。但是，在这次历史组会议上，与会者认为考据学是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顾颉刚因为发言不当，会后，他被迫作了检讨。同时，还因这样的观点，在3月的另一次会议上他再一次受到更为激烈的批判。

报刊发表文章公开笔伐与历史所的口诛是相互配合的。前者在于造社会舆论，将拔顾颉刚的白旗运动推到社会上去，扩大影响范围，造成一种逼人的声势；后者为具体的解剖分析，让顾颉刚检讨交代。这种内外夹攻的阵势，整得顾颉刚坐立不安，心身交瘁。

1958年秋天，历史所集中火力批判顾颉刚的资产阶级史学观时，他无论如何都不能理解这是怎么一回事？为此，他忿忿不平地去找所里的负责人，提出质询：“我之学术思想悉由宋、清两代学人来，不过将其零碎文章组织成一系统而已。要批判我，是否先须批判宋、清两代之疑古思想？”（《顾颉刚年谱》第364页）

1958年11月中旬至12月上旬，顾颉刚出席民进四届三中全会及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不得不作大会发言。现实的形势就摆在面前，他为自己的发言内容颇为踌躇。他在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一篇发言稿写

了4次,今日略定,甚矣江郎之才尽也。”顾颉刚在大会上发言摘要,于12月18日在《光明日报》上以《从抗拒改造到接受改造》为题发表。在这份检讨里,可以读到下面的话:

“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旧知识分子,说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其实是高看了我,应该称我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才合适。我生在一个陈旧的家庭,又进了十几年的私塾,规行矩步,四书五经,封建思想的根基打得既深且透。后来读了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才孕育了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进了北京大学,又接受了胡适的所谓‘科学方法’(实际是达尔文进化论的庸俗化)来整理国故;于是我才部分转化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以我现在分析我自己的思想,封建主义表现在我的立身行事上,资本主义表现在我的学术研究上。几十年来老是以以为学术工作和政治工作必当分之,否则一手画圆,一手画方,结果方和圆都画不好。我自省绝没有政治的才

能而却有极高的学术兴趣,所以自己订了计划,集中精力向脱离实际的纸上学问钻研进去。人家笑我是‘书呆子’,‘钻牛角尖’,我一点不动心。”

这一年,顾颉刚66岁。一位年近古稀的学人不得不写出这样的自我检讨,并公诸于众,其心中的痛楚是可以想像的。

作为一个以学术为生命的历史学家,即使在被“拔白旗”的时候,顾颉刚也不忘自己的使命,坚持研究学术问题,为繁荣中国的文化事业献出自己的力量。据资料记载,他1月下旬,作《〈史记〉校证工作提纲》。8月下旬,作《标点〈史记〉凡例》,12月底,校点毕。他在12月29日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今日《史记》三家注校点毕工。四年工作,一旦完成,肩负为之一轻。”他从学术研究中获得了一份乐趣,在强大的政治批判的阴影下,使那颗颤抖的心灵得到了一点快慰。

(责任编辑 吴思)

## 全国发行量最大的中共历史杂志

# 党史博览

月刊 定价4.00元 全年48元 国际流行大开本 邮发代号36-158

高层次·大题材·深揭秘·全纪实

国是春秋、一代风流、名人档案、红墙内幕、旧事寻踪、昔日名流、社会透视、将帅风采、知情者说、红色浪漫曲……诸多栏目逐期推出叶永烈、董保存、顾保孜、尹家民、王凡、肖思科、宗道一、舒云等名家力作,以及重大事件当事人亲历记。

荣获首届(2000年)全国党史优秀期刊奖

出版:郑州市金水大道中共河南省委《党史博览》杂志社

邮编:450003

电话:(0371)5902254

回顾中共历史 披露决策内幕 追寻历史真相 展现伟人风采



#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 ● 杨继绳

1958年河南省出了一件震动全国的重大政治事件，即揭批“潘、杨、王右倾反党集团”。几个月时间，受株连者数以万计，致死者逾百人，两年后始得平反。潘，是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兼省军区政委；杨，是杨珏，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王，是王庭栋，河南省委副秘书长。

他们三人原来是平原省的干部，平原省撤销，1952年12月，潘复生调到河南，任省委第一书记。王庭栋随同潘到河南，1955年杨珏也调到河南。

### 分歧从合作化速度开始

分歧是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开始的。

潘、杨、王等认为，推进农业合作化的速度不能太急，太快，应当有步骤地分批进行。第一年实现30%，第二年30%，第三年完成。时任省委第二书记的吴芝圃，大革命时期曾在毛泽东主持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过，他主张一年完成。三年完成本来是中央的意见，后来下面发展很快，有些地方一夜实现了合作化。毛泽东也很高兴，出版了《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批评主张慢一些的人是“小脚女人”。

在合作社规模上，潘、杨、王认为不能盲目提倡越大越好，太大了不易管理，而吴芝圃则认为规模越大越好。在实际推行中，开始是百户社，发展到千户社。

吴芝圃主张合作社应将牲畜集中起来，实行大槽喂养。潘、杨、王下乡看到集中喂养条件不具备，管理跟不上，牲畜长癣、掉毛，生病、死亡，为了降低牲畜死亡率，主张小槽喂养，以保

护牲畜，保障农业生产。

实行合作化以后，要不要给农民一点小自由？吴芝圃主张让农民全心全意地搞集体经济，不能助长农民小生产者的倾向，把自留地收归集体。潘、杨、王认为，收回自留地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不让农民利用业余时间搞点家庭副业，影响农民收入。

由于合作化运动发展过快、过急，工作过粗，在工作中出现了强迫命令、违法乱纪的现象，使农民产生强烈的抵触情绪。1956年下半年到1957年第一季度，河南省农村发生闹社事件。临汝县1956年下半年31个农业社发生“闹社”事件；商丘地区1956年12月到1957年1月，130个高级社和40个初级社发生了群众“闹社”。在“闹社”中，有些农民从集体大槽中牵回了原来属于自己的牲畜，有的农民要求退社，个别地方农民还和搞强迫命令的干部发生了冲突。在处理“闹社”事件中，一些带头闹事的人被逮捕判刑。在1957年春节前后开展的宣传合作化优越性的教育运动中，又发生了严重的粗暴对待群众的现象，不少人被捆绑、游街、批斗、管制甚至有被摧残致死者。

1954年7月，潘复生因病休养，由吴芝圃暂时主持工作。潘复生健康好转后恢复工作，并着手纠正吴主持工作时的偏差。他让杨珏到许昌、南阳、平顶山考察，派王庭栋到安阳实地调查。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制定了《关于奖励发展农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宣传要点》共8条40多款，涉及到巩固集体经济、维护农民利益的方方面面，例如，推广牲畜分槽喂养、养用合一；允许社员自养牲畜，以满足家庭副业生产的需要，使用社员

的牲畜合理记分;留足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地  
产的粮食只交公粮,不计征购任务;农业合作  
社必须实行包工包产,超产奖励;农民可以自  
己养鸡、养猪;允许社员开垦隙地、房前屋后  
的小荒地,也可以搞点家庭副业;开放自由市  
场;合作社规模太大的,根据社员的要求,可以  
分小一些,等等。

潘复生主持工作后,还主持制定了《关于  
开展整风运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指  
示》,根据这个文件,严肃查处了民权、夏邑、  
永城干部在合作化中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行  
为,重新处理临汝县农民闹社事件,释放了部  
分被捕的人。

潘复生了解到伊川、临汝农民有的吃“观  
音土”,心里很沉重,要求省里立即解决,并报  
告中央希望降低征购指标,给农民多留一点。  
王庭栋当时在省里分管粮食统购统销工作,潘  
复生派他下去调查粮食征购情况,发现给农民  
留的口粮太少,而且多是红薯,保存不好就烂  
掉。他向省委汇报后,主张给农民一天留一斤  
口粮,红薯由四斤折一斤粮改为五斤折一斤  
粮,人均380斤以上的队才征购余粮。

1958年4月,河南省遂平县出现了全国  
第一个人民公社,不长时间,很多地方一夜之  
间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修武县提出四年  
实现共产主义,全县一个经济核算单位,  
农民都实行工资制,按月发工资(实际一  
个月都发不了)。各地还大搞一平二调,侵  
犯农民利益。对这些,潘、杨、王也有不同的  
看法。

当时公社食堂越  
办越大,几个村办一  
个食堂,几个村到一  
个地方吃饭,吃一顿  
饭要走几里路。人太  
多,打饭排长队。潘、

杨、王主张食堂办小一点。吴芝圃等认为大食  
堂有十大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可以实现炊事  
机械化。吴芝圃向毛泽东汇报了炊事机械化的  
成绩,毛泽东让把这些炊事机械搬到庐山会议  
上展览。其它省的同志看了不相信。其实,这些  
木制的炊事机械技术上没过关,不能用。庐山  
会议后,邓小平路过郑州要参观食堂机械化,  
他们从省展览馆把木制炊事机械搬到郑州郊  
区老鸦陈村,让省妇联同志化装成农民作讲  
解。

## 罗列“八大罪状”,罢官免职

中共河南省委在反右派斗争中,开始批判  
潘复生。在1957年8月,省委五次全会(扩  
大)指责潘复生主持制定的《关于奖励发展农  
业生产,争取秋季大丰收的宣传要点》是发展  
资本主义的纲领。全会决定停止宣传和执行  
《宣传要点》。这次还决定立即收回河南省委  
1957年7月发的《关于不在县级以下机关开  
展反右派斗争的指示》,认为这个文件对阶级  
斗争形势作了错误的估计,完全违背了党和  
毛主席的指示,违背了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  
学说。

# 人民日报

RENMIN RIBAO

1958年4月15日 星期一  
第3482号

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 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

## 人民公社好

河南信阳专区总结出十大优点四项有利条件

【新华社北京十四日电】河南信阳专区人民公社化运动,在短短的时间内,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据该专区党委负责人向中央汇报,该专区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基本实现,全县人民公社化率达到了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在实现人民公社化的过程中,该专区总结出十大优点和四项有利条件,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十大优点是:一、人民公社化运动,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二、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三、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四、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五、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六、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七、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八、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九、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十、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为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基础。

四项有利条件是:一、党的领导。二、政策支持。三、群众基础。四、物质条件。

1958年《人民日报》关于河南的报道



1958年4月15日  
星期一  
第3482号

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潘复生因病没有参加会议。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在会上作了题为“右倾机会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的发言，指名道姓地批评了潘复生。他在发言中“揭露”了潘复生造成的种种“恶果”，指出：“潘复生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一种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河南对他这种错误思想斗争的胜利，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胜利，是河南工作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毛泽东表扬了吴芝圃这个发言。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人，潘复生名列其中。参加八大二次会议的河南小组，从5月18日到20日，把生病的潘复生从医院拉到会上，对他进行了连续三个半天的揭发批判。5月18日（会议期间），中共中央通知河南省委，免去潘复生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由吴芝圃代替。

吴芝圃在中共八大二次会上给省委打电话，让赶紧准备批判潘复生的材料。1958年6月6日到7月1日，中共河南省第九次全体扩大会议召开，主题是传达贯彻八大二次会议精神，内容是集中批判“潘、杨、王”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次会上给“潘、杨、王”列出了八条罪状：

一，否认阶级斗争，否认两条道路斗争，制造“阶级斗争熄灭论”；二，攻击合作化，否定合作化的优越性，宣扬“小农经济优越论”；三，攻击和企图取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反对批判自发势力；四，和资产阶级右派内外呼应，向党猖狂进攻；五，披着领导反右派斗争的外衣，竭力阻挠、破坏反右派斗争；六，坚持发布发展资本主义的纲领；七，欺骗中央与中央正确路线对抗（主要是指在1957年7月的青岛会议上，潘复生反映河南真实情况，被说成是把河南工作说得“一团糟”）；八，结成反党宗派，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

这次会议认为，他们已经完全形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宗派集团”，同他们斗争的性质“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是坚持执行中央正确路线和反对、歪曲、修正中央

路线的斗争”。

会议建议并报请中央批准，撤销潘复生省委常委、军区政委等职务；撤销杨珏省委书记处书记和省委常委职务；撤销王庭栋省委副秘书长职务。中共中央很快批准了河南省委对潘、杨、王的处理建议。会议作出了《关于彻底批判以潘复生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

## 声势浩大的揭批运动

八大二次会议的会后，中央书记处召集河南参加会议的吴芝圃、杨蔚屏、杨珏等省委领导人开会，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雪峰、刘澜涛等人参加。邓小平说，对潘复生的批判只能在党内进行，不能扩大到社会上。但是，一回到省里，吴芝圃就迫不及待地开展了全社会的大批判。

省委九次全会以后，在全省城乡、党内党外开展了揭批“潘、杨、王”“插红旗、拔白旗”的政治运动。并认为是“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补课，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继续”。

运动声势浩大。《河南日报》在显著地位每天都发表长篇揭发、批判文章和运动进展的新闻报道。新创刊的省委机关刊物《中州评论》的第一、二、三期成了批判“潘、杨、王”的专号。广播电台不断地点“潘、杨、王”的名字，历数其“罪状”。全省各地到处都贴满批判“潘、杨、王”的大标语和丑化他们的漫画，舞台上演出批判“潘、杨、王”的文艺节目。

潘、杨、王三人受到了残酷斗争。就在省委的第九次全体会上，患病的潘复生被“揪”到会上接受批斗。潘、杨、王三家门上贴着白底黑字的“潘家黑店”的横额。门窗玻璃全被砸碎，屋里屋外都贴满了大字报。

对他们三人的处理结果是：潘复生下放到西华农场任副场长；杨珏从8级降为11级，下放到洛阳地区孟津县洪水公社寒亮大队当社员；王庭栋由9级降为12级，在省里公开批斗后，直接押送到许昌地区襄城县孙祠堂公社柳林生产队，让他在这里当了三年社员。

## 错误批判带来极严重后果

河南省“左”倾思想本来比较严重,在反右斗争中,全省共划了6万名右派分子,居全国各省之首。批判“潘杨王反党集团”以后,在党内和干部中更没有人敢讲真话了。

省委主办的《中州评论》上发表了吴芝圃的题为《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的长文,使主观唯心论进一步发展。批真话的斗争升级,讲假话的时尚随着升级。请看当时《人民日报》的报道:6月8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2015斤;6月12日,河南遂平卫星公社亩产3530斤;6月15日,一版头条眉题:《丰收凯歌震天响亿万人民笑开颜》,主题:《河南小麦产量跃增一倍多》,副题:《“观潮派”“算账派”应及时猛省了》。6月18日,河南商丘双楼公社,亩产小麦4412斤;6月21日,河南辉县田庄公社,亩产小麦4535斤;7月12日,河南西平,亩产小麦7320斤;9月13日,河南全省平均亩产水稻千斤,成为千斤省……。在大炼钢铁方面也连放“卫星”,《人民日报》发表了《祝河南大捷》的社论,称赞“曾在小麦产量上名列前茅的河南省,也是全国钢铁生产的一面红旗”。头脑发热的吴芝圃,提出一年实现水利化、机械化、良种化、绿化等“十化”。

河南成了全国的“先进省”,各地有大量的人到河南参观学习。《人民日报》经常报道河南的“先进事迹”,河南一些人也“牛”起来了,对中央各部委来的人也看不上眼。中央工业部长高扬到河南禹县对小高炉炼铁的质量提出了意见,县里领导就说高扬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并当场批判高扬,又将材料转到北京,高扬回北京以后也受到批评。中央党校副校长杨献珍到河南省看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标语,提出了不同意见,也在河南挨了批判,回北京后又挨批评。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邹鲁风对河南的做法提出不同看法,在河南也受到批判。北京的干部从此不敢去河南了。

1958年,河南省粮食产量实际只有281

亿斤,却浮夸到702亿斤。1959年河南有旱灾,粮食产量下降到194.9亿斤,又浮夸到450亿斤。令人悲哀的是,浮夸虽是数字游戏,却让农民承担实实在在的后果。高估产必然带来高征购,1958年征购粮食80.8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8.7%;1959年征购72亿斤,加上公社的自筹粮和周转粮,仍为80.8亿斤,占当年实际产量的37.14%。这两年全省多征购了60多亿斤粮食。农民被迫把种子、饲料、口粮都交了征购任务。因此,秋收后不久就发生粮荒,造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

## 平反以后

数以万计生命的代价使人们开始醒悟:潘、杨、王是正确的,吴芝圃执行的路线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从1960年到1962年,中共中央先后派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习仲勋、陶铸、王任重、王从吾、徐子荣、金明等领导人到河南调查研究,帮助河南解决问题。1961年7月,中共中央派刘建勋任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主管文教。1961年夏季以后,在中共中央的督促下,河南省委开始对潘、杨、王的问题进行甄别核查。1962年4月,中共河南省委作出了《关于潘复生同志“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平反决议》,决议中说:“省委自1957以来批判和处理潘复生同志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关于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同志犯有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决定》是完全错误的,应予撤销。”7月30日和12月20日,河南省委又分别给杨珏、王庭栋平反,恢复原职务和工资级别。

刘建勋、何伟、文敏生、杨珏主持河南省工作后,做了大量的善后工作,河南情况开始好转。

(为写此文杨珏老和冀雨老三次接待作者采访,并修改了稿件,王庭栋同志从山西寄来亲手写的回忆资料,并修改了稿件,此文还采用了《风雨春秋》中张林南同志的文章中的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责任编辑 吴思)

# 书画鉴赏家马宝山长春购宝记

张树林

91岁高龄的马宝山住在北京前三门的一幢老楼里，满墙的书画，使古色古香的老屋略显拥挤。

马老自称没有文化，幼年只在村立小学读过6年书，16岁时来到书画古玩之都的北京琉璃厂，做起了学海泛舟的文化人，因其治学精严，眼光独到，为人耿直，成为琉璃厂一带知名的鉴赏大家。

## 长春收宝

小白楼是当年伪满帝宫内一座刷了白灰的小楼。提起小白楼，书画文物界的“业内人士”无不扼腕，因为那是我国书法名画最惨重的一次浩劫的发生地。

早在1922年，伪满皇帝溥仪就开始从宫中大批偷运文物，运至天津英租界十三号路的一幢楼房里。其中有王羲之父子的墨迹，有钟繇、怀素、欧阳洵、宋高宗、米芾、赵孟頫、董其昌、司马光、王维、阎立本、宋徽宗的真迹以及《长江万里图》、《清明上河图》等。总数大约1000多件手卷字画、200多种挂轴册页、200种左右的宋版书。

这批文物运到天津卖了几十件，伪满成立后，日本关东军参谋吉冈安直又把这些珍品转运东北，置于小白楼。

日本战败，溥仪携120多件文物书画逃往通化县大栗子沟，余下1000多件均被卫队肆意劫掠。在士兵的争抢中有的书画被撕成碎片，有的被分段分赃，有的埋入地下受潮无法修复，最可恶的是伪军金香蕙竟把大量书画付之一炬。命运最好的当属被廉价出售。历代国宝遭此浩劫，令人闻之顿足泣血。

当时马宝山闻听此事，心如刀割，立即星驰长春。情急之下，登报公开收购伪宫流佚的书画。当时人们都认为收买书画是违法的，古玩行人、文人墨客是偷买，大兵们是偷卖。马老此举无疑冒险。

马老向银号高利借贷，按人家的规矩，三个月内不能本利归还，必遭封门拍卖家产的恶果。马老顶着雷上，速买速卖；只卖国人，不卖洋佬。他先后经手了30多件名贵书画，如隋展子虔《游春图》、唐杜牧书《张好好诗》、晋顾恺之《洛神图》、元朱德润《秀野轩图》等，有的卖给故宫，有的卖给收藏家或同行。

登报收购后，京津沈的收藏家、古玩书画商蜂拥而来，价格飞涨。登报既可，公开摆摊叫卖便无不可。一时间长春城里大兵们也立市为商，高声叫卖，胡乱要价，城里竟也涌动着一股奇特的文化潮。长春同行说：“这都是你登报闹的。”马老说：“我不能眼瞧着老祖宗留下的东西全毁了呀！这些东西到了行家手里才保险呐。”对于文物来说，最让人痛心的事，损毁是第一，外流为第二。琉璃厂人是相当特殊的群体，他们既是商人也是文化人，而且相当通古，传世珍品往往就在他们手中决定着去向。马老想，来的这些人为牟利也好，收藏也好，都是保护文化遗产的功臣。

## 稀世珍宝《游春图》

提起马宝山，就不能不说他经办的展子虔《游春图》，因为此图是小白楼散佚文物中最为重要的国宝。

展子虔是山东阳信人，历北齐、北周、隋。在隋为

朝散大夫，帐内都督。展子虔遗留下来的作品，惟有《游春图》最为可靠。宋代曾入宣和内府，有宋徽宗赵佶题签和明初宋濂、明末董其昌等人的诗咏题跋。该图金碧设色，景物浓丽，山峦树石空钩无皴，并且此画卷是北宋原装，完整无损。像这样流传有绪、十美俱备的作品，不但是我国的稀世珍宝，在世界绘画史上也有着重要地位，因为山水画科是展子虔始创的。

据马宝山《书画碑帖见闻录》载：《游春图》乃穆磻忱自长春购得，初与玉池山房马济川、文珍斋冯湛如三人伙买，购价甚廉。由于穆曾在长春买过范仲淹手书《道服赞》卷，经李卓卿介绍卖给靳伯生，李未要介绍费，穆为报答李介绍出售《道服赞》之情，遂对李说：“我买得《游春图》卷，这件国宝能得厚利，算你一伙吧！”李为人忠厚，不愿自得厚利，他与郝葆初、魏丽生、冯湛如有约，要伙买“东北货”，于是又把郝、魏拉入伙内。

大收藏家张伯驹和马宝山是至交，他得知《游春图》的下落后，很想购买到手，苦于与马济川不能接谈，乃同邱振生托马宝山成全此事，并说《游春图》是国家至宝，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叫它流出国外。马宝山非常钦佩张先生的爱国热情，便慨允全力助其成功。马宝山与玉池山房马济川虽是同行，又同是古玩商会理事，但从未有买货及经济来往，要马宝山亲自去找马济川交涉，多半会碰钉子。想来想去，只有找马宝山至友李卓卿商议。经他与马济川等反复商谈，最后以二百两黄金之价议妥，言定现金交易，款画互换。张伯驹手下一时无此巨资，尚需各处筹集。就在这时，老友苏凤山同大千到马宝山家。张大千说：“张群要买《游春图》，托马宝山来谈。他愿出港条二百两。”那时香港的黄金最受欢迎，条件确比张伯驹优越。但马宝山答复说：“已与张伯驹先生说定，不能失信。”又等了些日子，张伯驹说款已备齐，商定在马宝山家办理互换手续。由李卓卿约来鉴定金色的专家黄某，以石试之，张伯驹所付黄金只六成多，计合足金一百三十两，不足之数，张伯驹允续补足，由李卓卿亲手将展卷交给了张伯驹。后催索欠款多次，陆续补至一百七十两，仍欠三十两，由于种种原因，即无限期地拖延了下去。继而“三反”、“五反”运动起，已无暇顾及此事。在运动初期，张伯驹已将展卷等捐献给故宫博物院。

过了几年，运动结束。张伯驹自吉林返京，马宝山到他家去看望。他问马宝山：“展子虔画卷欠款怎么办？”马宝山说：“这几年变化很大，马济川等都完了，你也完了，我也完了，咱们都算完了。”二人大笑一场。

张伯驹最讲面子。他说：“你替我办这事，费了不少心血，我送你字对一副，潘素（张的夫人）画山水一张，略表谢意吧！”

### “三只眼”识真品

马老16岁托人来到北京，在琉璃厂学徒五年半，日日努力，业务精进。他说自己记忆力不好，遂在20岁那年开始记日记，将所见所闻，经手书画碑帖的成交过程及作品的来历、艺术价值记载下来。苦心钻研，挑灯品味，天长日久，练就了一双慧眼。30岁行里出名，人称马王爷三只眼。

提起长春购宝那段往事，马老在《书画碑帖见闻录》中写道：



马宝山近影（周元庆摄）



我到长春的第二天,先到四马路金石斋古玩店看望孙坤一老友。这位老友是山东人,性情直爽,精明能干,善鉴别古瓷及青铜器。旧友相逢,畅谈久别境况,互庆抗日胜利。在谈及业务时,孙坤一慨叹道:“已停业数月,最近才开门营业,只能勉强维持生活而已。”我与他谈及来长春收购原意,他说伪宫遗佚书画未见,只有沈瑞麟家托售四张“四王”画山水轴,问我看能要否。即将四轴悬挂壁间。我看纸本精洁,虽大小尺寸不同,幸无很大差别;裱装整齐同大,都在三四尺之间。这四张“四王”画以王鉴仿巨然山水为最精。王时敏设色浅降山水亦称逸品。王石谷墨宝仿黄公望笔意亦工谨严肃,表达了石谷的绘艺工深。只有王原祁那张清淡略草,非其得意之作。总的说来,这四幅凑到一起,诚非易事,我看了以后内心称赞。彼索价五百元,以四百元购妥。我认为是奇遇,应允三日内付款,即持画回寓。

约晚九时许,至友赵志诚来寓告云:“听说你把金石斋的四张‘四王’画买了尚未付款,幸运幸运,你赶快与其退还。我们和马济川、郝葆初等均看过,都认为是上海人伪造的。”我问:“你们的根据是什么?”他说:“‘四王’画都很难得,哪能四张凑到一起?再说尺寸又差不多一般大,纸地又这样精洁。”我再问其他依据,他一无可答。我乃取出细看,决无半点疑问。我的根据是:“四王”每个人的绘艺及书法特点、印章的刻工、印泥的色彩和纸张的年代等等,无一不合。我对赵志诚说:“你的好意我心领了,深为感激。但是我细看这四张都确真无疑,如你们和我的看法一样,早被你们买走。我以廉价买得,应向诸位致谢。”

又过了两天,北京汇款来,乃与金石斋送去。孙坤一接钱后笑着对我说:“人称你马宝山是马王爷三只眼,鉴别书画碑帖有把握。可是你买的四张画,我都叫北京来的同行看过,都说上海搞(古玩行话‘搞’就是仿造的意思),恐怕你失眠了吧!”

我回答说:“像这样的搞货再有我还买。”后来四张“四王”画寄回北京售给了张子厚,共价三千元。张子厚交韩传文经手卖给故宫博物院。听说是分几次卖的,得利甚丰,不知详数。张子厚精鉴别、善经营,是人所共知的能手。后闻李欣木说,这四张“四王”画是沈瑞麟任外交总长时,同僚们集资由德宝斋经手买的一份寿礼,德宝斋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才备好了这

份寿礼。

我到长春头十天之内只收到四张“四王”画,在同行中一件也未见到小白楼流出的古籍书画,心中非常烦闷。于是去地摊上看那些杂乱物品,文物一类的东西很少,偶尔有之也是不足入目的破烂货。走到五马路西关拐弯处,看到一个碑帖拓片摊,摊主头上戴着个破旧毡帽,正蹲在墙脚下打盹。碑帖拓片全是新拓和翻刻的。本想离去,但细看摊主却有些面熟,便大声把他叫醒。他睁眼一看,立起来道:“你是马大叔吗?”我这才认出来,他是老友王希东的大儿子名叫王玉镜。因为多年未见,他又是晚辈,骤然相遇,内心的感触非同一般。问及生活状况及日本投降时长春地方情景,他说那时市面非常混乱,苏军进入伪宫,伪军自宫内抢出了各样物资。有一个姓朱的伪军,伪满时与其相识,有一天用麻袋背到他家很多书画烦代保存,他说你这是从宫内抢来的,赶快背走吧!当时伪军老朱很不高兴地走了。王玉镜为人谨慎,胆小怕事,是东郭先生一类的老实人,在长春混乱时关门不出,不义之财一文不取。我说是受故宫博物院和北京图书馆的委托,专门来长春收购伪宫流出古籍书画的,并请他大力协助。他慨允道:“大叔放心,我照您指的去办。您老住在哪里?您在旅馆内等我,三五日内准有信息。”我把住处写清交给了他,等了六天还没有消息,便又到地摊处去找,也未见到。就在这天晚上,他拿着一个手卷来了,先说:“物主要价特高,未必能成,请您看看再说吧。”我打开一看,是朱德润画的《秀野轩图》,宋素笺纸水墨山水,笔墨苍莽秀丽。他虽是元人,而大有郭河阳宋人笔法。且后有自书《秀野轩记》及许多名人题咏,完整未损,可称是一件稀世之宝。王玉镜说:“物主要1200元,未免太贵了。物主在街上等着,他不愿来,您还他价,我和他去商量吧!”我说800元可要,王说不能给他这么多,还他600元就可以了。我让他先和物主谈谈,最后仍以800元成交,另外给王玉镜介绍费200元。

我获得这幅《秀野轩图》,内心非常高兴。带回北京后,先请马衡和赵万里来观看,他二人都称是朱德润最佳之作,可惜他们没有收购款项。嘱我一定要卖给国内收藏家。我是从银号高利贷款收购来的,不能在手中久存,乃以3000元卖给了张子厚,解放后此图归了故宫博物院保存。

(责任编辑 吴思)

# 书画家李山

● 韦 顺

李山是享誉国内外的一位现代著名的书画家。他的作品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南京博物馆、成都杜甫草堂、台北历史博物馆和美国萧尔顿美术馆、纽约圣约翰大学、德克萨斯州立大学达拉斯分校等十数家高级艺术殿堂均有收藏。他的家乡山东无棣县专门建立了李山美术馆。他的传略入选了《中国艺术家辞典》、《中国当代名人录》、《中国现代书画篆刻家名鉴》、《国际知识分子名人录》等辞书。

我和李山相识是在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初的那令人不愿忆起的“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中。当时他下放在镇江市的一个公园里打杂；我呢，被关“学习”两年半后，稀里糊涂有了个“中央特派记者”的头衔。有一天他来找我，倾诉了他的心事，这就开始了我和李山的相识、相交。

那是 1974 年夏天，他拿来一个约有七八千字的材料给我，说是情况都写在里面了。我至今印象最深的是一件历史事实被颠倒了的事。1948 年他于四川绵阳六中毕业后，愤慨于当时的贪污腐败、专制独裁、摧残民主，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现实，不满意国民党的统治，一心向往进步民主，于是千里迢迢只身去香港，找他所崇敬的名人郭沫若先生指路。到了香港，两眼一抹黑，几经周折见到了郭先生。郭先生指点他：香港并非福地，速返内地，经山东即可到达解放区，那里是热血青年奔向光明的地方。他听后即返回内地投奔解放区，路经济南

时还被国民党军警疑为共军探子抓起来关了 45 天，后由亲戚请客求情而释放。就这么一件短短时日明明白白的历史事实，却被戴上了“特嫌”的帽子。我把他写的材料交给当时一位负责此类事件的副厅长，问题大致解决了。又过了一段时日，他从镇江返回了南京，不过仍不能回原单位——江苏国画院工作，而是到玄武湖公园打杂。那时候他的日子真难过。我常去他在中山东路三条巷的那个家，看到他一边就着咸菜喝粥，一边握笔作画或写字，就是穷得这样。有一次一位熟人来索画，临走送他一包糖果，他送人家出门时把糖果又还给了人家。友人林白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真是苦涩得一言难发。

家徒四壁，画院难回。一支画笔，报国无门，真是“慨当以慷，忧思难忘”。这样又过了几年。1980 年，有一天他到江苏新华分社来，问我新华社香港分社可有熟人？闲谈中我知道，环境窒息得他心情极度苦闷。美国一位友人请他去讲学展画，拟道经香港，万一有个什么难处，想找个人帮帮忙。年末，他真的告假走了。过了几个月，忽然有位熟人对我说：李山出国只请了几个月的假，现在过期了还没回来，引起有关部门怀疑，他们向上级领导汇报工作，言及此事时的看法是，“逾假不归，意欲不轨”。这种怀疑，在那个时候，借鲁迅的话来讲，就是，“给某些人以整人的便利”。听了这位熟人的话，心下暗忖：一只 60 年代起就屡遭无妄之灾的“惊弓之鸟”，这下恐难以归巢了。是夜浮想联翩，辗转

反侧不能入寐。我联想起了自己的一个历史“公案”：50年代末，忽然有人检举我在旧社会读书时参加了“三青团”，组织上三番五次调查，我也三番五次写了材料，不过结论两样。单位说根据调查的材料看，我是参加了“三青团”；我说我没参加，那调查的材料不可靠。那么，谁说的算数呢？那个时候这个问题是用不着回答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做了结论，材料也塞进了我的档案。这段“公案”直到1969年，组织上又一次认真、详细、全面调查，终于澄清，重新做了结论，还我以清白。想起这件事，我起身记下了当时的感想：

同是天涯逆旅客，征途驿站幸相逢。

平生自问心无愧，管他说西又道东。

自从李山定居美国并加入美籍以后，我们已是“良友远别离，各在天一方”了。这些年，或梧桐夜雨，或烟波江上，我常常念忆起他的身影：不喜不怒的面容，坚韧沉稳的神情，忍辱负重的心境和在任何人家都不喝一杯茶的个性。此刻，我又一次打开了他从地球的那一端寄来的画册：《半日风尘未下鞍》、《冰山大漠走征程》、《搏斗的三峡》、《欢笑秋天》、《待发图》、《风雪行》、《夏雨》、《飞翔》……他在《夏雨》这幅画的注脚中说：“迎着那打在身上的骤雨疾风，和铺天盖地的电闪雷鸣，大树，它没有折腰反而更高地昂起了它不屈的头颅。”这使我想起了他因一张根据农村写生所画的创作小草图而发生的可惊可奇可气可笑的故事。那是1964年农村“社教”的年代，画家响应号召去农村体验生活。李山在农村数月，公社社员们提水、育秧、巡查、管护，日夜辛劳的情景感染了他。坐在田边，他画了一张《田间小路》的创作草图：近景是秧田，中景是水渠，渠上有一条架着抽水机的小船，秧田间的田埂上有社员们赤脚踩出的脚印，水渠倒映着一抹微红的曙光，题句是：“辛勤一夜灌水足，秧苗又长几多许”。就是这么一个简简单单一目了然的现实画面，却遭到了得风气之先的一位画家先生在“座谈会”上这样的批判：“人民公社是一条金光大道，但是，在李山的笔下，却画成一条小路，行吗？小路上脚印很多，这是些什么人的脚印？是

偷窃的人呢，还是地富反坏右来破坏的脚印？要好好地挖一下思想！”天呐，中年以上的人该知道，在那个时候，谁要是被指为攻击“三面红旗”的一面——人民公社，也就意味着是反动分子。罪名一成立，不坐牢也得劳改。当时，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气氛下，别人只好沉默，随大流顺水推舟。可当主持会议的人叫李山表个态时，他却来了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说：“我通过茁壮的秧苗和田埂上的脚印，让人感受到社员的辛勤劳动，而没有直接画出人。这种不画人而表现人的手法并不是我的创造，我是向别人学来的。在此之前，我曾见过一幅画，画面是这样的：一座山的悬崖上竖立着一根电线杆，电线杆的顶端已高出画面之外，从顶端垂下电线，电杆下悬崖上有件衣服和电工用具，远处山峰连绵。我当时认为这是一幅好画，很喜欢。我的理解是：这是表现电线工人把线路修建到边疆，为了工作方便或者累出了汗，把衣服脱在了电线杆下，而人当时正在画面之外的电杆上端忙于连接电线。这样，人并不在画面上出现，却能表现出电线工人不畏艰险建设边疆的精神。我是学了这种表现手法画了《田间小路》这幅创作小草图的。今天听了画这幅画的同志对我的批判帮助，说画了秧田的田埂就是象征人民公社是小路，画了田埂上的脚印就可能是地富反坏右的脚印，那么，同样的道理，竖在悬崖上的电线杆是不是在说，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已经到了危险的悬崖边缘了呢？地下丢的衣服是不是表现人已跳崖自杀，或是丢下衣服偷越国境了呢？依照批判我的逻辑来说，他的画就应该是这么个意思。那么，我想问，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条金光大道，画作者为什么要把它比作已在悬崖的危险边缘呢？”看，李山就是这么个倔强的人。他对别有用心的“帮助”的这个表态，使会议冷了场，散了会。当然，这笔账人家记住了。不久，在“阶级斗争新动向”的笼罩下，他就被指派去农村“劳动锻炼”了，离开了画院画室，拿起了锹锄犁耙。

1992年，66岁的李山，已定居美国12年。这一年5月，他回到中国，去新疆写生和收集作画资料，进天山、阿尔泰山，下南疆喀什。他带着

200多卷胶卷,拍了7000多张资料片,有人物生活、服饰道具、山水骆驼,折回北京飞去莫斯科。他想看看这个30年来自己曾追求并期望成为自己明天的伟大榜样。但是,在莫斯科看到的,是食品店的柜架上三分之二是空的,他惆怅而去。他从莫斯科乘国际列车横过欧洲大陆,过英吉利海峡到伦敦,在市中心区的一个广场上,看到人们正在用面包、米粮喂鸽子,鸽子在天空、在地上,在人们的肩头上、手臂上。两地相比,他感慨万千。

1994年夏,李山又从天而降,到了南京。他是从美国到台北举行个人画展,然后转过来的。在他的住所中心大酒店(他本来是住在南京自己原来的两间小房里,中心的总经理知道了,特请他住店)。我们有过几次闲聊和长谈。这些年他在美国,买了花园楼房、汽车,生活与当年三条巷是不可同日而语了。可他那敞开的衬衫,蓬乱的头发,赤脚短裤,一点也不像喝了洋水就带着洋味回来的人。他告诉我,他在美国,多少年几乎没打过领带,一点也没感到比谁矮一点。多年不见,第一次,话不知从何谈起。他忽然起身走到桌边,说:“我给你唱首歌吧。”我很惊奇,以往,在一起多年,我也没听他唱过歌。但见他

摊开宣纸,拿起毛笔,说:“这歌词、曲都是我自已作的。”于是一边挥洒,一边吟唱:“风沙掩盖了戈壁,飞雪封闭了冰河,天上的雄鹰迷失了路,在这漫漫的旅途上,请听我的驼铃歌。歌声中有我生死的深情,歌声中有我漂泊的寂寞,歌声中有我不屈的灵魂,歌声中有我激烈的地火。太久了,这万年的冰雪,太久了,这千年的枷锁。欢笑将会来到这冰封的土地,花朵将会盛开在明天的山河……”我听着,忆着,想着,心中忽然涌出他在另一幅书法中写的两句话:“书剑天涯几杯酒,悲欢人生一只歌。”这是他概述自己的遭遇吗?这是他抒发自己的胸臆吗?这里有什么昨天的控诉和明天的憧憬吗?

又一个晚上,我们聊起了他近几年的研究。这时候,他讲得较多的不是绘画而是书法了。他说,近些年来,他除了绘画,对书法的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构成书法的要素有三,即用笔、结体、整体旋律包括行气。用笔的要求是笔力遒劲、力透纸背,这个不难;结体就多样了,横平竖直如印刷体者是欧字,盘弓勒马引而未发者是柳字,巍然端庄心广体胖者是颜字,潇洒闲散俊秀如书生者是赵字,衣带临风清瘦婀娜者是瘦金体,他如扁、长、斜、方、上密下疏、上



李山书苏轼词《水调歌头》



此为李山的作品

窄下宽等等；至于包括行气在内的旋律，这是书法中更重要的、也是中国书法中还未加以解决的问题。他说，看前人的书法，写悲伤时字是一行行如算盘珠排列一样写下来，写欢乐时亦复如是，看不出感情所应唤起的在整体篇章中不同的波澜起伏。他认为，在我国书法历史上很难找出已经解决了艺术旋律包括整体行气的范例。在今人中，他认为草书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林散之的草书和潘天寿的行书。为了探讨书法旋律问题，李山近几年来锲而不舍地埋头研读所能获得的古今书法名著和作品，并从歌曲、乐曲、戏曲、诗词、绘画、舞蹈中汲取营养，丰富书法艺术旋律的内涵。他列举了他书写“疏影横斜水清浅……”、“白日依山尽……”、“帘外雨潺潺……”、“当年万里觅封侯……”等前人诗词时，他自己的情感倾泄是如何表达的。他说：“我希望在我的书写旋律中，能留下冰雪的凛冽，能飘出春风的轻柔，能映出山岳的雄峙，能醉于映日的荷花，能显出跋涉的艰辛，能听到秋虫的低吟，能悲感于诗人的叹息，能激荡于烈士的豪雄。”这就是说，他把自己的绘画、音乐、舞蹈、文学等方面的知识都融入了书法艺术的旋律之中。

在南京短暂的时日，李山可谓忙人，要画画，要看朋友，要购买书画用品，还要接待来访。江苏人民广播电台的周小姐就专访了他，录音

后，他连带子都没来得及拿就飞走了，临行托我将来寄给他。我总觉得我们话没谈完似的，便说了句“明年自己再来拿吧”。我是期待着一年后再见的。哪知杜宇声声，几年过去了，我在心底常想着费翔的名歌“归来吧，归来哟，远在天涯的游子……”可他总没有回来的确切时日。不仅如此，有一天，他的纽约来函却带来一个令人忧心的消息：他患了癌症！我除了在心底为他祈祷，还能做什么呢？飞鸿慰问，鼓励振作，这只是无可奈何的精神安慰啊。等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信，说经过检查、住院、手术等一系列的治疗，痊愈了。这当然是天大的喜讯。但我马上又想到，听说美国医疗费用特别昂贵，这下他得花多少钱呐。我去信探问那边的医疗制度，他的回信是这样说的：“在美国，65岁之后的全部公民，有永久居留权的侨民，凡在美国已交税满十年的，都有政府所办的老年医疗保险。自己得了病，只需要一点门诊费，其他则全部免费。我为检查、咨询、住院、麻醉、开刀、服药等，大约花费4万美元左右，我自己只付了100美元左右的门诊费，其它全部是政府的老年医疗保险付了。而且这些付款的事不需要我过问，都由医院、医生、药房与保险公司直接办了。”

大约是1997年，李山在台湾历史博物馆举行书画个展，引起了轰动。他的画出过几本画集。大家比较熟悉。而他的书法，大家见得少，所以更为关注。一位蒋一中先生在《投资中国》杂志上发表的《深沉灵魂的悸动》一文中，评介他的书法说：“千百年来众多书法家所想解决的行气问题，他的作品做了很好的诠释，字里行间无一不充满着抑扬顿挫，随着诗文内容有荡气回肠，有忧感徘徊，有欢笑悲伤，有铁马嘶鸣；心潮随之起起落落、高亢低沉，时而抑郁，时而舒坦，千回百转。字已不再是字，是音符、节奏、舞蹈、画幅，是活生生的精灵在眼前摆弄人的情感。”还有位老人参观后走到李山面前说：“你的画，别人经过努力将是可以达到的；你的字，

别人即使经过努力也是难以达到的。”画家詹忠效写信给李山：“以往，中国传统艺术中被认为发展得最完善成熟、后来者已无针可插的莫过于书法。而今，您将自己的多年研究，结合古今论证去敲打这座大门，在情在理地断言原有的不足，指出有提高的潜力。这个问题提出的本身，对书法界无疑是一个启示，一个贡献。”

本来，台湾的出版社出版了李山的山水、花鸟、人物几个绘画专集之后，即着手编辑出版他的书法集。作品已拍完正片即将付梓之时，李山改变了注意，不想匆忙问世出名。他与出版社商量，原集不再印刷，出版他新研究成果的作品，他写了一篇序文《书法艺术旋律论》。7000多字，谈了旋律在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书法旋律是什么，旋律与行气的关系，研究旋律应有的借鉴，旋律研究在书法艺术中未来的远景等。另选草书50幅，每幅有各自不同的艺术结构，表达不同的文字内涵，形成一个完整的艺术体系，也是论文的印证。这本书法集将在上海与台北两地出版。这种“会当凌绝顶”的精神，作为朋友，我由衷地期待着他的成功！

1981年始，李山先后在美国尼布拉斯州立大学、威斯廉大学、圣陶玛斯大学、休斯顿妇女学院等十所高等院校讲学，林肯市市长赠以城门钥匙，表示随时欢迎他的到来，尼布拉斯州州长赠以名誉“海军司令”证书，作为他对中美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纪念。这期间，他先后在美国的旧金山、林肯、纽约，日本的名古屋，马来西亚的吉隆坡，新加坡以及香港、台湾地区举办个展，出版了《李山新疆画集》、《李山中国画选》、《李山花鸟画集》、《李山山水画集》、《李山画集》、《李山作品》等七八部画选集。他的画，特别是人物画，备受赞誉。有人说：国画中人物最难，李山的画，人物最长。当然，李山也画飞禽走兽花卉山水。他画的骆驼，从画面上就能令人听到山风的呼啸，觉着冰雪的寒凉，同时领略出骆驼那种吃苦耐劳、坚忍不拔的精神。有一次在中心大酒店的住处，我跟李山闲聊时，忽然来了两个人，谦恭而坦率地说，是来买李老师画的。李山觉得很突然，自己没有一点准备，便一边招呼他们坐下，一边问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异

口同声地说，要骆驼。我虽觉得好笑，但感到人家慕名而来，应当满足。可认真的李山却说，骆驼不是立马能画好的。他俩也觉着难了。可远道而来，又不愿空手而回，就说别的也行，只要是李老师画的。于是李山拿出两张花鸟画。当他们把钱放在桌上时，李山数也没数，就从一叠钞票中抽出几张还给他们，说：“你们远道而来，今天打折！”他俩高兴地笑着走了。李山画的山峰、野花、小草、蜜蜂，也别有个性，出了专门的画集。人们之所以更推重他的人物画，不仅是说画得形似、漂亮，更主要的是感人、耐看，内涵丰富。海内外不少艺术评论家说过这样的话：李山的画可以品尝，耐人回味；而这一点恰是许多有极好造型基础的画家所忽略了的，当然，画境达此，作者不单要有高超的画技，而且要有知识、情感、人格作底蕴。澳大利亚出版的英文双月刊《国际艺术家》杂志，是个学术性的纯美术杂志，它介绍世界各地优秀画家。杂志编辑在世界性电脑网页上见了李山的作品，特约李山提供作品与资料，决定从2001年4月出版的第18期开始，开辟李山专栏。

我有一段日子没给他写信了，是觉得他癌症初复，应当休息，不要太赶出版的进度。我们都是古稀之人了。哪知友人伯平给他写信，说我前一阵因病住了医院（其实伯平自己倒是几年都在病中）。于是他赶忙给我写信，除告他的近况外，信内还夹两张书画，要我卖掉，以补充家用。信内还详细告诉了他的画在美国的价格，以作参考。啊，读完他的信，用一句套话来说，真是感慨丛生，浮想联翩呐。也许，他还以为我这个只靠工薪生活的人，还像20年前他在国内一样窘困呢。说实在的，改革开放以来，这些年我们的生活确有了改善，何况我还享受着全公费医疗呢。但他的坦直、真诚、毫不做作，确是与别人别样的。

阔别廿年，忆之慨然。李山不管是少年寻求进步，中年数历坎坷，还是老年移居国外，他总是在探索、追求，希望祖国繁荣昌盛。正是：

离国祇缘求索志 长天万里一骄鹰。

（责任编辑 方实）



# 黑社会组织犯罪的历史成因

● 江仁宝

我国反黑斗争的经历,不同于世界各国和地区。在旧中国,黑社会势力是一股巨大的社会势力。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摧毁了横行于旧社会的黑社会势力。为什么现在又死灰复燃、滋生蔓延呢?这里面既有历史方面现实方面的原因和条件,又有主观方面客观方面的原因和条件。

## 一

在探析黑社会的发展历史和黑社会犯罪的历史成因前,先要了解什么是黑社会犯罪?

在我国,多数犯罪学学者认为,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的典型形态,也是危害最大的有组织犯罪。什么是“有组织犯罪”?

首先,黑社会犯罪是众人聚集在一起的有组织犯罪。其次,有组织犯罪的黑社会犯罪,是有着森严的帮规和等级分层管理制度,被群众称之为“第二政府”。再次,黑社会犯罪是有组织犯罪中较为成熟和最为成熟的两种形态。我国新刑法第 294 条第一款规定: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是指以暴力威胁或其它手段,有组织地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称霸一方,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的非法组织。2000 年 12 月 4 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148 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审理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指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一般应具备以下特征:①组织结构比较严密,人数较多,有比较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较为严格的组织纪律;②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其它经济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

定的经济实力;③通过贿赂、威胁等手段,引诱、逼迫国家工作人员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活动,或者为其提供非法保护;④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故意伤害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笔者认为,从以上特征可以看出,这些黑社会性质犯罪一旦出现,就表现了很强的反社会性,这一点与国际黑社会组织并无两样。但同国内的一般犯罪团伙相比较,无论在组织程度、活动能量、犯罪职业化程度和社会危害上,明显地超过了一般的犯罪团伙。

## 二

我国犯罪学专家普遍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黑社会的发展过程具有不平衡性和不同步性,但综观其产生、发展乃至灭亡的过程,其简要历史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首先是萌芽时期。从几个黑社会问题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来看,黑社会最早起源于公元 17 世纪。萌芽时期并没有形成完整意义上的黑社会,但却在当时的社会中逐渐分离出一个独特的游民阶层。这个阶层处于社会的边缘地带,没有社会地位,没有雄厚的经济基础,也没有能力主宰自己的命运。其中不乏贫穷的农民、小生产者等社会底层的人员,也包括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社会异己力量。这个阶层以地缘关系为纽带,或以谋求自下而上为共同目的,总之,这个时期,产生黑社会组织的社会基础已经形成,在当时社会中存在着一个自发的亚社会群体,它是产生黑社会组织的直接源头。拿意大利黑手党来说,它最初是 17 世纪在

西西里岛起家的,其前身是由西西里岛的贫苦农民在岛上的封建地主阶级统率下组成的“雇佣军阶层”。作为封建领主的附庸,这些“雇佣军”逐渐发展为当时经济落后社会中的封建武装,成为地主阶级统治农民、维护地主阶级私有制的工具。

其它如日本、台湾地区的黑社会萌芽时期也开始于17世纪。

其次是形成时期。随着历史的发展,游民阶层逐步演变成帮会势力,并且初步具备了现代意义上的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比如相对固定的名称、较严密的组织机构和明确的帮规戒律等等。这些帮会势力因前期政治使命的终结,丧失了明确的政治目标,反社会性增强,并且出于帮派自下而上的考虑,开始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它在形成时期的显著特征是组织机构的内聚力增强和社会危害性日趋明显。

如台湾,在长达50年的日本统治时期,受到日本黑社会组织“黑龙会”的诱导,加速向黑社会帮派的演变,初步形成帮会势力,成为日本殖民统治的工具。1945年后,日本统治的帮派势力蜕变为社会型帮派,活动地域稳定,以收保护费、包娼庇赌为经济来源,产生了第一代具有固定名称的组织,比较有名的如“十二生肖帮”、“大桥头”、“大九峒”、“华山”、“牛埔仔”等。20世纪50年代初,国民党势力从大陆败退入台,使台湾本省人和外省人的矛盾冲突加剧,从而产生了以地缘为纽带,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社会帮派,著名的有“厦门帮”、“小九龙”、“西霸天”、“十二把刀”、“十三太保”等,20世纪60年代中期,形成“四海帮”、“竹联帮”两派争霸的格局。“竹联帮”虽出道较晚,但帮规帮纪比较完备,1965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台湾第一大帮。

再如香港黑社会“三合会”是带有反清复明宗旨的洪门组织的延伸。1842年英国治港后,其活动受到压制,但在省港大罢工期间趁机壮大势力,并公开进行犯罪活动。1941年日本侵占香港,这些组织勾结日寇,开设赌场、迫害“慰安妇”、出卖抗日志士,借助日军的庇护鱼肉百姓,无恶不作。1945年日军投降,港英

政府通过“肃奸运动”惩办了一批黑社会分子,但未触动黑社会的根基,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又形成了稳定的势力范围,它们的经济来源主要靠收取“保护费”。大陆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势力逃港,使黑社会势力得到壮大,国民党头目葛肇煌借助国民党政府的经济 and 情报支持,组建了“14K”,其实力超过香港传统帮会“和字头”集团,成为香港最大的黑社会组织。

再次是泛滥时期。20世纪60年代后,黑社会问题相当严重的国家和地区的黑社会势力相继呈现泛滥趋势,他们不仅具备了当代黑社会的所有特点,而且较之前两个时期有着明显的新特点:

一是组织数量剧增,社会危害加剧。以日本黑社会为例,1963年,全日本黑社会团体5216个,成员达18万之多,创日本黑社会历史最高纪录。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黑社会组织也达到568个,约3334人。20世纪90年代香港黑社会组织则多达57个,成员约有30万人左右。组织数量的急增,使扩张势力成为必然,黑社会组织势力范围的重划,必然导致帮派之间火并频繁,使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暴力犯罪从数量和质量上均有所升级,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从20世纪50年代起,台湾黑社会组织与犯罪关系非常密切。在黑社会组织恶性膨胀时期,即1974年至1980年间,台湾全岛犯罪每年平均增长率为5.34%,1989年黑社会势力的发展又使凶杀、抢劫、绑架、勒索等严重暴力犯罪较1988年上升23.1%,这一时期正值台湾黑社会发展的第二个高峰。1994年台湾黑社会帮派总计达1236个,成员有10582人,他们严重危害社会治安,使60%以上的居民受到黑社会的威胁。

二是经济基础日趋雄厚,渗透到社会经济各个领域。黑社会组织借助传统的收取保护费和经营黄、赌、毒等敛财方式,长期形成了雄厚的经济实力。据日本警方统计,1992年日本黑社会组织年收入超过96亿美元。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黑社会经营合法企业的收入已占其收入的16.8%,涉及金融、证券、房地产等领

域。台湾的黑社会屡遭警方打击,转向“企业兴帮”的模式,20世纪70年代初,黑社会插手证券业,20世纪90年代又向建筑业渗透,暴力介入招投标活动,企图谋取巨额利润。总之,经济基础的日益雄厚和警方的大力扫黑,迫使黑社会组织经济观念产生微妙变化,从而“反客为主”地强占了社会经济体系中的份额,它不仅说明黑社会实力的不可低估,也昭示了这一反社会体系与正常社会的经济基础的对比关系已经产生质变,这一动向已经引起各国和地区政府的警惕。

三是宣扬黑帮文化,侵蚀社会正统文化。黑帮文化是黑社会组织不断繁衍的产物,在前两个历史时期,黑帮文化秘而不传,只存在于黑社会组织内部,具体表现形态是黑帮入会仪式、社交礼仪和与之相关的制度。到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黑社会组织经济实力的增加和生存能力的加强,加上黑社会势力对文化娱乐界的顽强渗透,黑帮文化在被精美的商品包装之后,堂而皇之地与社会传统文化并驾齐驱。黑帮文化的传播,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社会正统文化的主导地位,也成为黑社会组织从本土向域外扩张的文化工具。许多以黑社会成员的经历为蓝本的影视作品已向世界各地流传。香港的“新义安”是在影视界中势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它在早期即拍摄了著名黑帮题材电影《英雄本色》,其后该帮大哥级人物向华胜则亲自在黑帮电影《赌神》中扮演主角。这些影视作品所宣扬的病态的英雄主义和

逞凶斗狠的作风习气严重侵蚀了东南亚地区的青少年,黑帮电影中的暴力、色情内容影响了香港影视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对我国内地已产生了影响,特别对青少年已构成了严重威胁。在某种意义上说,黑社会题材的文化产品是黑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精神产物,也是黑社会这一反社会系统具有文化功能的标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黑社会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潜在的威胁性。

### 三

我国黑社会组织犯罪的产生有其复杂的历史原因,从一些犯罪学专家研究的情况看,旧中国就存在着一个由失业、半失业人群组成的游民阶层。他们的封建帮会意识根深蒂固。毛泽东同志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指出:“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是人类生活中最不安定者。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皖豫鲁等省的‘大刀会’,直隶及东三省的‘在理会’,上海等处的‘青帮’,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里所说的“三合会”、“哥老会”、“大刀会”都属洪帮体系。毛泽东同志在文章中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即帮会产生于游民无产者阶层,是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

早期的青帮也叫“家理”,人青帮也称“在家理”。“家理”中有这样一句话:“有理(指家理的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在旧社会各个阶层和各行各业中,相当多的人都是“家理人”。青帮是家长制式的帮会组织,帮内兄弟、师徒之间的关系互相要求很严格,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师徒如父子,兄弟如手足”,是他们的口号。帮内人员的关系就像一个金字塔,高居塔顶的是当时辈分最高的老太爷,但是青帮成员在帮内的地位除了受辈分的限制,同时还与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有极大关系。在青帮发展



青帮首领杜月笙(左)和张啸林(右)

过程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应该首推他们的创始人翁岩、钱坚、潘清三人。清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的粮运屡遭匪帮劫持，于是清政府悬榜招人，保卫漕运，翁、钱、潘三人合伙揭榜，并向抚台田文镜谈了整顿漕运的设想，田觉得他们三人的建议可行，于是上奏皇帝，最后皇帝下旨同意翁、钱、潘组织漕运。三人接受任务后，四处联络各地帮会和粮帮组织，以为清政府漕运粮食之名组织新的帮会。他们将运河、运船等事情布置好后，大开香堂，广收门徒，建立起了青帮组织，并使之发展壮大起来。后来，因不满清朝日益腐败堕落和对青帮的血腥镇压，青帮掀起的反清斗争不断升级，发展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如1771年山东临清的起义；1815年的安徽巢湖起义等都主要是以青帮的力量发起的，各次起义的首领也皆为青帮中的首脑人物。青帮组织能够延续几百年，虽然关键在于近代中国特殊社会的特殊环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但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它的内部组织关系。青帮收徒十分严格，帮规也很完备，对犯了帮规的门徒按照“家法规定”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因此大多数门徒都能严守帮规“家法”，孝帮胜孝父母，从帮胜过官府。当然帮内的老头子无论怎样骄侈淫荡，无论干尽了怎样的坏事，依然可以逍遥于帮规之外。青帮比洪帮出现得虽然晚些，但发展很快，影响也很大。青帮成员包括国家官员、游民、差勇等各阶层人士。清朝垮台后，青帮势力大长，远远胜于洪帮，成为遍布全国的黑社会组织。青帮散布全国各地的派别，由于其组织上的便利和它本身的斗争性，因而就成为各政治势力拉拢的对象。旧民主革命时期，同盟会积极联络全国各地帮会成员，青帮则成为最大的争取对象，在同盟会会员的活动下，很多青帮派别，也都倾向于革命了，热情地投入到推翻清王朝的斗争之中。北洋军阀时期，有些青帮人物与地方军阀狼狈为奸，横行一方，走向了全面反动的道路。国民党统治时代是青帮最昌顺的时期，其头子黄金荣、杜月笙等直接投身于蒋介石的怀抱，1927年他们帮助蒋介石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四一二”反革

命大屠杀，大批共产党员死于青帮手中。后来很多青帮人物直接参与国民党的政治活动，有的担任中央重要职务。杜月笙和黄金荣过生日或建祠落成时，蒋介石亲自赠送贺礼。抗日战争时期，青帮发展到了鼎盛时期。1949年，蒋家王朝在大陆覆灭，青帮也随之土崩瓦解。

至于洪帮，要从明末时期说起。当时在民族危难当头，反清势力各自为战，结果被满清政府各个击破。后来，反清势力的残余力量，认识到只有团结一致，才能挽救汉族人民，所以，一些抗清复明的人士共同创建“汉留”组织，反抗满族外来人的统治，洪门洪帮便是这种组织。它以明太祖朱元璋的年号“洪武”为证而起帮名，含“缅怀先祖，抗清复明”之意。洪门的秘密暗号为“明大复心一”，倒过来念就是“一心复大明”。这五字箴言绝对保密，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违者格杀勿论。这是洪门的宗旨。洪门的性质是封建的，山主是以公、侯、伯、子、男自封，称仁义弟兄维护五常八德。据有关史料记载，洪门的成分包括破了产的农民、城市手工业者、贫民以及学有功名不得意的穷秀才等等，大都具有“江湖游民的本质”。洪门的组织名称很多，有“汉留”、“三合会”、“天地会”、“红灯照”、“哥老会”等等。其内部规章体制和言行大体相同。洪帮作为兄弟帮，帮内以兄弟相称，成员之间横向关系，效法三国时期刘、关、张桃园结义之意，兄弟间分十排，以此来区别地位之高低。洪门的组织严密，约束周至，违犯帮规者，常受到降刑黜刑和极刑。由于洪门是秘密组织，所以没有开除洪门组织的处罚，怕被开除的兄弟脱离洪门组织后，泄露其内部的秘密。洪帮是一个庞大的全国性帮会组织，不少民间组织都合并到洪门中来，成为一股强大的反清力量。鸦片战争后，洪帮曾在两湖、两广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反清和抗击外来侵略。辛亥革命时期，有些地方的派系受同盟会领导。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也是洪门中人。1893年，他在美国檀香山结识“三合会”首领郑大良，并由他介绍参加了洪门组织，然后，他亲自组织“致公党”，创建“兴中会”，开立“大陆山”，并利用洪门组织，派会

员郑弼臣、陈少苓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士，进行革命活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近300年的清王朝。尽管洪门是同盟会推翻满清政府的同盟军，但是参与国家的决策是洪门做不到的。因此洪门在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地位便开始下降，逐渐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陪衬。然而，由于洪门子弟对民国的建立做出过贡献，加之国民党及其政府中有许多著名人物及要员曾加入过洪门山堂，所以国民党当局对洪门特别优待，给予了合法的地位，而洪门也一直支持国民党。1949年国民党逃离大陆溃退台湾之际，仍有洪门的许多成员随着撤往台湾，洪门的龙头大哥后在台湾重建了自己的山堂，台湾现有山堂达30个。

综上所述，无论“青帮”还是“洪帮”，原本是以“经济互助”或“反清复明”为目的的帮派组织，随着清王朝的覆灭，他们失去了政治目标，相继演变成旧中国最大的两个黑社会组织。这种演变不是偶然的，是游民无产阶级本性所决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将游民无产阶级称为“流氓无产阶级”，指出：“流氓无产阶级是旧社会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他们有时也被无产阶级革命党卷到运动里来，但是，由于他们整个生活状况，他们更甘心于收买，去干反动的勾当。”大量历史事实表明：旧中国最下层中消极的腐化的部分容易滋生、演变成黑社会毒瘤。游民向来是反社会的一个重要群体，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他们是各



杜月笙家祠仪仗队通过法租界，电车停驶两个小时

种民间秘密结社和帮会的积极参加者和基本群众，也是反动统治阶级利用和操纵的黑社会帮派成员的重要来源。历史有着强大的惯性，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自身民众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因而有着浓厚历史传统的黑社会帮派组织，再生能力很强，很难将它从根本上铲除。在旧中国，帮派历史十分悠久，黑社会组织结构成熟发达，帮派意识非常浓厚。新中国成立后，虽已取缔，但其精神尚存，他们那种拉帮结伙、好逸恶劳、反社会、干破坏等游民帮派意识流毒并未消除，其危害经久不衰，甚至到了十年“文化大革命”动乱时，帮派意识仍又重新抬头。有的专家在分析青少年团伙犯罪时指出：“文化大革命”中，社会的基本单位就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造反组织”，各单位、各部门、各系统、各地区的群众都可自行结伙成帮，起来“造反”、“夺权”。整个社会形成的这种拉帮结伙风气，并未因“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而消失，在十年动乱之后，社会大量出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模式，就是动乱社会的“基本模式”的延续。此分析自然也可用于今天帮会成因的解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人们思想大解放，封建行帮思想及其腐朽意识随着乘机复燃。尤其是在一些偏远落后、有秘密结社传统、尚武好斗的农村和城镇，黑社会性质的帮会组织孕育发展很快。如在旧中国盗匪横行的东北三省，军阀割据、山匪水霸猖獗的湘鄂等地，袍哥纷争的川黔等省，当今仍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高发地区，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组织结构上都具有宗族和帮派的封建性。当今中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犯罪团伙同过去封建帮会的传统有着明显的历史渊源。特别是许多横行乡里、称霸一方的地方黑恶势力、村匪屯霸，在车站码头、集贸市场等场所出现的地痞流氓犯罪群体，组织上的宗族性和帮派性特征非常明显。团伙成员之间以“江湖义气”为精神支柱和思想纽带，奉行“为朋友两肋插刀在所不辞”的“侠肝义胆”和称王称霸的个人英雄主义为信条。由此可见，他们继承的是地地道道的封建传统的衣钵。

（责任编辑 程 度）



# 天堂与天国种种

舒 展

坏人不怕下地狱,然而虔诚的宗教徒却盼着上天堂。天堂是什么样的呢?

不同的宗教经典,都构想出各自的天堂。

阿拉伯语“aljannan”,汉语可译为“天堂”,也就是《古兰经》里说的“乐园”。凡是今世生活中信道而行善者,敬重安拉者,为安拉之道阵亡者以及履行宗教义务者,到了“世后”都可以进天堂;在那里有绿荫覆庇,有水、乳、酒和河流,住的是大厦,吃的是鲜果,还有白皙明眸的妻子陪伴,永远享受着和平宁静的生活。这种境界,即令是无神论者,恐怕也会心向往之吧。

再看基督教教义的“永生”说,认为人的生命是暂时的,只有灵魂得到上帝的拯救,升入天堂,才能得到超越时间空间永恒的不死的生命,不再有悲哀、号哭和疼痛。天堂四四方方4000里,圣城建造在12层基石之上,各层均镶嵌着精美各异的宝石,墙为碧玉,城乃精金,城中是绿荫大道,街中有明净的河水,花园里有每个月都结不同果实的生命之树,所有复活的义人都会住进这里侍奉上帝,同享永生的幸福(《新约·启示录》)。

佛教的天国也很神奇,说是有个巨大无比的金山叫须弥山,它是宇宙的中心,日月星辰都以它为轴,山顶上有一座富丽堂皇的“善见城”就是天宫,城里住着一位瞬间就能考虑上千种事情、具有超常本领的“能天帝”(亦称“帝释天”),他是欲界“忉(音刀,忧烦)利天”众神之王,他头顶上有直径三百里那么大的一个华盖大伞,侍奉他的有2500万天女,他

是护法卫道的最高主宰,人间出现了暴君,能天帝也可以施以惩罚;佛陀涅槃时,他还可以显身保护“舍利”(遗体)。佛经教义中有“三世因果”说,即前世造因,今世受果;今世造因,来世受果;根据你的善恶行为,善的可以升上天界为天人,生于人间为一般人;作恶的会变成畜生、魔鬼,或坠入地狱。善良的佛教徒,当然都企盼祝祷自己能到善见城落户。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它的天堂就是玉皇大帝居住的地方——南天门的凌霄殿。玉帝总管三界十方四生六道。我国各地山川名胜多有玉帝庙、观、殿、顶,我想它们就是道教天国的实物化吧。《西游记》里孙大圣上到金光万道滚红霓、瑞云千条喷紫雾的天宫,偷吃蟠桃,戏弄神仙,大捣其乱的地方,就是这个所在。

综观几大宗教的天堂,颇有不少相同之处,一是有个最高主宰——统一、高度集中;二是不愁生计,物质生活超过最发达的国家,遑论小康;三是没有或很少有战争、内讧、厮咬、贪官、盗贼,人际关系平等和谐;四是天国的女人几乎全是经过精选的漂亮姑娘,五大三粗、面目丑陋的母夜叉,在天堂是见不到的。

郭璞有他的《游仙诗》,陶渊明有他的《桃花源记》,李白有他的《西上莲花山》,李贺有他的《梦天》。意大利文艺复兴时的思想家康帕内拉有他的《太阳城》。英国思想家莫尔有他的《乌托邦》——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它谴责圈地运动是羊吃人,提出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的论点。主张公有制,按



需分配,消灭商品,消除贫富差距,大家禁欲,人人平均分配。

不论是宗教的天堂,还是思想家文学家的仙境理想国,在人世间是从来没有实现的“现实”。《红楼梦》里的太虚幻境,名曰空玄无碍之域,实则灵与肉和谐统一之地,不过是曹雪芹构筑的爱情理想国而已。

我们从历史记载中见到的有秦始皇的离宫,汉武帝的天宫,武则天的天堂。幸存的慈禧的万寿山,占地 290 公顷,辛亥革命之后才对老百姓开放,这使我们得以亲眼看看统治者的人间天堂是个啥模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柏拉图,他认为,人的身体是物质的,可以分解消散的;而人的灵魂不再受身体的窒息羁绊,它会来到一个奇特的地方——天堂与地狱的分界处。当结伴而行的鬼魂来到了这里,发现有两个洞口。在天地之间,坐着一些法官。他们每判决一个人,正义的便吩咐从右边升天,胸前贴着判决证书;不正义的便命令他从左边下地,背上带着表明其生前所作所为的标志。判决通过后,鬼魂纷纷离开,有的走上天的洞口,有的走下地的洞口。同时也有鬼魂从另一地洞口上来,风尘仆仆,形容污秽;也有鬼魂从另一天洞口下来,干净纯洁。他们熟人相逢,互致问候。来自地下的询问对方在天上的情况,来自天上的询问对方在地下的情况。他们相互叙说自己的经历。地下来的人追述着自己在地下行程中(一趟就是 1000 年)遭遇的痛苦和看到的事情,他们一面说一面悲叹痛哭。天上来的人则叙述他们看到天上的不寻常的美景和幸福快乐。一个人生前对别人做过的坏事,死后每一件都要受十倍报应。也就是说每百年受罚一次,人以一百年算作一世,因此受到的惩罚就十倍于罪恶。这些恶人差不多大部分是暴君,他们被捆住手脚头颈,丢在地上,剥他们的皮,在路边上拖,用荆条抽打。(《理想国》第 418 页——419 页)

柏拉图是坚决反对个人独裁主张宪政的。他认为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是抓教育。国家领导层的成员,必须懂哲学,并且要彻底学会运用辩证法(在哲学史上,第一个运用辩证法一词

的是柏拉图),最高领导者,必须是“哲学王”。在相当于我国东周威烈王(公元前 400 多年)时期,西欧就产生了柏拉图这样伟大的哲学家,难怪西方文明奉柏拉图为先进思想的鼻祖。

在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之前,欧洲于 16 世纪和 17 世纪直到 19 世纪,几位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论到实践,曾经进行过探索和试验,他们确实想在人间消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莫尔和康帕内拉就是探讨这种理想国模式的先行者。到了 18 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巴贝夫提出通过暴力革命消灭私有制,其天堂蓝图具有斯巴达克式特色:绝对平均,苦修苦练,禁欲主义,这种理想国方案实际上是农村公社制和手工业工场原型的翻版而已。到了 19 世纪,法国出现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英国出现了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恶果进行了系统的理性的批判。傅立叶在法国和美国搞过协作移民区试验(均失败);欧文在美国印第安纳州买下了 1200 多公顷土地,建立“新和谐”公社移民区;失败以后,又同他的学生在英国汉普郡组织“协和大厦”进行共产主义试验,又宣告失败。尽管如此,三位空想社会主义先行者在理论上的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催生所进行的试验精神,功劳是不可磨灭的。特别是欧文,他提出的没有失业(即令到 21 世纪仍是许多国家的一个难治之症),教育与劳动相结合,消除工农、城乡、脑体三大差别的理论,把空想社会主义思潮推到了顶峰。

在中国近代也有过农民式的天堂试验,那就是几乎与欧文试验同时的太平天国。它是历史上农民起义运动规模影响最大的。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在 1853 年 3 月攻克南京之后颁布的。它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但一年之后,天京就闹饥荒,全城人除特权者外,都喝开了稀粥,于是赶紧颁布,“照旧交粮纳税”。他们收取的土地税比清政府加重三倍。工商业是被取缔的。平分

土地压根就没有实行。至于一切财产公有制的《圣库制度》，肇始于起义之初。拜上帝会信徒多携老扶幼，举家参加。他们变卖了田产，各将所有财物奉献于公库，所有人的衣食，都由公库开支。以后，全军实行这种制度。作战中缴获的金银、绸帛、珍宝等，必须上交公库，个人不得私藏，违者处以重罚，直至斩首。将领士兵的生活需要，由公库供给。但各类供给定额并非固定，依物资来源多少而有不同。缺粮时，就减少食米供给定量。这种绝对平均主义，初期起了积极作用。它保障了将士及其家属的生活，也吸引了许多贫困的人民参加。但事实上，圣库制度并没有严格实行。随着军事上节节胜利，占据城市乡镇日多，财货来源丰富，将士们各自拥有私财。于是人无私财的原则已不能坚持，所以又规定私藏不得超过五两银。高级将领生活日奢，任意取用于公库，供给配额渐失去实际意义。各王、各将领更是广蓄私财，并不依赖于这点儿份额。《圣库制度》蜕变为后勤供给制的一种形式，早已名存实亡矣。

恩格斯认为，一种生产关系尚未成为生产力的桎梏时，尽管它在分配上不公平不完满，但人民还是不会起来推倒它。他说，“大工业兴起时期的英国工人就是如此。不仅如此，当这种生产方式对于社会还是正常的时候，满足于这种分配的情绪，总的来说，也会占支配的地位；那时即使发出了抗议，也只是从统治阶级自身中发出来（恩格斯列举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在被剥削的群众中恰恰得不到任何响应。……道义上的愤怒，无论多么人情入理，经济科学总不能把它看做证据”（《马克思恩选集》第3卷第188页—189页）。这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试验最终归于失败的原因。孙中山对太平天国的失败，说得言简意赅，说他们只知有民族，不知有民权；只知有君主，不知有民主。洪秀全的君权神授，政教合一，家族统治，特权阶级独裁的种种行为，与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

实际上太平天国是除了姓洪的，谁都不信任的家天下，最初册封为王的仅90多人，到后

期，凡本家亲戚以及提供赞助者全都予以册封，竟达2700多个王。这比秦始皇的封建专制家天下，不是还落后两千多年吗？

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是一群没多少文化，没有理论思维，提不出任何先进口号，不懂建设的农民，掌权之后蜕化而成的特权阶级，他们能给人民带来的除了惊惶恐惧之外，仅仅是一幅虚幻美妙而实际上无法兑现的天堂蓝图，这个特权阶级嘴巴上说得天花乱坠，行动上干的则腐败透顶。这样一个言行不一，言行相悖的政权，注定是短命的！太平天国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它的前途当然只能是遭到人民的唾弃。

人类追求平等、自由、民主、富裕、健康和拥有更多的闲暇时间……这些理想，并非虚幻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在有些地方，也正在变成现实。没有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就不可能有马恩的科学社会主义。实践是最不客气的老师，我们经历过1958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乌托邦”狂热，经历了30年痛苦的摸索和折腾，深感偌大的中国社会，依靠人治的不灵，深感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终于承认了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才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依法治国、以德治国这条康庄大道。

怎样才能有效地保证社会主义的理想在中国实现、避免大跃进的“乌托邦”的天堂狂热和无法无天的“文革”在中国重演呢？邓小平在答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时说：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过去的一些制度，实际上受了封建主义的影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避免重复这种现象，准备从改革制度着手。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邓选第307页）这些针对性极强的大实话——它本身就是理论，今天读来，具有何等鲜活的生命力啊！

（责任编辑 元 璋）

# 左联作家蒋光慈

## 被开除党籍始末

● 刘小清

1931年9月,上海《文艺新闻》刊登了左联发起人之一的钱杏邨谈蒋光慈的一段文字:

“他虽然开拓了中国文艺运动,而又努力地使这一运动不断地展开;可是,他也就死在这发展的浪潮之中,因为自1928年以后,他自己却是逐渐地停滞了。他的顽固的个性,使他不能更深入地理解一切。因此,他对于文艺运动的认识,与其他的文艺运动者,在自我批评的斗争中,不断的冲突、对立起来。到最后,1930年秋,因为过不惯纪律的生活,他甚至于切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他觉得自己以全生命献给革命,自己的创作几全遭查禁,而同志还是如此的不理解。他感到了深刻的悲哀。他的生活状态完全地陷于孤独的境地,形成他的内心的无限的苦闷。他几次地攒下笔来,想不再从事创作……”

在这篇以“在发展的浪潮中生长,在发展的浪潮中死亡”为题目的文章中,钱杏邨所说的他,即早年太阳社发起人之一,后成为左联候补常委的蒋光慈。

蒋光慈原名蒋光赤,在国民党统治年代,用光赤名字发表文章显然有赤色宣传之嫌,会遭致麻烦。于是他改名光慈。蒋光慈20世纪20年代初留学于著名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同学中有罗亦农、赵世炎、王若飞、彭述之、郑超麟、曹靖华、韦素园等。1922年,蒋光慈在苏联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蒋光慈那时已写有许多新诗,亦有很高的知名度,因此在东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处于特殊的地位。1924年蒋光慈回国,在上海大学教书。郑超麟说:“在这个时候,遵守纪律,服从命令,进行党所分配的工作,并不妨害他的文学活动。他在上海大学教文学,组织学生成立文学团体,编辑文学刊物,出版自己的文学著作,并不妨害他作为党员应尽的义务。”当时蒋光慈非常醉心于他的文学

活动,但这种兴趣很快便与党分配的工作发生了冲撞。

那是在孙中山北上病逝后,冯玉祥与苏联发生了联系,并接受苏联援助。不久,苏联派出顾问到张家口,需要翻译人员。于是中央从上海大学调蒋光慈去张家口作苏联顾问的翻译工作。在张家口工作时间不久,蒋光慈就感觉到很不适应,因为他无法从事自己的文学创作。于是,他向组织要求调回上海。在组织不批准的情况下,他竟自己离职回到上海。以后党组织没有分配工作给他,他靠自己的稿费生活。当时他的《少年漂泊者》、《短裤党》等作品在文坛很有影响,当然也有不少争议。其间蒋光慈曾到武汉生活了一段时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返回上海,之后与钱杏邨等发起成立太阳社,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文学。

1929年10月的一天,蒋光慈参加了在上海北四川路“公啡”咖啡店内召开的一个非同寻常的会议,参加者还有潘汉年、夏衍、阳翰笙、钱杏邨、冯乃超等11人。这次会议即左联筹备会,蒋光慈也因此成为左联发起人之一。1930年3月2日,左联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召开成立大会,蒋光慈虽然因病未能到会,但仍被选为常委,并负责编辑左联刊物《拓荒者》。

### 不愿与“左倾”路线合流

左联成立之时,正值中共党内“左”倾思想占统治地位,这种“左”的倾向必然对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当时左联经常要求它的盟员参加示威游行、飞行集会、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以及到工厂、学校中去鼓动工作,而疏忽甚至弱化文学创作。即使在创作方面,也是要求以无产阶级的立场去写无产阶级的生活,否则

将受到严厉的批评。

在左联成立后的第一个“五一”节到来之际,左联在福州路的一幢大厦里召开了第一次全体盟员大会,布置迎接“红五月”的各种示威活动,要求所有的盟员都必须上街游行。在通过的“五一”宣言中,还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冠以一个刺激的名称,叫“血光的五一”。此后游行示威等活动则成了左联的主要工作,即使这种活动暴露了力量,造成了很大损失也还是乐此不疲。针对早期左联的这种现象,有盟员认为“说它是文学团体,不如说更像个政党”。鲁迅当时也对此表现出不满,他说:“现在的左翼文艺,只靠发宣言是压不倒敌人的,要靠我们的作家写出点实实在在的东西来,”并且声明:“我是不会做他们这种工作的,我还是写我的文章。”然而,在当时特殊的背景下,“左”的势头并未得到遏制,相反,还有蔓延趋势。

蒋光慈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诗人,他将创作视为生命的全部,这就同当时左联的指导思想相悖。左联是革命文学家的组织,毫无疑问,它应当关心政治,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政治斗争。但它又忽视了作家本身的创作职责,把参加政治活动放在首位,而机械地规定每有节日,必上街游行示威,写标语,散传单,并以此衡量左联成员的革命性。对这种“左”的做法,蒋光慈一直持不同意见,加之身体有病,因而他常常不积极或不参加。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主要是从事革命文学创作,而参加飞行集会一类活动,是一种盲动蛮干。

有一次,左联要开会,但一时又找不到会场,不知谁出了个主意到蒋光慈家去开会。因为蒋光慈房子面积较大,而且白天只有他一人在家。不料当钱杏邨找蒋光慈商量时,被一口拒绝。蒋光慈说:“一个房子,本来是可以写作的,往往因为开会,一开就开倒了。”当时上海地下党组织遭破坏的事常有发生,蒋光慈的这种顾虑也是可以理解的。他所谓“开倒了”,即是指这种情况的发生。蒋光慈的性格十分鲜明,毫不隐讳,心里如何想就如何说。他的拒绝,搞得钱杏邨非常尴尬,也为一些同志所不满。

蒋光慈的夫人吴似鸿曾回忆过蒋光慈的一段有关情况:

“夏季的一天,我正在睡午觉,光慈坐在我的旁边看报,杏邨走上楼来通知光慈说‘明天上午八时到南京路上集会,你到时去!’

但光慈回答说:‘我不去,不过是暴露了自己,没意思。’

那个时候,谁要是不去参加飞行集会,就被指责为不革命。当时我也这样认为。所以对光慈说:‘你不革命啦?’但光慈有他的主见,也自有他的道理在。他向我解释:‘现在群众还没有组织起来,武器也没有,条件尚不成熟,而且每一次集会暴动损失很大。’”

吴似鸿认为蒋光慈的这番话是正确的,但在当时“左”倾路线的特定背景下,他的这种意见毫无疑问被认为是极端错误的。

蒋光慈依然我行我素,只管自己写作。但有一天,他终于得到通知,要他停止写作,而调做群众工作。当时左联组织认为“蒋光慈过着小资产阶级的舒适生活,必须到无产阶级大众中去锻炼。”蒋光慈为此很激动地对吴似鸿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

这段时期,蒋光慈经常与左联党团组织成员发生激烈争论。但他面对的是一个组织,党组织要求他抛弃自己的见解,无条件服从组织决议。蒋光慈为此感到很痛苦,他不愿意服从他认为是错误的东西,这是他倔犟的个性决定的,但他知道作为党员又必须服从。在经过痛苦的抉择后,他最终选择了退党。他以为



蒋光慈

这是解决问题的唯一办法。他对吴似鸿说：“既然说我写作不算革命工作，我退党。”

蒋光慈很快便将其退党报告交给钱杏邨转党组织。但钱杏邨认为他太冲动，遂婉言相劝，并将他的退党报告压在身边。但蒋光慈去意坚决，他认为“一天不退党，就觉得跟着错误路线多一天，不如早日退党，像鲁迅那样，做个党外布尔什维克。”于是，他再三催促钱杏邨把退党报告交上去。钱杏邨无奈，只好按照他的意愿将他的退党报告交给了党组织。

本来根据党章规定，是允许党员退党的。但在当时的特殊背景下，左联对蒋光慈的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根据思维惯性，蒋光慈此举无疑是对党组织提出挑战，于是只有一种选择，即将其开除出党。

这无疑是蒋光慈的悲剧，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剧。

## 为“浪漫”付出代价

郭沫若对蒋光慈曾经有过这样的评述：

“古人爱说‘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为人与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经验上，都是很少见的。凡是没有见过光慈的人，只要读过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从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来作为他的人格的形象。他为人直率、平坦、不做虚饰，有北方式的体魄与南方式的神经。这种人，我觉得是很可亲爱的……但我却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围骂（并不想夸张地用‘围剿’那种字面）的时候，却敢于对我们说：‘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谁来革命呢。’他这所说的‘浪漫’大约也就并不是所谓‘吊尔郎当’。但他很恳切，他怕我们还不能理解，又曾这样为我们解释过几句：‘有理想，有热情，不满足现状而企图创造出些更好的什么的，这种精神便是浪漫主义。具有这种精神的便是浪漫派。’”

然而，蒋光慈终于为他的“浪漫”付出了代价。

1930年10月20日，在上海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第3版正式公布了蒋光慈被开除出党的消息，其标题为《没落的小资产阶级蒋光慈被共产党开除党籍》。整个报道措辞严厉，特别在正文前强调了下面这段文字：

“因革命斗争尖锐化，动摇退缩，只求个人享乐，故避免艰苦斗争。布尔什维克的党要坚决肃清这些投机取巧，畏缩动摇的分子，号召每一同志为革命而忠

实工作，为革命而牺牲一切，健全党的领导作用。”

在作出开除蒋光慈党籍决定的前不久，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刚刚闭幕，会上虽然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但因其影响很深，此后“左”的思想不仅未能肃清，反而愈加滋长。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除蒋光慈党籍的报道，通篇体现出深刻的“左”的烙印。如对于形势的分析，认为“目前中国反动统治急剧走向崩溃，革命斗争日益高涨，革命战争开始，工农劳苦群众与帝国主义豪绅资产阶级作最后决战的时候”，这与李立三提出的“会师武汉，饮马长江”如出一辙。继之，在对蒋光慈的定性上更是言词偏激，称蒋“加入中国共产党虽已几年，但从未做过艰苦的工作，更没有与群众接近，素来就是过他所谓文学家的优裕生活。近来看见革命斗争高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随之加甚，蒋光赤随之动摇”，“今蒋光慈之所为，完全是看见阶级斗争尖锐，惧怕牺牲，躲避艰苦工作，完全是一种最后的小资产阶级最可耻的行为”，“他已经成了一个没落的小资产阶级，显然已流入反革命的道路”。蒋光慈就这样被彻底地推向了革命的反面。

当时开除蒋光慈有两条振振有词的理由，其一是自由主义以及不愿参加组织活动。报道列举了“去年全国斗争发展，白色恐怖加紧的时候，他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其实当年蒋光慈赴日本是由于身体状况的恶化而赴日本治病，并非“惧怕牺牲”、“投机取巧”、“动摇怯懦”。当时也是左联盟员的马宁即对此忿忿不平，他说：

“1929年正是白色恐怖最尖锐的一年。表现革命的作品发表困难，作家的生活没有保障。光慈有严重的胃病，暂时想到日本去求良医的想法，也是有的。而他到了日本，却是去与日本当时最进步的作家藏原惟等人交往，同时奋力写作……他以有病之身，短短三个月之内，写出《冲出云围的月亮》、《故乡与异国》以及译出了《一周间》。这是何等的革命干劲啊！即使身体是这样的不好，可是怎么也不能逃避祖国的现实，急急于要回祖国去为祖国服务，这不是一个真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的最高贵品格吗？光慈同志怎能预料到，他投进祖国的怀抱的时候，竟没有人去调查了解他到东京去到底为祖国的革命文艺事业干了什么？反而把他去东京这件事作为开除他出党的理由之一，这怎么能令同时代人感到满意呢？”

马宁为蒋光慈的这段辩白，对了解蒋光慈当年



“私自脱离组织,逃到日本”的真相是不无裨益的。

当然,当时蒋光慈目无组织纪律和厌倦党的组织生活(主要体现在递交退党报告)的做法,肯定是错误的。但考其原因,除了有自由主义的小资产阶级散漫习气以及身体不好的因素外,最主要的乃在于“那时的组织活动,主要的也就是搞飞行集会、游行示威那一套”。因此,蒋光慈不愿意参加这样的组织活动,其实质是对“左”倾冒险主义做法的不满和抵制。今天看来,实属难能可贵。

开除蒋光慈党籍的理由之二,是他写的中篇小说《丽莎的哀怨》产生了不良影响。《红旗日报》的报道关于这一点如是说:

“又,他曾写过一本小说《丽莎的哀怨》,完全从小资产阶级的意识出发,来分析白俄,充分反映了白俄没落的悲哀,贪图几个版税,依然让书店继续出版,给读者的印象是同情白俄反革命后代的哀怨,代白俄诉苦,诬蔑苏联无产阶级的统治。”

不可否认,《丽莎的哀怨》曾受到进步文艺界的批评,这也完全是正常的。马宁说:“蒋光慈同志眼见那些白俄后裔的悲惨生活,用同情她们的笔调来客观地描绘她们沦为妓女的生活,只能认为作家的世界观还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他只是在前进的道路上跌了一跤罢了。”

但报道的言辞显然已经超越了正常的文学批评范畴,而且是粗暴的。当年俄国十月革命时,高尔基曾对列宁说,我们对阶级敌人太“残酷”了。但列宁没有立即给高尔基以难堪的抨击,而让他在以后的实际斗争中受到教育,认识了自己的错误。如果以这种方式来处理蒋光慈《丽莎的哀怨》一书错误,其实际效果将会大不一样。

更令蒋光慈不能接受的是,当时对其采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的做法,在否定《丽莎的哀怨》时,对蒋光慈的许多具有进步内容,在读者中产生过积极影响的作品及其在文学上的成就一概抹煞,称其“并没有文学天才,手法实很拙劣。政治观念更有不正确,靠了懂几句俄文,便东抄西袭,装出一个饱学的样子。而实际他所写的小说,非常浮泛空洞,无实际意义。”

蒋光慈致力于革命文学活动的历史就这样被一笔勾销,这实在不能令人信服。当然,极“左”路线的实质亦于此暴露无遗。特别是蒋光慈作为一名左联的普通党员被开除出党,竟然招致中共中央机关报以大



蒋光慈负责编辑的左联刊物

篇幅刊登报道,这是极不正常的。实际上,蒋光慈是被作为一种倾向的代表而被“惩戒”的,这种倾向就是对当时盛行的“左”倾路线的觉悟和抵制。

据说蒋光慈读到《红旗日报》这篇报道后,除了遗憾外,仍表现得非常冷静,他对相伴在身边的吴似鸿说:“我没有什么,我做学者好了,我对党是一向忠诚的。”蒋光慈背负着沉重的政治“十字架”,忍受着不公和打击,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他的长篇进步小说《咆哮了的土地》。这部左翼文学中最早反映湖南农民运动和井冈山斗争的作品一出版即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影响。以后该作品被冠以“普罗文艺”的罪名而遭国民党当局查禁。令人扼腕的是,蒋光慈在被开除党籍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即病逝于上海。郁达夫在《光慈的晚年》一文中说:“光慈之死,所受的精神上的打击,要比身体上的打击更足以致他的命。”郑超麟说:“蒋光慈是个悲剧,他临死之前不久还被开除出党,据说并非为了路线斗争,而是为了文学活动不能与党员的义务相容。我们那时都是把党的工作看作高于文学活动,像蒋光慈那样把文学活动和党的工作相提并论,这在当时是行不通的。”

蒋光慈实在是对文学太痴迷、太执著,但是作为最早倡导革命文学的先驱者,他在“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的年代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责任编辑 吴思)



# 中国昆曲被列为“人类 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榜首

● 王 恂

比从莫斯科传来北京申奥成功的特大喜讯还早56天,即2001年5月18日,从巴黎传来中国古老的昆曲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为“人类口述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喜讯。名列这一领域19项世界文化遗产的榜首,得到18名评委的一致赞同。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办此项活动尚属首届,计划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旨在从世界各国“具有文化价值而面临灭绝或消失”的口头文化表现形式和有形艺术中,挑选出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部分,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命名,呼吁保护,以促进全人类加深对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视,并采取措施振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中国昆曲的评述中说:“昆剧是中国最古老和最有影响力的戏曲剧种之一。它流传于全国很多地区。”

昆曲源远流长,它汇集了南戏和元曲两条源流,至今约有600余年的历史。由于昆曲起源于元末昆山一带流行的地方戏曲,故谓昆山腔。先后经顾坚、魏良辅等戏曲大师的精心加工,又融入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等民间曲调,逐渐形成了曲律婉转优美、表演载歌载舞的昆曲。由此可见,昆曲并非出自象牙之塔,而是源于民间,流传民间,深深扎根于民间的广原沃土。

以昆曲为主的明、清两代传奇作品有1800多种,有剧本流传的600余种,仅《缀白裘》即收入昆曲剧目430出。真是洋洋大观,琳琅满目。它是炎黄文化的珍贵遗产。

昆曲源流之一的古老(南宋)南戏距今已有800年。主要剧目有:《张协状元》、《洗马桥》、《杀狗记》、《拜月记》、《香囊记》等。

昆曲的另一大源流元曲,主要剧目有:关汉卿的《窦娥冤》、《救风尘》、《望江亭》、《单刀会》、《蝴蝶

梦》,王实甫的《西厢记》、《丽春堂》,白朴的《墙头马上》、《梧桐雨》,马致远的《汉宫秋》,郑廷玉的《看钱奴》,郑光祖的《倩女离魂》,高则诚的《琵琶记》,等等。

明代梁辰鱼始创用昆腔演唱的传奇《浣纱记》及《红线女》,汪道昆的杂剧《高唐梦》、《五湖游》、《远山戏》、《洛水悲》(即《洛神》),汤显祖的《临川四梦》,即《紫钗记》、《还魂记》(即《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徐复祚的《霄光剑》、《红梨记》,沈璟的《义侠记》、《红蕖记》,高濂的《玉簪记》、《陈情记》,郑之珍的《劝善记》,周朝俊的《红梅记》,吴炳的《疗妒羹》、《绿牡丹》、《画中人》、《西园记》等。明末清初,有阮大铖的《燕子笺》、《春灯谜》,李玉的《一捧雪》、《人兽关》、《永团圆》、《占花魁》、《清忠谱》、《麒麟阁》等。清代,有李渔的《风筝误》、《玉搔头》、《比目鱼》、《怜香伴》,洪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等等。

昆曲又是“百戏之祖”,“百戏之师”。它融歌、舞、剧、技于一体,集传统艺术之大成,标志着戏曲艺术发展的高峰,堪称国之瑰宝。昆曲有着深厚的文学、美学底蕴,每一剧目都充满诗情画意和轻歌曼舞。昆曲的戏词犹如古典诗词,文词典雅,语言优美,一般由七字、五字、四字、三字或叠字组成长短句,讲究四声十三辙,念白有韵白与苏白之分。昆曲的表演动作,更精于虚拟化、程式化,但唱做并重、载歌载舞是其显著特点。正由于曲、词、舞三者完美结合,因而在塑造人物和演绎故事上,昆曲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令国内外观众为之痴迷、为之陶醉。

在历史的长河中,昆曲几经兴衰。自元末至明代中叶,昆曲流传南北,走向繁荣。至清代康熙、乾隆两朝,

昆曲处于鼎盛时期。但渐由民间转入宫廷，蜕变为御用文人的笔墨，趋于僵化。时至清末，当京剧兴起、昆曲衰落之时，一些昆曲艺人由京城转入农村，在冀中、冀东一带的民间沃土上大展身手，深受广大农民所喜闻乐唱。由此可见，昆曲不仅仅是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当它来自民间又回归民间时，又是脍炙人口的“下里巴人”，取得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随着国运衰危，内战频仍，外敌入侵，昆曲也凋零破败，几近灭绝。昆曲艺人流离失散，穷困潦倒，生死难料。

新中国成立后，昆曲和整个戏曲事业得以复苏。党和政府把流散各地的昆曲艺人召唤回来，重奏管弦，再登舞台，恢复了昆曲艺术的生气。1955年，朱素臣（明末清初）原作《十五贯》，经整理改编，由昆曲名家、著名“传”字辈演员周传瑛、王传淞等上演，在北京连演46场，观众达7万多人次，轰动京城和大江南北。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观看演出后，给予高度评价。周总理说：“《十五贯》有着丰富的人民性、相当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它不仅使古典的昆曲艺术放出新的光彩，而且说明了历史剧同样可以很好地起现实的教育作用，使人们更加重视民族艺术的优良传统，为进一步贯彻执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一出戏救活昆曲剧种。趁此东风，1956年在上海举办了“南北昆会演”，交流演出代表性剧目90多出。参加演出的有北昆名家韩世昌、白云生、侯永奎、马祥麟、侯玉山、傅雪漪等，南昆名家俞振飞、徐凌云、周传瑛、王传淞、朱传茗、沈传芷等28人，以及众多青年演员。这是建国以后第一次昆曲盛会。

趁此东风，各地昆曲院团纷纷恢复和成立；业余的群众性的昆曲研习社（如北京、上海、苏州、扬州等地）也建立起来或恢复活动；在有些大学中文系还开设了昆曲课。1957年，北方昆曲剧院成立时，周总理亲自观看了祝贺演出：梅兰芳、

韩世昌、白云生联袂上演《游园惊梦》。演出后，周总理登台鼓励，并与演员留下珍贵的合影。

此后，随着“政治运动”的不断开展，昆曲遭到严重的扭曲和摧残。“文革”伊始，江青就把解放后17年说成是“文艺黑线专政”，一笔抹杀戏曲改革的政绩，各地昆曲院团都被撤销，昆曲工作者再次遭到厄运。

粉碎“四人帮”以后，昆曲终于重获新生。1986年，文化部成立了“振兴昆剧指导委员会”和“中国昆剧研究会”，并提出“抢救、继承、改革、发展”（不久前，改为“保护、继承、创新、发展”）的八字方针。在这种形势激励下，各地昆曲院团和业余曲社，还有“日本昆剧之友社”等外国昆曲迷，演出了大批传统剧目和新编剧目。2000年春，在昆曲的故乡——苏州、昆山，举行了首届中国昆剧艺术节暨昆剧优秀古典剧目展演，历时7天，演出28场次，观众达4万余人次。

近十几年来，南北昆曲院团展翅高飞，纷赴欧、美、日本等国，以及港、澳、台等地，应邀访问演出，进行文化交流。“阳春白雪”已经飞越重洋，在五洲四海放射着奇光异彩。

当联合国把中国昆曲列为全人类文化遗产的今天，昆曲艺术必将焕发其绚丽的青春，显示其旺盛的生命力。

（责任编辑 洛松）



1957年7月，周恩来总理观看北方昆曲剧院和梅兰芳的演出后，和艺术家们在一起

# 在麋鹿苑看“东方护生诗画”

● 郭 耕

北京南海子的麋鹿苑是著名的动物保护小区和全国科普基地,这里不仅有鹿鸣呦呦、蝉噪阵阵的湿地风光,更有许多从文化层面、道德高度阐述动物保护观点的文艺性和思想性作品,其中一套主要选自丰子恺《护生画集》的题为“护生即护心”的东方护生诗画,虽形式简朴,但内涵深刻,读来发人深省。这恐怕在全国、全世界的保护区、动物园及教育中心都是独树一帜的。

众所周知,环保运动源于西方,但许多自然哲学、护生思想却产生在东方,特别是中国。从道家的“天人合一”、儒家的“好生之德”,到佛教的“普度众生”,无不充满劝人向善、从善护生、敬天惜物的思想。

首幅护生壁画名为《天地好生》,取自宋代大儒朱熹的名言:“……人若爱惜物命,也是替天行道的善事”。画面是一棵生机勃勃的大树,在风雨中飘摇、在天地间伫立。

古人认为,动物都是血肉有情之物,人类有夫妻情、母子情、动物亦然。人有夫妇,鸟也有吗?当然!第二幅画上,展现的是一只鸟被人捕捉,另一只即它的配偶竟坠地而亡的凄惨情景。

在自然界中,有一个动物类群,名曰哺乳类,画上,正在哺乳的,一边是狗的母子,一边是人的母子。可能你会对人狗一图产生反感,但是,你能否认人类的哺乳动物属性吗?无可否认!因此,本画右侧有白居易的一首诗“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劝君莫打枝

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后面,还可以见到几幅反映动物母子情深及对杀生之人有教化作用的壁画。

一则名为《母鹿随啼》,说古时候有个名为秦西巴的大将,用车运载一幼鹿出山,回头发现总有一母鹿随后哀啼,秦知其为母子,不忍伤害骨肉之情,就把小鹿放掉了。

二则叫《烹鱖》,一名叫周豫的学士在烹调鱖鱼时,见一母鱖总向上弯曲身体,觉得蹊跷,剖之,发现腹中有子,才知,这条鱖鱼曲身避汤的原因是为护子,被此情此景感动的他从此再不吃鱖鱼了。

第三则为三国中的故事,蜀国大将邓芝远征涪陵,见猿猴抱子于树,引弩射之。中猿母,子为母拔箭,以树叶堵塞创伤。邓芝自叹不如,投弩水中。

在这二十余幅护生壁画中,很多配诗是出于诗词名家之手,有杜甫的“干戈兵革斗未止,凤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为纵此乐,暴殄天物圣所哀”。有曹植的“罗家得雀喜,少年得雀悲。拔剑削罗网,黄雀得飞飞”。鸿雁传书,多少有些浪漫主义色彩,唐代大诗人杜牧却将其赋予了深刻的自然保护意义,“何事春郊杀气腾,疏狂游子猎飞禽。劝君莫射南来雁,恐有家书寄远人”。

大家可以发现,被选用最多的是白居易的诗,他的“谁道群生性命微,一般骨肉一般皮”,他的“一种爱鱼心各异,我来施食尔垂钩”,他的“好生之德本乎天,物物贪生乐自

全”，简直字字珠玑。

古人的一些生态道德，远远高于今人，像大家习以为常的垂钓、狩猎、吃野味、笼养野鸟等陋习，早已受到古代先贤的抨击。一幅名为《残酷风雅》的壁画，在垂钓之人身旁，有一首尖锐的批评钓鱼的诗：“垂纶称风雅，鱼向雅人哭。甘饵藏利钩，用心何恶毒？风雅若如此，我愿为庸俗。”一些热衷钓鱼的人当为之汗颜。壁画《长歌当哭》，则是替笼中之鸟鸣不平：“身在樊笼，心在林谷。望断家山，长歌当哭！”陆龟蒙的《远征》则是在控诉那些射杀飞禽的行径，“南北路何长，中间万弋张，不知烟雾里，几只到衡阳”。

有时，我们说，在师法自然、敬天惜物的道德意识、天然情感方面，古人优于今人、儿童不逊成人、古代东方胜于现代西方。中国不仅有庄周化蝶之美梦，还有为蝶造墓之童心，一幅《蝶之墓》壁画，与不远处的“世界灭绝动物公墓”遥相呼应，可能会对这里为什么给灭绝动物建造一座具象征意义的墓地做些注

解：“小小蝴蝶墓，左右种冬青。莫做儿戏想，犹存爱物情”。

作为地球芸芸众生之一的人类，本应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与万物谐同进化，正如中国古代思想家所教诲的：所谓“四海承风，畅于异类，凤翔麟至，鸟兽驯德，无他也，好生之故也”；（孔子）所谓“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庄子）所谓“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孟子）……古代先哲的理想是期望大千世界成为“谦谦君子以厚德载物”、“积德行仁，鸥鸟可招”的朗朗乾坤。

中国古代护生惜物的思想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实在是一言难尽，且将一幅名为《北窗风》（宋代陆游）的壁画，作为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一种理想境界介绍给大家，并作为本篇文章的结语吧：“飞来山鸟语惺忪，却是幽人未睡中，野竹成阴无弹射，不妨同享北窗风”。

（责任编辑 吴思）

科技汇合 情理交融 图文并茂 雅俗共赏

## 《科技文萃》月刊

这是一本大型文摘类科普月刊，是从众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报刊书摘中，从科学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资料性的角度，选精拔萃编辑而成。每期30余个

栏目，人称“小百科”，可读性强，信息量大，在知识经济、信息时代的今天，拥有《科技文萃》，全局在胸，省时省钱，便于收藏。拥有《科技文萃》，您将拥有新的生活。

### 订 阅 办 法

每期定价10元，全年120元，国内邮费在内。

邮发代号：82-933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也可直接向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订阅，随时收订。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七棵樹北京纺织仓库内

邮 编：100016

电 话：(010)84313380

联 系 人：陈秀文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朝阳八里庄分理处（20114-04）

银行帐号：02000038090661059-72



订阅《文史春秋》月刊

奖您越南风情游

《文史春秋》杂志是纪实性文史综合刊物，重点选编中国和广西近现代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活动鲜为人知的史实和社会百态文章。内容丰富，特色突出，权威可靠，具体生动，图文并茂。

定价：4元，全年价：48元。

邮发代号：48-93

地址：南宁市桃源路3号，邮编：530021

电话：0771-2836920

2002年举办有奖订阅活动，读者将2002年1-8期期花寄回杂志社即可抽奖到越南的联合国自然文化遗产景点和首都河内等地越南风情游（名额10名）欢迎订阅

# 荆轲壮别何处

● 曲英杰

公元前 228 年。古易水上。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饯行。壮别之际，荆轲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于是世上有此一首《易水歌》流传，荆轲刺秦王的故事也被世代传颂，而如易水长流。

## 易水长流

这是史书上沉重的一页。时秦已灭赵，威逼燕国。荆轲此举，实关系到燕之存亡。为谋划此事，太子丹费尽了心力。此前，有处士田光自刎于友人荆轲面前，以激志明心；秦之逃将樊於期也自愿献出了秦王悬赏“金千斤、邑万家”的头颅。对于易水之别，《战国策·燕策三》有如此经典性的记述：“（荆轲）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慷慨羽声，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于是荆轲遂就车而去，终已不顾。”

荆轲去了，没有复还。

为追寻荆轲旧迹，在世纪之初我来到河北易县。城东南不远即著名的燕下都遗址。放眼望去，仍见大段大段的城墙残存，在城角村南的一段城墙残高近 7 米，可使人多少领略一点昔日的雄姿。城东北部所残存的十余座土台排列有序，位于中心的武阳台高出地面约 11 米，东西长 140 米，南北长 110 米，应该就是典籍中所称的“金台”了，其北原有“金台陂”，今已干涸。其城墙与台基皆用黄土夯筑而成，是

黄土文明的结晶，体现了一种凝聚力，也显示了古老和永恒。战国之世，燕都蓟城（今北京），而另建此城为下都。其北临北易水，又称濡水；南临中易水，兼称武水，古以水北为阳，故称武阳城。19 世纪末，这里有“齐侯四器”出土。20 世纪初，又发现“铜龙”，遂引起人们的注意。

70 余年来，经几代考古工作者的努力，已使燕下都武阳城的轮廓得以完整地揭示出来。其东城营建在前，西城扩筑在后，整座城东西长约 8000 米、南北宽约 4000—6000 米，为迄今所发现的战国第一大城。与沉埋于丝绸古道上的楼兰、尼雅等城址相比，无论是就建筑规模而言，还是就历时久远而言，燕下都都远超前于前者。它虽已沦落为墟，但并未远离尘世，依旧与后继者“长相随”，阅历史人事的成败，向世人昭示传统之力。古有“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朝”之说，燕下都堪称“大隐”。

燕下都遗址有许多兵器出土，已发掘的大、小墓葬中也多见有兵器为随葬品。城址南部解村附近有为世所瞩目的 14 座人头骨丛葬坑，据发掘者测算其所掩埋的人头骨在 3 万颗以上。葬坑内的头骨有的带有三棱式铁铤铜镞，有的被砍去下颌骨，有的被砍去枕骨。这一切都显示了其所处时代战事频繁和战争的残酷性，或有助于理解太子丹及荆轲等所作所为。当年，太子丹即以此为据点进行谋刺秦王的活动。在武阳城西，古有荆轲馆，为荆轲所居之“上舍”。今易县西荆轲山上立有“古义士荆轲里”石碑；又有圣塔院寺塔，始建于辽，明代重建，八角十三层，因碑文中有“寺与塔为

山而设,为荆轲而设也”,故俗称荆轲塔,清代寺中供有田光、荆轲、高渐离三义士牌位。在荆轲馆西北,古有樊於期馆,为其授首于荆轲处;在荆轲馆西南,古有渐离城,为荆轲之友高渐离居所。对于这些遗迹,历代志书多有记载,虽互有异同,已不能完全指实,然大体上是可信的。

另有“送荆陞”在南易水(古又称鼂水)之南,相传为太子丹等送别荆轲之处,则使我感到有些困惑。上引《战国策》所记“送之至易水上”后接“既祖,取道”。其“祖”,注家多解为行祭即祭道路之神,实太牵强。又查《墨子·明鬼下》有言“燕之有祖”,而清代大学者王引之、孙诒让等均释为“祖泽”,当指湖泽而言,似符合其本义。然在古书中不见此一带曾存有较大水面的记载;观察其地势,亦无蓄水为池的天然条件。祖泽显然不在这里。为找到荆轲壮别之地,先要寻觅祖泽。

## 寻觅祖泽

我将目光投向白洋淀及其周边的安新、容城、雄县等地。古书中有关荆轲壮别于这一带的记载亦多见。

在容城与雄县交界地带今残存为数座古城址。对照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其雄县古贤村遗址当即晋时易城县之所在;容城晾马台遗址为汉末公孙瓒所筑易京城,后世称“小易城”;而容城南阳村“燕国城”遗址则为周代燕都临易城,古易水流经其城南,故称临易,后世称“大易故城”。燕人为召公之后裔,周初召公受封于北土,建都于今北京西南房山琉璃河(当古称匱水)镇北,而称匱国(秦汉以后改作燕国)。至燕桓侯(公元前697—691年在位)时

徙都临易。其所在“燕国城遗址”现存一台地,北坡高出周围地面2—3米,当地人称“城坡”。此台地应即燕都临易城内宫城遗址。在此一带出土有许多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如郾王职戈、郾侯载戈等)、陶器、骨角器及货币等,其中一件属春秋时期的铜壶于近左铺首处阴刻“西宫”二字,于近右铺首处刻一“匱”字,并在壶口与壶沿上刻“右冶尹”三字,可进一步为此即燕都临易城之所在提供佐证。其“右冶尹”为掌冶铸事之官。

《墨子·明鬼下》载:“昔者燕简公杀其臣庄子仪而不辜,庄子仪曰:‘吾君王杀我而不辜,死人毋知亦已,死人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期年,燕将驰祖。……日中,燕简公方将驰于祖塗,庄子仪荷朱杖而击之,殪之车上。”此事亦见于《法苑珠林·君臣篇》,而径作“简公祀于祖泽。燕之有祖泽,犹宋之有桑林,国之大祀也。”依古礼制,诸侯国君需祭祀与国事相关诸神及其封疆内名山大川等。齐之“社稷”即齐都城内祭祀土神、谷神之所;宋之“桑林”即宋都城外祭神求雨之所;楚之“云梦”即云梦泽,为楚国境内大泽;燕之祖泽与其相类。国君行祭礼,臣民男女可聚合在一起随观,为古之遗风。其境内大川,一般是在国都郊外面向其所在方位远望而祭,称望祭。燕简公(公元前504—492年在位,或公元前



燕下都遗址



504—460年在位)时国都临易,其亲临祖泽而行祭,当是由于离祖泽较近之故。由此推知,祖泽应指今白洋淀一带的水面,而“祖塗”即由临易城通向祖泽之路。燕臣庄子仪死而有知、击杀燕简公于“祖塗”之事,或是出于幻觉,然被记于燕之《春秋》,又被《墨子》等书所引,竟成为今日寻觅祖泽所在的线索,颇令人感受到文字符号传递古今信息之功能奥妙无穷。

战国时期,赵国兴起,燕都北迁于蓟(今北京),临易城改称易,曾一度为赵所取,后又回归。此一带地为燕与赵之分界,古有“燕南赵北”之说。若以上对“祖泽”的探索无误,则应确信荆轲壮别之地即在此一带。作为历史的见证,这里有古秋风台。

## 古秋风台

在安新县文化局院内,我见到残碑一通,为清道光十六年(1836)安州天宁寺主持源琇按原尺寸重刻,上记当年燕丹等于此送别荆轲之事。此碑原立于安新县安州镇西北3公里古秋风台上,战乱中一度失落,于20世纪80年代重新发现,现正准备重立于原址。查康熙十九年刊《安州志》卷七《古迹》载:“秋风台,在城北易水旁,即燕丹送荆轲之处。”再往前追溯,则有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解燕太子丹送别荆轲之地“在幽州归义县界”。归义县即沿于原燕都临易,而治所稍北移。此前有北魏学者阚骃在述及故临易城风物时谈到荆轲别地“疑于此也”,而为酈道元《水经注》所征引,并言“余按遗传旧迹多在武阳,似不饒此也。”其就当时所见所闻来考辨此事,或偏于信,或偏于疑,均未予以轻率的否定,足见有关证据之过硬。而之所以有所疑,则很可能由于此一带地貌变迁太大,致使古今名物无可比附。

根据地质学研究,今白洋淀至文安洼一带洼地形成与第四纪地质构造凹陷有关。其为众流所归,携沙甚多,又受气候冷暖及海浸进退的影响,水面时而扩张,时而收缩。距今约1万年前,原已干涸的白洋淀地区水面首先在地势

最佳处再度兴起。至距今7500—2500年左右,是白洋淀扩张的全盛时期,东北起自永清,向西南经霸县、雄县北部,西去容城再折而南下,经保定、清苑、望都与定县北部,再东去安国、博野,直趋肃宁、河间地区,东部与古文安洼水域相连。距今2500年以来,湖水变浅乃致解体、收缩,有部分地区干涸。春秋战国之际,正值其水面收缩期。不过,“祖泽”仍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另有《尔雅·释地》等所记“燕有昭余祁”,其“昭余”二字当为“祖”之缓读,或“祖”为“昭余”二字之急读;而“祁”通于“壑”,古书中又有以“泽”作“壑”者。可知二者所指相同。古时北、中、南三易水先后交汇于今容城西北,又东南流至容城、雄县一带注于“祖泽”。至战国晚年,荆轲别此,很可能还大致保持着这样的景观。而后,就渐渐面目全非了。汉代学者无一能指明“祖泽”或“昭余祁”当在今白洋淀地区。晋时文学家左思作《魏都赋》,有“掘鲤之淀”句,据注家所释当指今白洋淀(特指),已是“祖泽”解体后之子遗了。

以古文献、考古资料与地质学研究成果相结合而推定古祖泽之所在,从而使荆轲壮别于此得以明确。当年,燕太子丹等为荆轲送行,当是自燕下都启程,乘舟顺易水而下,至此入祖泽,“既祖,取道”。其“既”,原意指人饮食完毕,引申为止、尽、经过等义。“既祖”即经过祖泽。至于其弃舟登岸处是否即“古秋风台”之所在地已无从推考。不过,这一点似并不很重要。立碑之意,在于可使人临观而感,它至少是与之相近。临于此,同样可以加深体会当年荆轲壮别的心境。由于历史的行动具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最后的结局往往难以预料,因而人们更看重行动之前的抉择。每个人都面临着这种抉择,并应该对自己的抉择负责。如太史公所论:荆轲们之所以“名垂后世”,是因为“其立意较然(明确),不欺其志”。(《史记·刺客列传》)

荆轲去了,惟余易水秋风。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风萧萧兮易水寒。

(责任编辑 洛松)

几年前我曾顺路参观了河南内乡的古县衙。

内乡古县衙始建于1304年，距今已有将近700年的历史，现存的建筑物为清光绪年间营建，也已历时百年上下。和许多参观者一样，我至今仍认为这个古县衙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它就像是一面镜子，能够照出我们今天诸多不足之处。

让我感触极深的，首先是那一面鸣冤鼓，它陈列在县衙大门旁边的一间小屋内。在旧中国，冤假错案不会少于今日，但老百姓告状却好像不比现在困难，只要到县衙门口用鼓槌敲击那鸣冤大鼓，就有人出来接待，县官就要亲自问案。现在，我们的公检法和信访队伍十分庞大，办事人员如麻，却常常发生诉冤难的反常情况。我自己接触到的，就有不止一起，几年甚至十几年告状，各级各单位把告状者推来推去，连状也告不成。告状者成了办事人员踢来踢去的“皮球”。我想，我们先人使用的击鼓鸣冤的方法，它方便百姓的用心至今似乎仍可借鉴，当然形式不一定雷同得那样原始。

其次，从内乡古县衙看，我们精简机构大有潜力可挖。旧县官的职责范围比较宽广，至少是集公安、检察、司法、财税、农业等等于一身，帮助他工作的，加上各种差役人等，大约不会超过一两百位。这种精简的情况，在中国大地上似乎是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以县级为例，如今的县长不但不兼管其它，反而要有多少位副职；县长之下，又有多少个局，又有多少个乡镇，上百、几百位的正职、副职，密密麻麻，黑压压地，都是官儿。如压缩一下机构再砍一刀，决不会出什么大问

题。我当然不会主张回到古代内乡县衙政权机构的框架去，因为现在的工作范围毕竟比过去大得多了；但由于公有制的“大锅饭”太香了，太好吃了，所以吃闲饭的人群仍很大，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还有待时日。

再其次，我注意到，内乡县衙里面，县官和眷属的住房，加起来只有3-4间，县官出门坐的仅仅是两个夫役抬着的那么一顶小轿。按这个标准来看，我们今天绝大部分县官的住房，可能和当年的省长差不多了。乘车，那当然更是非一顶小轿可比，至少是“桑塔纳2000”之类。贫困县的县官也不一定都贫困，他的“坐驾”更不一定比富裕县的车子差。他们这一大群人，住房、用车尽管超过了国家规定的标准，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降下来。

县衙的一角，有一些房屋叫做“寅宾馆”，是专门接待上面来人的，那规模之小、档次之低，现在县城里最差的招待所也比它好得多。

对比之下，我们今天奢华的程度，已经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祖先，为求少数人的脸面，动辄上万的开销，一点儿也不心疼，完全忘却了上千万的下岗职工和几千万的农村贫困人口。这样地挥霍人民的血汗，说是犯罪行为，似乎不能算“夸大”。

再其次，我还注意到，县衙内张贴着的一份材料说，在60位有案可查的县官中，他们的原籍分属全国18个省市，惟独没有原籍河南者在内乡担任县官。我看，这一条措施也很值得借鉴，它说明我们的先人已经懂得“当地人为官”的种种弊病。

一个小小的内乡古县衙，在我看来仍有着深厚的精神财富。我们共产党人不但应当拒绝这些闪光的东西，而且应当把它当作一面镜子，用来照一照我们的腐败现象，会大大有益于我们党的思想建设。

（责任编辑 程 度）

# 内乡县衙的启示

● 张天来

# 一张照片引起的回忆

● 张 虚

我身边珍藏着的这张老照片，是前几年我回老家时，表哥转交给我的。待我神情专注辨认上面五个年轻人时，表哥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说：“你想不到吧，这张照片是新心中学的老校友赵居正从台湾带来的。他临回台湾时嘱托我一定把翻拍的这张转交你。”

我想起来了。这张照片是1947年7月放暑假前在新心中学校园内拍摄的，距赵居正第一次回大陆探亲整整过去了42年。难为他珍藏这么多年，并且飘洋过海带回大陆。照片上的我，当年还不满14岁。是初中生；赵居正上高中一年级，也不过十七八岁。我们五个人既不同村又没亲戚关系，在他心中为何蕴藏



前排右一为作者，后排右一为赵居正（1947年7月2日摄）

了如此深的友情呢？这还要从新心中学说起。

新心中学是河南巩县的一所私立中学。初创于1931年，开始是小学，次年开设初中班，继而增设高中班。校舍虽是偏僻山村一座破旧的泰山庙，却因师资水平较高，教学认真，校风较好，吸引不少本县和邻县的学生前来求学。

学校的创办人、担任首任董事长的刘锡五先生，就是学校附近的黄瓜峪人，幼年家境清贫，父兄克勤克俭供其读完小学，后在乡亲资助下继续上中学，由于他刻苦攻读，一举考入北京大学。后来他虽然步入政界，到了台湾还连任“立法委员”，但不忘自己求学的艰辛，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为发展家乡的教育事业确实费了不少心血。我新心中学的学长、北京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张三慧先生说：“锡五先生的确一生关心教育，关心青年。”

记得当年新心中学的校名，为刘锡五先生所定，意在提倡新文化，培养新思想。他要求学生尊师爱友，立志成才。当时无论高低年级的学生都住校。睡觉没有床，就用芦席和麦秸摊地铺，吃饭没有饭厅，就在露天围着土坯砌成的小台子蹲着吃。每到周六下午，学生们都要回家背米面，以作下周的伙食。多数人要徒步走二三十华里路。我家在邙山岭，回家不仅要乘摆渡过洛河，更可怕的是要经过国民党遗弃的孝义化学兵工厂废址。那里人烟稀少，盗匪出没，人们路过这里，即使白天也要结伴而行。我们村和赵居正的村相距不远，经常结伴，他如同大哥哥一样保护我。

赵居正到台湾后，海峡两岸音讯断绝。一晃几十年，赵居正日夜思念着留在大陆的妻子

(也是“新心”的同学),一直没有再婚。等到两岸有了往来时,二人相见已是花甲老人了。

赵的弟弟到台湾后在台南成家。赵居正作为赵家长子,虽然无后,但自认为有责任领后人回大陆寻根拜祖。我见到他的那一次,正是他领弟弟全家返乡扫墓。他无限感慨地叙述登上邙山岭在祖坟前俯视黄河,南望嵩岳,北眺太行的眷恋心情。他说,要让侄儿侄女们世代牢记,他们的老家在黄河边,他们是炎黄子孙,是中国人。他还说,有生之年尽可能领孩子们多回老家几次,这既是对祖宗尽孝,也是表达对祖国的眷恋。

1999年10月,我陪同新心中学老同学、

全军知名的坠胡演奏家马光陆凭吊母校遗址,面对全新的村民房舍既高兴又惆怅,正要登车返程时,一位村民如同和我们捉迷藏一样,突然把他家屋檐下的一块长方形石板掀起,只见正面镌刻着三个苍劲的大字——新心楼,使我们喜出望外。从落款看正是“新心”校园披荆斩棘建成第一座二层砖木小楼时,锡五先生亲自题写的匾额。马光陆同学的坠胡演奏录音磁带早已在台湾发行,锡五先生如能听到学生创作并演奏的如同行云流水般的《豫西风情》曲,该有多舒心呀!

(责任编辑 洛松)

| 书 名                     | 作者或主编       | 定 价   | 邮 费  |
|-------------------------|-------------|-------|------|
| 百年聚焦(上中下)               | 史义军         | 59.80 | 6.00 |
| 陆定一传                    | 陈清泉 宋广渭     | 29.80 | 4.00 |
| 回首“文革”——中国十年“文革”        |             |       |      |
| 分析与反思(上下册)              | 张 化 苏采青     | 59.80 | 5.00 |
| 史无前例的年代                 |             |       |      |
| 一位人民日报老记者的笔记            | 纪希晨         | 49.00 | 4.00 |
|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         |             |       |      |
|                         | 张湛彬 刘杰辉 张国华 | 25.00 | 4.00 |
| 昨夜西风凋碧树                 | 徐光耀         | 15.00 | 3.00 |
| 直言——李锐六十年的忧与思           | 李 锐         | 29.50 | 4.00 |
|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 杨奎松         | 29.80 | 4.00 |
| 石破天惊                    | 张湛彬         | 29.00 | 4.00 |
| 斯大林秘闻——                 |             |       |      |
| 原苏联秘密档案最新披露             | 爱德华·拉津斯基    | 39.00 | 4.00 |
| 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          | 吴 思         | 16.00 | 3.00 |
| 在伟人身边的岁月——毛泽东保卫参谋、周恩来随从 |             |       |      |
| 副官的回忆录                  | 吕荣斌         | 29.80 | 4.00 |
|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                | 徐晓 丁东 徐友渔   | 26.00 | 4.00 |
| 野百合丛书(共六册)(邮购全套六册邮寄费减半) |             |       |      |
| 之一 王实味——野百合花            | 黄昌勇         | 14.60 | 3.00 |
| 之二 胡风——死人复活的时候          | 晓风 梅志       | 18.80 | 3.00 |
| 之三 王造时——我的当场答复          | 叶永烈         | 15.00 | 3.00 |
| 之四 顾准——民主与“终极目的”        | 罗银胜         | 16.60 | 3.00 |
| 之五 储安平——一条河流般的忧郁        | 谢 泳         | 14.80 | 3.00 |
| 之六 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      | 谢泳          | 16.60 | 3.00 |

## 代购代邮

历史是一面镜子。读史可解惑,可益智。本社对读者函询较多的有关图书,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文革”中在“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风行时,遇罗克顶风写出《出身论》等文章痛斥唯成份论。遇罗克冤死法场30年后,《遗作与回忆》一书出版,其中收录的他的遗作和他亲友的回忆文章,再现了他在疯狂年代中的觉醒与抗争。英雄的血,平民的泪,令人震撼。

《“大跃进”和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国》本书将告诉您:周恩来提出辞去总理职务请求的原因;邓小平坦言他也犯过错误;陈云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检讨的经过;三年困难时期的中南海;赵树理与陈伯达相近的感受。

《史无前例的年代》作者是人民日报的老记者,“文革”中目击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采访了包括叶剑英、谭震林、徐向前、聂荣臻、华国锋在内的许多当事人,并参加了审判“两案”的采访。他撰写的这个纪实作品,从1965年起围绕历史事件依次展开,记录了大量真实情节,是鲜为人知的珍贵史料。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 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 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 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

彭传杰

拜读《炎黄春秋》2000年12期所载徐澄清先生《评诸葛亮用人与魏延之悲剧》一文,感到很有新意。不过,有些论述似乎过于偏颇,难以苟同。本着以史为鉴、古为今用的目的,就有关论述作一些探讨,就教于徐先生与专家学者。

## “谨慎”是诸葛亮的特点和优点

诸葛亮说“先帝知臣谨慎,故临终寄臣以大事”。后人也说:“诸葛一生唯谨慎”。这说明谨慎是他的特点也即最主要的优点。由于谨慎,他无论在个人生活、持家律己、待人处世,还是政治大节方面,都可说是世人表率;在规划战略政略、处理军国大事方面,也思虑精详,处置得宜,高人一筹。因此,他的高风亮节,堪称封建时代美德的化身;也是为世所公认的三国时期众多英雄和古代政治家中的佼佼者。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他也有其短处,即有时谨慎过分,在军事上不敢冒险,出奇制胜;在用人上不敢放手使用有进取精神而又恃才自负的人,导致如徐文所论述的首次北伐时“失人失策”,既不用魏延之策,又误用马谡其人,失掉了夺取关中和长安的一次极好机会。但“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他并不文过饰非,自贬三等,这已是难能可贵了。即如同时代的英雄曹操、孙权、刘备等征战一生,也曾多次打过败仗,甚至大败仗,所以对诸葛亮也不可过于求全责备。如责他没有“亲临前线督战”、“与士卒同甘共苦”,后面又批评他“事必躬亲”、“管得太细太死”,岂不是自相矛盾?至于说他在其后的北伐中不敢取“循秦岭以东”,大胆深入敌后的战略,则是无视魏方增兵易帅加强戒备后,间道出奇已无可能的现实。徐文进一步说:“诸葛亮一生确实谨慎到了谨小慎微的地步”,这更难以苟同。

诸葛亮于公元207年以军师(即顾问、参谋)身份出山辅佐刘备。208年联合孙权取得“赤壁之战”胜利后,使此前已奋斗了二十四年尚寄人篱下的刘备集团占有了荆州,214年取得益州,219年又取汉中称王,实现了“三国鼎立”的第一步战略目标。此后,由于关羽和刘备违反《隆中对》所定“联孙抗曹”的战略方针,加之骄傲轻敌,先后“大意失荆州”、“火烧连营七百里”,不仅荆州人地两失,备所统益州水陆两路七万大军也几乎全军覆灭,从而大伤元气,使进而统一天下的大好形势逆转。到223年“白帝托孤”时,地只剩下益州一隅,且南方叛乱未平,能

臣猛将多已身故（军阶最高的前、后、左、右四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已死，赵云已老）。在这种情况下，刘备把“光复汉业”的全部重担都托付给他，并公开宣示“若嗣子（指刘禅）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试想：诸葛亮能不兢兢业业、小心谨慎、生怕有失吗？何况除一出祁山外，以后再也没有出过类似失误，几次的进军路线和大体战况是：228年，亮出散关，在陈仓为郝昭所拒，粮尽而还，斩魏将王双；229年，亮出汉中，遣陈式攻取阴平、武都二郡，复丞相职；230年，魏曹真伐蜀，亮出汉中拒之，因大雨月余，双方罢兵；231年，亮出祁山，张郃往救，留王平拒之，亮转攻上邽等地，数败司马懿主力，粮尽退军，张郃追击被杀。234年，亮出斜谷，“以前者数出，皆以粮运不继，使己志不伸，乃分兵屯田为久驻之基”。秋八月病故五丈原军中。及军退，司马懿视察其营垒处所，称赞他“天下奇才也”。

总之，诸葛亮以弱击强，使魏方只有招架之功，无还手之力。退军之际，能二毙魏方大将。最后病故撤军时，令姜维断后，还“死诸葛，吓走活仲达”。这些都足以说明诸葛亮高超的治军才能。

还应说明的是：诸葛亮不仅自己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实际行动报答刘备，身故三十年后蜀亡时，其子诸葛瞻（37岁）、孙诸葛尚（19岁）都战死沙场，以身殉国，可说是一门忠烈。在封建时代，这种肝胆相照、亲密无间、以大局为重的君臣关系可说是绝无仅有的典范。

## “用人唯贤”才能长治久安

徐文说：诸葛亮用人“知矮偏颇”，“求全责备”，“似乎就喜欢那些谨小慎微、好做表面功夫的人”，“有生之年未能选拔和造就灿若群星的文武雄才来辅助和继承他的事业”，似与史实不符。

诸葛亮集军国大权于一身，南征北伐，常年统军在外，先后负责留守成都的张裔、蒋琬、费祎等都能保持内部政治稳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源源不断地向前方输送兵员、军需、粮草。管

理官中事务的董允能上匡刘禅之失，下制黄皓为非。对吴外交则邓芝、陈震、宗预等都能不辱使命，为孙权所敬重，重建和巩固了蜀吴联盟，收互相支援呼应之效。225年采用马谡“攻心为上”之策，平定南方少数民族的叛乱，后来孟获还在朝廷当了御史中丞（负责监察的大臣）。留守的李恢、马忠、张嶷等都镇抚得宜，不但南人再不反，还“军资所出，国以富饶”，成了可靠的后勤保障基地。在短短四年内，在内政外交都取得成效、恢复了元气的基础上，诸葛亮就开始了北伐战争。虽然首出祁山失利而返，但却选拔了王平、姜维两员大将。

王平是行伍出身，大字不识十个，刘备北定汉中时主动来降。马谡守街亭时，他为部将之一，对谡违亮节度、舍水上山、下不据城的错误再三劝谏不听。谡败，“众尽星散，唯平所领千人鸣鼓自持。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于是平徐徐收拾诸军营，率将士而还”。所以谡等败将被军法处置的同时，平反加官封爵，以后多立战功，成了镇守汉中的大将，与东方的邓芝、南方的马忠，构成了边防的“铁三角”。244年，魏曹爽率步骑兵十余万奔向汉中，时守兵不满三万，诸将大惊，平指挥若定，迫使魏军退还。

姜维虽是一出祁山时被迫来降的无名小将，却是亮所培养、提拔的军事上的接班人，称赞他：忠勤时事，思虑精密，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而才兼于人。维也不负所望，能继亮遗志，“八伐中原”，终因主客观条件限制，互有胜负，未获成功。后因黄皓乱政，维谏刘禅不听，外出屯田以避祸。263年，闻魏三路大军近二十万人伐蜀，曾报告刘禅调兵遣将，加强守备。因皓迷信鬼巫，认为“敌终不自致”，启禅寝其事，而群臣不知。因此汉中失守，维被迫退守剑阁，挡住了钟会十多万大军。一度魏军还因粮草不继，曾打算退兵。由于邓艾率精兵冒险偷渡阴平，直逼成都，刘禅出降，并命维所统大军降会。他还想借钟会意图叛魏自立之机，以图恢复，事败被杀。

当时，蜀国只有28万户，94万口，只相当魏国的七分之一。不仅诸葛亮生前“六出汉中”，使司马懿也“畏蜀如虎”；亮身后又支持



了近三十年,不是黄皓乱政,还不致亡国,这不正说明他能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吗?至于说“蒋琬、费祎、姜维等人均无大的作为,反为黄皓、谯周等人所牵制”,也属苛责于他们。试想,在众寡不侔、攻守易体、强弱势殊的情况下,还能多次主动出击,不正是大有作为吗?再则,在封建社会,他们对于刘禅不听劝谏,宠信黄皓,终致亡国,实在也无法可施。否则“清君侧”把皓杀掉,岂不和曹氏、司马氏一再“逼宫”难以区别了吗?对于谯周,又当别论。他曾上疏劝谏刘禅不要广增声乐,扩建宫室。又作《仇国论》,认为国小力弱,宜休兵息民,以待天时。邓艾进围成都时,有人建议周逃往吴国,或奔往南中,周力排众议,认为统一之势不可阻挡,只是迟早问题,不如直接投降。“于是,遂从周策,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三国志·本传》)对此,若撇开封建正统观念,从统一大局来看,也未可厚非。

诸葛亮用人不避亲贵,有过必罚,特别对品



诸葛亮

质不良的人,防其内乱。对此,徐文说他“对于有点个性和雄才大略的人却往往因其小而失大”,“对确有所长,又有些缺点的能人也往往使用不得法,处置极端,偏颇”,也是不审时势的看法。当时,自董卓、曹操以来,以下凌上,夺权篡位的事例层出不穷,而刘禅却是平庸之主。诸葛亮当然顾虑自己身后,某些有能力又自负的人不会不忠于汉室而引发内乱,这是他不得不防的首要问题。试想,刘封为备养子,关羽围樊城时连令发兵相助,封都拒不从命;后又欺凌和激反孟达,丧师失地,败还成都;赐死时,又叹息未听孟达劝降之言。这样的人,备死谁能驾驭?何况罪有应得,亮劝备杀之又有何错?廖立骄横,引起公愤,亮与众大臣联名以“诽谤先帝,疵毁群士,羊之乱群,犹能为害”,加以废置,也无不当。李严与亮同受顾命,是蜀汉第二号人物。他却劝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被亮回书拒绝。(见《诸葛亮集》)亮二出祁山,连打胜仗之时,严在汉中督运粮草,因天雨难继,派人假说后方有事,叫亮退军。军退后,又假说“军粮充足,何得便归”。并欺瞒刘禅说是“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经亮以前后文书质对时,才被迫认错,当然被弹劾废置。但亮不搞株连,继续重用严子李丰,并手书加以慰勉。廖、李二人毫无怨言,只希望自己改正后能重新起用。所以陈寿说他“尽忠益时者虽仇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三国志·本传》)

诸葛亮用人还有一大优点,就是容纳不同意见,接受群众监督。为丞相时《与群下教》中说:“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者也!”并表扬董和“在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失街亭自贬之后,又作《劝将士勤攻己阙教》,要大家以国事为重,多指出和纠正自己的失误。当时有个李邕,当过太守、参军等官,偏怀疑诸葛亮这种权臣,功高震主,总有一天,不是篡位,就是身败名裂。对此,亮并不怪罪,而是深自反省,注意不可越分。(亮死后,邕上疏说刘氏从此得保,应该庆幸,为刘禅所杀。)

总之,由于诸葛亮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路线,并以身作则,不仅选拔了大批贤士,辅佐

和继承自己的事业,还确保了“阿斗太子”刘禅安稳地做了四十年皇帝,蜀汉一直没有发生内乱。较之同时代的曹操,死后二十年,魏国政权实际上就为司马氏所把持,司马师废曹芳,司马昭杀曹髦,司马炎从曹奂手中“禅代”为晋。孙权死后,大臣擅权,几次宫廷政变,其子孙和、孙霸、孙亮,先后被废、被杀。从国家长治久安来说,诸葛亮的用人不是高明得多吗?邓艾灭蜀后,就骄横跋扈,擅自做主,因而被捕。钟会更想据蜀叛魏自立,因而被杀。也从反面证明光有才能而无德行的人,即使能立不世之功,对国家的危害性反而可能更大。

## 魏杨悲剧属于咎由自取

正如徐文所述,魏延确是有勇有谋,独当一面的大将之才,也屡建大功。但缺点也很突出。本传载“常谓亮为怯,叹恨己才用之不尽。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唯杨仪不假借延。”即自以为老子天下第一,对亮都是组织上服从,思想上不服,人家都怕他,只有杨仪不买他的账。“延以为至愤,有如水火”。但杨仪也非等闲之辈。本传载:刘备与论军国计策,政治得失,大悦之,辟为左将军兵曹掾,为汉中王后,又拔为尚书。后为丞相长史,“亮数出军,仪常规划分部,筹运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军戎节度,取办于仪。”可见杨仪是个得力的参谋兼后勤的幕僚长。他也有同样的弱点:“性狷狭”,即不能容人。“亮深惜仪之才干,凭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主要靠费祎调停其间。祎传“延仪相憎恶,每并坐争论,延或举刀拟仪。仪泣涕横集。祎常入座其间,谏喻分别。终亮之世,各尽延、仪之用者,祎匡救之力也”。

对此,孙权都旁观者清。《资治通鉴》载:234年,费祎使吴,权提醒他:“杨仪、魏延,牧竖小人也,虽尝有鸣吠之益于时务。然既已任之,势不得轻。若一朝无诸葛亮,必为祸乱矣!”祎以外交词令答“仪、延之不协,起于私愤耳,今当扫除强贼,混一涵夏,若舍此不任,防其后患,是犹备有风波而废舟楫也。”祎回来定会向亮转达,亮当然心知肚明,有所防患。

果然,亮死延先发难。他以领军继续北伐为由拒绝断后之命,想就此接掌军权,擅自拟定给各将领的命令,要费祎与己联名通知。祎以劝说杨仪为由逃回后,延见仪按亮部署退军,便率所领径先南归,所过烧绝阁道。仪等令槎山通道,昼夜兼行,亦继延后。延先至据南谷口,遣兵出击仪等。仪令王平于前御延。延士众知曲在延,莫为用命,军皆散。延独与其子数人逃命,奔汉中。“仪遣马岱追斩之,遂夷延三族。”试想,亮死军心不稳,举国震悼,当依遗命全师而退,以固国本。此时司马懿率军追击,延反挑起内乱,先断大军归路,如若得逞,后果不堪设想。幸而姜维断后,吓退懿军,王平又以大义相责,驱散延众,得以安返汉中。不过杨仪“自以为功勋至大,宜当代亮辅政”,但仅拜为中军师,无所统领。而亮平生密指,以仪性狷狭,意在蒋琬。琬遂为尚书令。仪又“自以为年宦先琬,才能逾之,于是怨愤形于声色”,甚至说出后悔当时没有举军投魏的牢骚。总之,虽然二人并无反汉投魏行动,确都有夺取蜀国军政大权的野心(因为取得蜀国大权与投魏讨赏相比,当然前者为重,他们也自认可以达到目的)。比较起来,延举兵相向,危害极大,其罪当诛;仪口出怨言,危害较小,后来自杀,也属咎由自取。

可以说魏杨都是有才,有大功,但不能正确对待自己缺点,发展到有野心,有大罪,以致晚节不终,性命不保。陈寿评论说:“览其举措,迹其规矩,招祸取咎,无不自己也”。对此全面揭示出来,引为鉴戒是好的。且诸葛亮是人不是神,生前一直未能感化二人,死时何能缓解其矛盾?其暂将军权交付杨仪,并密表将全权交付蒋琬,足见其知人、用人之明。费祎处魏杨之间,一直以国家利益为重,也显其能、其直。如责怪他们,则属过分。至于“夷延三族”是仪挟嫌报复,亮所不为。临终命延断后,也可能是“由他去吧”之意。反之,延若得逞,则身死族灭者或不止杨仪一人而已。总之,魏延此举,既违军令,更无朝廷授权,所以遭到前线将领的一致反对,也得不到自己部下的支持。加之孙权预料在前,陈寿评论在后,为之翻案,实无必要。

(责任编辑 吴思)

# 来自读者的祝贺

今年7月1日为本刊创刊十周年纪念日。在此前后，我们收到多位名人政要的题词，也收到不少书画家的贺词和贺画。这些，本刊已从6月号起陆续发表。

同时，有大量的读者来信寄到编辑部，或建言，或致贺，言诚意切，令人感动。特选几封发表，以示本刊对所有来信者的鸣谢。

（《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 学者王荆录鲁迅语相赠

研究鲁迅的学者王荆来信说：欣逢贵刊十周年，想到今年又是鲁迅诞辰120周年，愿以鲁迅论史及有关语数则为贵刊寿。

王荆共引11则，这里摘其中7则发表：

我是不研究理论的，所以应看什么书，不能切要的说。据我的私见，首先是该看历史。（《致徐懋庸函》）

我们看历史，能够据过去以推未来，看一个人的以往的经历，也有一样的效用。（《华盖集·答KS君》）

古人所传授下来的经验，有些实在是极可贵的，因为它曾经费去许多牺牲，而留给后人很大的益处。

（《南腔北调集·经验》）

中国的史家是早已明白了这一点的，所以历史里大抵有循吏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和佞幸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从知道全般。

（《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

现在我们再看历史，在历史上的记载和论断有时也是极靠不住的，不能相信的地方很多，因为通常我们晓得，某朝的年代长一点，其中必定好人多；某朝的年代短一点，其中差不多没有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年代长了，做史的是本朝人，当然恭维本朝的人物，年代短了，做史的是别朝人，便很自由地贬斥其异朝的人物……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辉，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吗》）

我想：希望本来是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呐喊·故乡》）

## 未署名读者致诗

《炎黄春秋》十年矣，十年辛勤岂容易？

艰难险阻总难免，酸甜苦辣自家知。

唯物主义识真伪，辩证法则明正奇。

爱不溢美恶不损，功不张扬过不避。

改革开放劲鼓吹，实事求是自为旗。

百尺竿头进一步，有错即改不迟疑。

我是本刊老读者，一点诚心当寿仪。

## 刘恪山书唐魏徵疏为贺

北京读者刘恪山书写一长幅赠本刊编辑部。他在题款中写道：“辛巳夏七月欣逢炎黄春秋杂志创刊十周年书唐魏徵谏太宗十思疏为贺。”

## 刘德纯父女经验谈

读者刘德纯来信说:我同编辑部的同志一个也不相识,但是《炎黄春秋》杂志已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

我是一个解放军的老兵,20世纪90年代初住进干休所,便在报刊阅览室看到了《炎黄春秋》这个杂志,开始只是翻阅,越看越感兴趣。杂志以介绍历史人物和事件为主,使我从中知道了许多事情,长了许多知识。于是,《炎黄春秋》便成了我每进阅览室的必读刊物了。

去年我在第7期《炎黄春秋》上,看到林里同志《目睹周恩来陶铸罢宴》的文章,使我想起了1963年我住在陶铸家的一件事,便试着写了《陶铸家有过一个“集体宿舍”》的小文章,寄给了编辑部。没想到,我这小人物的稿子很快便登了出来。使被尘封了38年的革命家陶铸的故事,终于公布于世。我用稿费买了五卷本的《炎黄春秋》精品系列一套,还订了全年的杂志。从此,《炎黄春秋》走进了我的家庭,并且开始了我和女儿共同学习、研究《炎黄春秋》的计划。

《炎黄春秋》是中老年人特别喜欢阅读的杂志,这是尽人皆知的。但是,根据我的体会,特别是我女儿由很少读到喜欢读的过程,我敢说,《炎黄春秋》也能够成为中青年喜欢读的刊物。

我女儿是大学本科学历,尚无个人牵挂。我们父女俩每看一篇文章便交流心得体会。我把这个年轻人引进《炎黄春秋》这个园地;她帮我编写读刊笔记。日久天长,意外的收获是,我们父女之间的“代沟”越来越平了,越来越小了。

上阵父女兵。两个多月时间,我跟女儿共同完成了五个研讨的题目:一是,为使《炎黄春秋》长盛不衰,提出了创办《炎黄春秋》文库的建议;二是,综合研究有关台湾的12篇文章,得出“台独”不得人心两岸必须统一的结论;三是,研读了4位革命老前辈的文章,写出了《信仰、信任、信心》的短文;四是,研读了张学良1928年东北“易帜”和1936年西安事变两大事件,得出了中华民族必须团结统一的道理;五是,读了杜导正社长的文章《〈炎黄春秋〉的春秋》,写了我们对今后办好《炎黄春秋》的希望。

这里,介绍一下我们父女俩读《刘白羽、徐光耀关

于反右瓜葛的通信》后的对话。我女儿年轻敢讲话,她借用处理公交事故的合法用语“私了”一词说:这是光荣的“私了”,光明正大的“私了”。我说:“这是别具内容和形式的新型《将相和》。《将相和》这出戏就是光荣的‘私了’,皇帝没出面,双方直接解决了,结果是‘此乃国家之幸’。”对于刘白羽的长者之风,徐光耀的大度之风,我们父女很是敬佩。我们父女这段话,反映了这种敬佩,也反映了我们父女两代人观点的融合。

## 自编十年总目录以备检索

湖北省当阳市友谊路六号章永典来信说:《炎黄春秋》从开卷至今,我从未中断订阅,尽管社址多次移动,从海淀区北洼路5号,到西城区文津街7号,再到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杂志均由贵刊发行部按时邮寄,一期不少。我感谢发行部同志的负责精神,更感谢编辑部同志为读者编辑了这样一份独具风格、品位较高的杂志。它已成为我以及我的家人、友人的精神食粮,为了翻检资料的方便,在庆祝《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的日子里,我特地把十个年头的每年度的总目录搜集起来,一一抄录并合订成《〈炎黄春秋〉创刊十周年总目录》。我的工作即将完成时,可巧孙子要写有关三峡的文章,我一下子便为他找到了《邓小平与三峡》等三篇资料,他高兴得如获至宝。

我将永远做《炎黄春秋》的忠实读者,衷心祝愿它越办越好!

## 山村读者刘忠义致贺并聊家常

辽宁省西丰县金星满族乡青山村刘忠义6月22日致函本刊说:“欣逢贵刊创办十周年,写拙字致谢,不成敬意,请能笑纳。”他用钢笔工工整整写下的八个字是:“创刊十年,越办越好。”

刘忠义在为本刊致贺之后,又说到家乡的一些情况。他说故乡50年遭到两次洪水,今年洪水冲了庄稼,幸而人身安全,县、乡领导及时赶去慰问,云云。

# 赏中秋明月 话祖国统一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与禾信公司等  
单位联合推出“中华圆月”

今年是新的世纪的第一年。新年伊始,喜事便接踵而至。在全国人民欢庆中国共产党八十诞辰的日子里,又传来了北京申奥成功的喜讯,全世界的炎黄子孙都沉浸在无限的欣喜之中。有心的人们早已注意到,这新世纪的第一个国庆节,又巧与中国的传统节日——中秋佳节相逢,真可谓两节同庆,喜上加喜。

关于中秋节的来历,研究历史和民俗的都其说不一。有的说来自“秋报”(即庆丰收),有的说来自于先人的“祭月”。无论如何,中国的中秋节由来已久,而且中国人是把这个“节”作为“佳节”来过的。所谓“十二度圆皆好看,其中圆极是中秋”。中秋的月亮是最美好的。秋高气爽,明月皎洁,引发人们的遐想,于是便有了关于月亮的美丽传说,有了人们触景生情对团圆、对和平、对美好未来的期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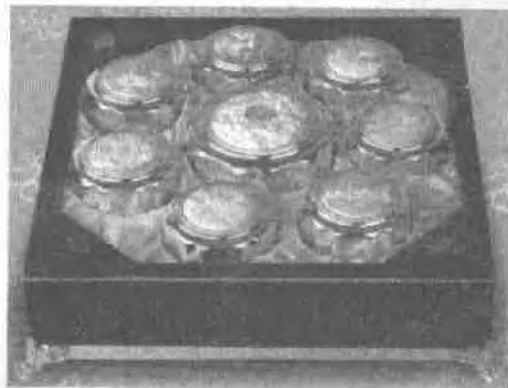
深圳市禾信实业有限公司是一个专门从事文化精品开发制造的专业公司,参与过多项全国大型活动收藏纪念品的策划、设计和制造。正是他们参加过香港回归、澳门回归的收藏纪念品制造的缘故,在这新世纪第一个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他们想到:近几年中国人民已经圆了香港回归的梦、澳门回归的梦,今年又圆了申奥成功的梦,但是,祖国完全统一的梦还没有圆,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事业更有待我们几代人做长期努力。于是,他们抓住 21 世纪第一个国庆节和第一个中秋节同天的巧遇,抓住中华民族期盼团圆、憧憬未来的特殊文化心理和审美情趣,策划并推出“中华圆月”,将传统习俗、食品文化、艺术审美融为一体。

“中华圆月”采用七星伴月形式。八个精

美的金属盒,中间大盒的盖面浮雕是巨龙腾飞图案,圆心是中华人文始祖轩辕黄帝像;七个小盒的盖面浮雕分别为长江、长城、黄山、黄河、香港、澳门、台湾。“中华圆月”木盒内还附有古香古色的《中秋诗文选》一册,介绍中秋佳节的 CVD 光碟一张。

以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振奋民族精神,促进祖国现代化建设和统一为己任的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对禾信公司的这一倡议给予积极支持。重食传统和尚食思想的形成,在中国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了。制作食品不仅是为了“果腹”,为了满足肌体的需要,人们长期形成的社会心理,还赋予某种食品以特殊含义,以满足某种精神上的需要。诸如长寿面、年糕、月饼等等,俯拾皆是。晋人“寒夜客来茶当酒”的诗句传诵至今,因为它艺术地记录了一种意境,一种氛围;当今的中国人,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中秋佳节,把酒赏月,共话中国的完全统一,留下的记忆一定是美好的隽永的。

(严久惠)



# 庆祝《炎黄春秋》 创刊十周年

▼ 汤文选 作



► 王志鸿 作



► 刘秀芝 作



▼ 丁玉来 作





# 炎黄春秋

YANHUANG CHUNQIU

知识分子的真挚朋友蒋南翔

河南“潘、杨、王”事件前后

为民权保障而死的杨杏佛

左联作家蒋光慈被开除党籍始末

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ISSN 1003-1170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